

# 现代化进程中的“后 发展”理论

——邓小平的发展观及其意义

刘秀萍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理论：邓小平的发展观及其意义 / 刘秀萍著 .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10

（现代化与发展）

ISBN 7-105-04785-2

. 现... . 刘... . 邓小平理论 - 社会发展 - 理论研究

. A849.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4686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210千字

印数：0001 - 2500册 定价：15.00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 “现代化与发展”丛书出版说明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平凡的时期。整个世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战争、对峙、倾轧，大多数国家几经内乱、迷失、颠覆，临近后期才走上也远非平坦的“和平与发展”之路；是情势所逼与人们的主观渴念，把发展问题置于世纪之交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的突出地位，使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

而在当代，发展问题的核心是现代化。就整个世界的情形看，“业已现代化（Modernized）”的国家在致力于拯治“发展性危机”与“现代化弊端”，处于向“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转换的过程中，而“现代化中断（Breakdown of Modernization）”的国家在“接续”，“现代化中（Modernizing）”或“现代化过程本身（Modernization）”的国家在加快步伐，“尚未现代化（Unmodernized）”或“前现代化（Premodernization）”的国家在起步，可以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涉及现代化，没有哪一个重要问题不与现代化有关。

正是基于此，现代化与发展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也引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强烈兴趣，近年来成果迭现。本丛书遴选了其中处于研究前沿、代表我国这一领域较高水平的4部专著，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而相互之间又构成一个有机的逻辑系列。丛书包括：《哲学形态的当代探索》（聂锦芳博士）、《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张立波博士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理论》（刘秀萍博士）、《人的活动与社会历史发展规

律的关系》（刘曙光博士）。

同时必须指出，这决不意味着本丛书是曲高和寡的学院派论著，因课题本身强烈的现实性，作者在著述中展示了转型时代大量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一些既涉及面广而又是普通人关注的问题给予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文笔生动，叙述平易、流畅。因此，我们决定出版这套丛书，以飨广大读者。

民族出版社

2002年1月



刘秀萍，1967年出生于山西平定，先后于1990、1995、1998年在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数学学士、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方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发表过《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问题》、《“模式”解剖与“特色”论证》、《科学活动中的价值渗透》等二十余篇论文，合著出版《发展理论论纲》（2000）。

# 目 录

引 言 时代主题与理性选择.....	( 1 )
第一章 复杂情势下的艰苦探索.....	( 19 )
一、背景分析.....	( 19 )
二、形成过程.....	( 30 )
第二章 总体观照：核心与特色.....	( 41 )
一、中国：当代后发展的典型形态.....	( 41 )
二、设计：驾驭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主导方式.....	( 44 )
三、邓小平设计中国现代化的原则举要.....	( 53 )
四、“现代化”与“发展”内涵的当代阐释.....	( 60 )
第三章 立足于当代实践的分析构架.....	( 66 )
一、科技革命浪潮的激荡.....	( 66 )
二、当代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	( 74 )
三、当代中国社会主体结构的变革.....	( 81 )
四、新型实践观呼唤新的实践精神.....	( 88 )
第四章 作为现代化新型实现方式的“社会主义”.....	( 95 )
一、“资本主义式”现代化所存在的 “发展性危机”.....	( 96 )
二、传统社会主义的反思.....	( 106 )
三、“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式” 的现代化.....	( 115 )
四、现代化实现方式的现代化.....	( 121 )

第五章	“后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设计.....	( 132 )
一、	“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不平衡问题.....	( 132 )
二、	“后发展”国家特有的难题.....	( 138 )
三、	社会发展的“跨越性”论证.....	( 144 )
四、	“后发展”问题的整体设计.....	( 151 )
第六章	传承与拓展	
——	邓小平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	
	发展理论之关系分析.....	( 165 )
一、	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历程的哲学精神.....	( 166 )
二、	“跨越”与“不可跨越”：一道难题的求解.....	( 174 )
三、	发展问题的当代推进.....	( 183 )
四、	“坚持”与“发展”：方法论的启迪.....	( 198 )
第七章	扬弃与超越	
——	邓小平发展观与现当代西方发展	
	理论之比较分析.....	( 205 )
一、	现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嬗变的历史轨迹.....	( 206 )
二、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发展的诠释.....	( 213 )
三、	西方发展理论的总体特征与困境.....	( 218 )
四、	邓小平的发展观：超越思辨、走向实践.....	( 225 )
第八章	邓小平的发展观与当代发展实践.....	( 233 )
一、	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邓小平发展观的具体化.....	( 233 )
二、	“一个世界历史性事实”：邓小平发展观	
	的世界意义.....	( 243 )
主要参考书目	.....	( 257 )
后 记	.....	( 261 )

# 引言 时代主题与理性选择

## 一、世纪之交的时代主题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平凡的岁月。整个世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战争、对峙、倾轧，大多数国家几经内乱、迷失、颠覆，临近后期才走上也远非平坦的“和平与发展”之路；是情势所逼与人们的主观渴求，把发展问题置于世纪之交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的突出地位，使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人们终于明白，较之蛮横的霸权与抽象的“民主”，普通人的生存与世界性的交往和进步更是关乎人类现实处境与未来命运的大问题。

在意识形态斗争与冷战思维主宰世界数十年之后，在古老的东方大国，邓小平在新时期较早地注意到这一时代主题的转变。“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1984年10月10日他对来访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说：“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1985年3月4日，他又讲：“我们的观点有了变化。我们感到，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93。



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988年12月21日，他再次把和平与发展称为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两个问题”，并且指出：“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南方再度发出警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其他一切都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世界回应着这位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80年代以来多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发展问题都成为政治家和学者们关注的首要议题，如基多的“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维也纳就业与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北京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以及联合国计划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系列发展问题会议。特别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更成为世纪之交发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随着发展实践的深入和复杂化，许多学科也都把自己的视点聚焦在发展问题上，在50年代已初显轮廓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发展战略学、发展哲学等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93。

方面的著述又涌高潮，厚重之作迭出。与此同时，发展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维也纳发展研究所、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发展研究所、世界发展研究所、国际发展协会等等，都是颇有建树的研究组织。可以说，发展是一种现实的世界性运动，是一门跨学科研究的“显学”，发展范畴是处于世纪之交的时代的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

而在当代，发展问题又是与现代化密切相联、互为表里的。就整个世界的情形看，“尚未现代化（Unmodernized）”或“前现代化（Premodernization）”的国家在起步，“现代化中断（Breakdown of Modernization）”的国家在“接续”，“现代化中（Modernizing）”或“现代化过程本身（Modernization）”的国家在加快步伐，就是“业已现代化（Modernized）”或“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的国家也在致力于拯治“发展性危机”与“现代化弊端”。在当今这个时代，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涉及现代化，没有哪一个重要问题不与现代化有关。但是，如果把眼界放得更宽泛一些，思绪向历史延展，现代化留给我们的话题却远不轻松与愉悦。肇始于18世纪末西方工业革命的人类现代化进程，两个世纪内走过的是一条充满矛盾的发展之径。

这种矛盾性首先体现在，探索渗和着阵痛、进步伴随着代价。即以业已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例，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的不断扩大、呢绒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残酷的海外掠夺来开始现代化的起步的。今天检视这一进程，人们都明白了，如果不是圈地运动这样“肆无忌惮地牺牲农民，这样的工业化过程绝无可能”；而工场手工业把个人限制在一种固定的操作上，使其能力只能得到片面化的发展，才换来整个工场手工业的兴起；残

酷的海外掠夺为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却是以殖民主义的产生为代价的。对德国资本主义现代制度，马克思曾作过入木三分的剖析，认为它的“唯一原则和基本特征，是蔑视人，轻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美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也是通过对中部美洲和亚洲一些领土和资源的掠夺来实现的。美国社会力图激发人们努力奋斗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引入社会生产活动中去，因此，这个社会创造了一个高效率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它对效率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以牺牲平等为代价。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就是通过“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

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矛盾之处，在于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与前进步伐参差不齐，当第三世界广大地区开始迈步走向现代化发展道路之时，走在最前列的那些发达工业国却已大体完成了自己的发展使命，准备转向一个新的历程了。这就形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类型。对于刚刚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而实行了政治自立、尚未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效仿西方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还是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有自己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乃至可否避开工业化道路，成为关系其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而从现实实践看，西方发达国家为现代化提供的理论范导和政策示向不惟没有促使这些国家后来居上，反而由于它们在解决了政治“依附”之后又陷入经济、文化“依附”，使“不平衡”体系更加巩固，大多数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步履艰难。

正在这时，从70年代末开始，饱经百年忧患和数十年探索与曲折的中国崛起了。她以20年改革开放的实绩，使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呈现出灿烂图景与勃勃生机，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与醒目的参照体系，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指导中国这一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内涵丰富、意蕴深邃的发展思想，其凝结便是邓小平的发展观。

指认邓小平的发展观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理论”，并不是追赶已引起学界毁誉不一的所谓“后……主义”研究的时髦，重要的在于这种指认是否契合邓小平思想本身的逻辑意旨。的确，在我们所见到的邓小平的著述中，他没有明确使用过“后发展”一词，他使用更多的是诸如“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等等。但是，诚如马克思所言，思想家的表述与其思想实质之间并不永远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从邓小平思想形成的复杂背景与发展逻辑和实质看，他正是把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宽阔视野之中，集中思考像中国这种类型的国家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在他那里，真正把“作为一条社会普遍出路的现代化”和“后来者的特殊问题”融会起来并得到解决，体现了他的“世界历史眼光”和“中国策略”。我们在后文中的详细讨论将会表明，在形形色色旨在为落后国家提供有关现代化的理论指导和政策示向的“后发展理论”中，绝大多数要么是从一些局部的具体的实证数字出发的现象概括，上升不到普遍性的高度；要么是一些空洞、宏观的概念推演和徒具骨架的体系计划，缺乏实践的、操作意义的分析。与此相比，邓小平发展观是惟一在实践中运思又及时地引入实践并取得成功的范例，是理论建构与实践价值的高度统一。在各种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heory）和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y）中“后发展社会（Late Developing Society）”成为一种约

定俗称的情况下，我们把邓小平的发展观指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理论”，意图即在于把这一最具现实指导作用的理论提高到具有普遍价值与意义的地位，从而确认、估价邓小平发展观在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这就有必要辨明邓小平对“后发展国家”内涵的理解。过去我们在“泛阶级斗争化”的框架内观照世界，总是在非此即彼的对立两极中思维，比如，在对世界各国的总体分析与类型划分中往往只注重社会制度、生产关系、阶级地位与政治倾向，这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完备的，如果以此为分析世界的惟一标准，就是有偏差的。邓小平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突破了这种思维模式，在对世界的考察中实现了划界标准的变革，既突出重点，又全面衡量，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系统的思想。

所谓突出重点，就是说邓小平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的差别来作为划分世界上发达与不发达国家的界限。其中他特别看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平、都市化程度等标准。有文献表明，从80年代起联合国每年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都引起他的重视，大的方面他总是了然于胸，在与我国其他领导人和外宾的谈话中屡次提及或引用。比如，1990年他在不同场合有五次谈到：联合国1989年公布的统计数字，对我们十分有用，它可以使我们明白，我们的国家现在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他说，世界上185个国家和地区，有48个国家和地区属于发达社会，这些国家人均收入超过6000美元；另有48个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3000美元左右，被视为“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有43个国家和地区人均收入920美元左右，被称为“低等发达程度的国家”；500美元以下的还有48个，就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了。除了48个发达国家，其余137个都是“不够发达的国家”。

当然，邓小平是辩证论者，他坚持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

要方面，但并不认为是惟一的方面。他认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是综合的、全面的。正是基于此，他特别注重“综合国力”的概念，要求对社会进行以生产力水平为中心的综合评价。谈及中国的情况，邓小平说，我国去年（指1989年）人均收入不到400美元，准确统计是372美元，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80%左右，文盲人口占人口总数的23%，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由此可以明确，邓小平之所谓“不发达”亦即“后发展”，意指社会经济贫困、生产力水平不高，尚未完成工业化的社会状况；他的发展思想的全部归旨就在于使这种落后的社会加速实现现代化。

因此，尽管关于“后……”的研究已引起学界毁誉不一的评论，笔者却无意避难而退。因为一方面我认为，这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现象与社会存在，你不用“后”去概括它也得用别的词汇，没有必要在此做文字游戏或苛刻评判；更重要的，我觉得把邓小平发展理论这一独特视点引入学术研究领域，将与它题旨相同，而思路、效果各异的学者们的观点作一对比，其独有的意义与价值体现得会更加彰显；再者，较之西方“Post（后）”这一词缀所隐含的“解构”、“颠覆”、“破缺”等，邓小平理论中所体现的“拓展”、“深化”、“扬弃”、“超越”等意义更符合“后发展”国家应具有的精神旨趣，从而也更能触及到现代化与发展问题的实质。

## 二、社会发展理论总体图景中的邓小平发展观

社会发展理论的演变同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大致同步。结合风云际会的时代变迁把近现代中、外思想家对社会发展问题所作的

思考作一番考察，那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斑斓驳杂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总体图景。这里既有奠基于唯物史观之上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的构想，也有中国近百年来对自身现代化的多重探索，既有社会主义发展中形成的远非一帆风顺的多种道路和模式，也有摆脱殖民统治后不发达国家要求经济自立的呼唤及其步履艰难中的喟叹，更有西方形形色色的发展观从单纯经济增长论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再到“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直迄后现代主义的嬗变。在这幅社会发展理论的总体图景中，邓小平的发展观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 1.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形态

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从认识史的角度看，都是对以往思想理论的继承，又是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而作出的发展，是认识的继承和发展的结合，或者说是认识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也应作如是观。在这一场由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接力赛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代表着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他们传承着具有共同的内在逻辑与基本思路的接力棒，并结合时代变迁把发展理论都推进到新的水准。特别是对后继者而言，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前人所创立的伟大理论。因此，邓小平的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形态，是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思想的继承、拓展与深化。其中既有贯彻始终、体现出共同精神实质的哲学基础，也有由马克思晚年提出设想，经过列宁、毛泽东的曲折探索，直到邓小平这里才得到较为圆满解答的跨世纪难题；既包含着对原有的传统观念的纠正、修错、反拨与廓清，也提供了渗透在一系列具体决策之中的有关“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篇颇为踌躇的大文章方面所作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答卷。

同时，作为当代颇具世界眼光的政治家，邓小平十分注意由于社会发展世界一体化趋向、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和作用而引起的发展加速度化、快节奏化的特征。他顺应历史潮流，明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对“现代化”、“发展”的内涵给予了新的诠释。这就是：“现代化”、“发展”不是一般的富国强兵，不是一种量变的平滑的前进，不是一种低速度的运动，而是以大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的全方位的大嬗变，是落后和不发达国家赶超先进和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故而是飞跃式的发展，是一个台阶向另一个台阶地不断跳跃的发展，是一种以高速度或加速度形式出现的发展，是一种质变的发展。同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从一般的生产力跃迁为第一生产力，当代实践观念也获得新发展。大生产化、系统化、信息化和高科技化的实践活动要求突出敢闯性、创造性、发展性、主体性、时机性等实践精神。这使邓小平发展观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点。

还有，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构想中，社会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化高度发展以后的社会形态，因此，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无所谓现代化的问题。但实际上，以后社会发展的情形恰恰出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想，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建立起来的。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从现代化历史潮流的演化来看待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化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比“资本主义方式”“更快、更好、更合理”的实现现代化的方式，结束了现代化便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传统模式，为世界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理论开拓出一个新领域，为后发展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而必将对世界的未来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

## 2. 西方形形色色的发展理论的超越形式

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看，“早发内生型”的发达国家已经完



成了工业化、现代化的使命，处于从现代化向“后现代”转换的过程中。现代化作为一种结果，既使它们感到优越，同时又令其感到迷惘，因为现代化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伴随着众多的社会危机与人的异化，使人们不得不同时经受“现代化痛楚”的煎熬。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又称发展学或发展研究）虽自诩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理论范导和政策示向，主要研究特定历史阶段上人类社会形态转变的动力、特征和模式范型，但从整体情况看，基本上都陷入了误区和空谈。

在早期的发展理论中，无论是40年代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还是50年代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以及60年代费景汉、拉尼斯对“二元经济”发展道路的探讨，都是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出发，对近代以来西欧、北美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进行单层次的经验描述和实证归纳，并把所描述的经验事实视为现代化的最佳模式和落后国家学习的榜样。60年代中期以后，早期发展理论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论调倒是受到某种程度的责难，只对发展过程某一方面作粗泛的宏观分析的旧框架也开始突破，从而形成一些新的理论分支和流派，如发展哲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文化学以及“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例如佩鲁把发展问题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加以认识，并把“人的活动及其发展”这一命题作为发展理论的“一般研究路线”；布莱克和巴林顿·摩尔批判并否定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美国化的谬论，论证了世界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多样化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应该说，上述论点触及到了发展目标的全面性、综合性、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民族性等问题，因而视野有所拓宽，但并未反映出落后国家本身的真实状况，依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最终摆脱不了“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观念的羁绊。如果说，这些发展观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性色彩，那么到了后现代主义学者那里，整体

哲学观上的无标准、无主宰、无规则、无体系的相对主义特征，就使他们的发展观更染上了颓废、荒谬的色彩。这种发展观除了以曲折的形式反映出后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困境之外，其偏激的观点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与这些迥然有异的发展观相比，邓小平政治家的视角与注重实践的品性使他较之一般学者更显示出观察、分析问题的独特性、深刻性与可操作性。邓小平虽然没有研究过西方发展理论中具体的人物与流派，但西方社会的问题、症结、特征他是把握了的。一方面，这些问题启示人们对发展的方向进行多方界定，进一步破除现代化即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观念；另一方面，其中所凸现的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性危机”、“两歧性矛盾”也警示后发展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注重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邓小平的发展观正是以关于社会有机体系统全面运筹的辩证思考和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一再强调，把自己的设想具体运用于实践，并获得了成功，从而超越了西方形形色色的发展观。

### 3. 诸多现代化建设“方略”之上的科学建构

“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邓小平在特定场合下的这一表述，反映出他思考问题时的一种习惯视角，即十分注重对历史的分析及其经验的总结。翻阅《邓小平文选》，到处是这种对历史反思和总结，而且涉及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中共党史、社会主义史，还涵盖中国近代史、不发达国家革命和建设史、世界现代化史，这位颇具“世界眼光”的老人同时充满着深邃的历史感。而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我们注意到，他相当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建

设经验上，历史上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建设经验成为他设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蓝图的思考背景与支撑点。在总结的基础上他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建设“方略”。

在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经济建设，是多少仁人志士苦心探索过的难题。中国近百年来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为此做过不懈的努力，但成功的程度有限。早期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龚自珍等筹划了“海国图志”，欲从中寻觅“富国”之途，严复等译介西学，致力于中国人精神观念的改变，到洋务派那里，在“中体西用”的模式中真正展开了“尚富强”的实验。但内忧外患再加上这些设想过多的空想成分，使其都化为泡影。此后，诸如章太炎等敏锐的思想家在中西对比中既看到中国落后的情形，但也注意到西方现代化“俱分进化”的后果，即物质财富的积累以道德水准的下降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疏离为代价，从而主张不能“唯洋人马首是瞻”。孙中山总结先贤探索之成果，又结合时代变迁做了新的构想，他的《建国大纲》成为民主革命时代国家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造性杰作，其中的“民生”策略诸如兴办铁路、交通和土地政策都触及到中国改革的现实具体问题。但是在军阀连年混战、政客争权夺利的情形下，孙中山的这种“天下为公”的愿望就只能被抛诸脑后或束之高阁。而后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也使其不可能将过多的心思与力量投入到国家建设上来，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步履只能或停滞或受阻。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共产党的领导，使国家建设有了稳定的政治基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确实有了大的增强。然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是一项没有先例的事业，我们在探索中也经历了相当多的曲折和失误。或者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超越发展阶段，搞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致使比例失调，人民生活长期贫困；或者根本偏离经济建设大方向，搞“以

阶级斗争为纲”，把发展生产力诬为“唯生产力论”而加以批判，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情形看，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特别是在苏联形成一整套僵化的管理模式和低效率的运行机制，发展到极端，成为导致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重要内在原因。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南美，在经过长期斗争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在经济自立和国家发展的道路上也未取得成功，相反大多数国家仍然长期依附过去的宗主国或西方发达国家，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体系”当中，贫困面貌未见改变，而“南北问题”愈益严重。

所有这些建设思路与方略都促使邓小平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身存在的问题与过去理解之间的差别。针对广大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产生过的“全盘西化论”与“单纯本土论”的争论，邓小平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同时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实行对外开放。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现代化建设中目标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终结了混淆二者而又偏执一端的糊涂观念。针对过去“左”的路线长期盛行，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纯”和“高”，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指出不注意这些情况，“中国只有死路一条，社会主义只有死路一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究竟谁优越，最终还要看谁发展得快，谁发展得好；要让人们相信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也得靠它的发展。为此他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在社会的发展中改革是动力，因此邓小平把改革提高到“第二次革命”的高度来认识。他十分深刻地批评了过去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陈腐观念与僵化体制，提出必

须“有一个大的改变”才能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实践。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不敢冒，说来说去就是害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据此他要求：“不要争论”，干了再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改革是一场革命，邓小平在强调“大胆改革”的同时，也充分注意到要“稳妥有序地推进”，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针对过去不顾后果，一哄而上的教训，邓小平要求遵循“先易后难、由点到面”、“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处理好“改革和稳定”的关系，不能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充分考虑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逐步实现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与发展。

我们看到，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事实上建构了一整套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方略体系，较之过去不无教训可言的历史经验、较之各种包含着空想成分的“建设大纲”，不用说这一方略体系是更加科学化、更具备可操作性了。

### 三、本书的角度、内容与逻辑安排

至此为止，我们的全部论述不过是为了廓清进行邓小平发展观研究的现实和理论情境。我们遵循了这样的逻辑思考路向：世纪之交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而发展问题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进程，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后发展”问题的突出是这种矛盾性的重要表现；而邓小平的发展观是惟一在实践中思考又及时地运用于实践，并成功地探索了

像中国这种类型的“后发展”国家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的理论体系；接着我们将这种发展观置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总图景中观照，分析了它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和各种现代化建设“模式”和“方略”的拓展、扬弃和超越。前提问题得以解决，接下来就应当说明一下笔者对这一发展观进行阐释时的分析角度、论述重点与逻辑安排了。

我们知道，邓小平新时期的思想被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内涵颇广泛的体系，发展观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我们注意到，在特色理论的宣传与研究呈热潮之际，关于邓小平发展观的研究却相对显得冷僻，至多只是有内容涉及而无意义拓展。同时相当多的著述只是就邓小平论邓小平，很少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中去凸现其作用与意义。基于此，我们确立了本书写作的角度与重点是，既注重从邓小平本身思想出发再现他对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思考，又力求把这种思考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理论与实践的背景中，在整体中观照，在对比中分析，从而显示其独有的价值；而在具体阐释其思想时，我们也不想重复人们习惯了的现象罗列与内容详述，而着重突出邓小平发展观的核心与特色。因为视角的新颖，还要求同时具备立论的独到与深邃。

鉴于上述考虑，本书首先设一章对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与过程”进行分析；之后，对其“核心与特色”进行“总体观照”；接下来分三章叙述其“立足于当代实践的分析构架”、“作为现代化新型实现方式的‘社会主义’”、“对‘后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设计”，寓内容于特色之中；最后分三章论证邓小平发展观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其中前者通过与其他形式的发展理论的对比、辨析凸现出来；后者阐述了它所指导的中国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及其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性事实”所具有的深远影响。

当我按照上述思路为阐释邓小平发展观而认真阅读他的著述及相关材料的时候，课题之外的感慨却频频涌来。我清楚地知道，我这一算得上理性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却有抗拒“时尚”的意味。改革开放20年来，各种社会思潮波澜起伏，犹如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进入90年代，学界更是出现了一种哲学不沾现实和政治的边的现象，并刮起了一股“驱逐政治性学术”之风，认定那样做是在做“政治文章”、“风头学术”。即如邓小平研究，有的论者就固执地认为，它带有更多的政治、宣传色彩，因而是党政机关、报刊宣传工作者的事，而学术研究应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为政治结论做论证，从而保持学术的“纯洁性”与形而上色彩。我就遇到过不少学者，有的是老师，当听说我们以邓小平发展观为题来展开研究时，坦言说：这是一个过几年便要过时的题目。

这里除了对这种说法表示不以为然，我还想对这一有关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流行见解提出质疑。应该说，学术研究本身不存在研究对象上的限制，任何社会现象都可以纳入研究范围，存在的只是对对象把握得是否全面、客观，探讨的角度是否新颖，分析得是否透彻等问题。政治现象与结论无疑会影响研究者的思想，但只要是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就没有回避的理由，只要是正确的结论我们就没有拒绝接受或认同的权利。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玄思冥想，不关注现实的哲学没有生命力，与现实实践“绝缘”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枯萎。邓小平发展观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当今中国首要的和基本的现实，实现现代化体现着几代中国人的探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我看到中国的未来和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希望。正因为如此，我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并认为从总体上把握其核心与特色，由此引发对民族、世界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是当

代中国学人应尽的责任与承担的使命。

当然，我不是绝对论者。我认为，哲学在联系实际、探讨现实的同时，却不应降低为现实的附庸，不应失去自己的科学性、完整性和独到性，不应失去自己的反思性、批判性。同时，我还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形态，邓小平发展观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从邓小平发展观中不能找到解决当代后发展问题的所有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这种理论本身，只能说明自己未能从本质上把握这一理论。因为它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记得海明威在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谈到写作甘苦时说：“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它”，“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的确，根据水面的八分之一去透视海里的八分之七，进而把握冰山全部，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本书的研究课题而言，对于像邓小平这种行动多于议论、实践多于著述、思考多于表达的革命家，要准确而完整地理解其理论，就更为困难。因此，当我下笔写作之时，没有任何轻松之感，相反每一步都惟恐偏离其理论实质与特点、从而不能透析这种实质与特点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当然，不管最终奉献给大家的作品情形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是我认真研读、反复琢磨、再三思考、真诚探究的结果，是理性思维的产物。

我希望，我还是能够有所收获的。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86。

《海明威论创作》，第1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79。





# 第一章 复杂情势下的艰苦探索

任何科学理论的产生都有其复杂的历史、现实背景，并且有一定的形成过程。邓小平的发展观也不例外。概括、分析它产生的背景与过程成为把握这一理论本身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

## 一、背景分析

邓小平真正展开其发展理论的实际构想是在70年代末期。他政治上第三次复出，又开始了“新的长征”。当时的背景极其复杂，仅从现代化进程看，新中国建立28年，几经磨难，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现代化“三次提出、三次流产”；而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当时已处于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转换过程中，他们在欣享现代化成果之时也经受着“现代化痛楚”与“发展性危机”，现代化呈现出深刻的“两歧性矛盾”；而广大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却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踽踽缓行，步履艰难。所有这些，成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思考现代化与发展问题的参照系与现实支点。

### 1.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次流产

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并不是邓小平首先提出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在致力于民族的奋起与富强。然而

旧中国几代仁人志士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他们以血与泪交织的代价破除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梦想，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历史多曲折，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中国的崛起有了政治基础与制度保障，但由于各种原因现代化建设又经历了波折。每一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提出，都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曲折，最终的结局是现代化的流产、“左”的思潮的复起。在这种历史变幻之中，邓小平是新中国建立后三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主力，这也是其遭受“左”的路线打击迫害的主要原因。

1956年，在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第一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由此开始。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进入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核心层的邓小平也提出“革命任务”的相应转换与调整：“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一再强调，党在现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中国共产党那时候对现代化的内涵、手段、方式的了解很不充分，仅仅是一种要富国强兵、要发展的主观愿望基础上的“向自然开战”的片面理解。很快，毛泽东提出“15年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18页，人民出版社，1999。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8页，人民出版社，1999。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94。

超英赶美”的口号，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使实现现代化转化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换句话说，是以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完全违背客观实际，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灾难。如果从邓小平后来强调的社会的整体发展需要一个合理的“机体、机制”来看，这次现代化运动实际上就是由于严重损伤了社会机体的平衡、损伤了社会机制的合理运行而导致了事实上的流产。

1964年，中国经过三年困难、三年调整，开始了第二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周恩来在年底的第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然而，由于在此前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当然他也讲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使意识形态领域中“左”的错误倾向再次抬头，且愈益严重，党的领导人在对形势的估计和一些重大调整政策上的不同意见逐渐显露出来，指导思想上的两种趋向在不同领域并行发展。到后来，错误的发展趋向压倒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坚持经济调整与发展的路线被斥为右倾而受到孤立。结果，人们对“四个现代化”“反应冷淡”。邓小平在总结整个第二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时，说：“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整个神州大地的时候，中国的第二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便又流产了。要搞建设、搞现代化就必须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在“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指导思想下这种逻辑只会顷刻瓦解，所以历史决定了这次现代化也只能是短暂的。

中国的第三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在1975年初十年内乱行将结束之时开始起步。首先是，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同年3月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强调：“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并连续抓了铁路、钢铁、教育科技和党风等方面的“整顿”工作，以此为现代化创造条件。但这又触犯了“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禁条，各种阻力越来越大。1975年底，邓小平被停止工作，翌年春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第三次现代化运动又不可避免地遭致流产的命运。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次提出，三次流产，促使邓小平和所有的人深思，是不是中国不需要现代化？是不是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都不是。历史充分说明，现代化涉及到对中国的根本矛盾、根本道路、根本方向的认识，涉及到中国社会深层的极其复杂的矛盾。而现代化流产的原因在于：

首先，“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的错误。“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6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在于此。然而，传统的“左”的观念及对政治的过分热衷，视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把政治与经济严重对立起来，并不惜以政治消解经济，这样的土壤里，注定是扎不下现代化的大树之根的。

其次，没有用科学的观念来看待现代化。现代化的成功首先在于对它加以科学、理性的认识，而我们却失之偏颇，主要的是未能从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角度来看待现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94。

化问题，未能把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看作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而仅仅把它当作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甚至主要是一个钢产量的问题，同时又以为经济的发展可以在一朝一夕通过激烈的群众运动来实现，这就否定了现代化的基本内核，脱离了客观经济现实，不能“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自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第三，没有从世界历史演化的大尺度来看待现代化。“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在这种发展中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以为关起门来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这当然“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而蔑视知识、贬低知识分子的做法更是与此背道而驰。邓小平激忿地把“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叫做‘崇洋媚外’”的说法斥为“蠢话”。正是这些“蠢话”几乎葬送了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前程。

邓小平既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又因此而遭逢劫难。所以他对现代化的曲折历程有着极为透彻的理解，正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次大曲折中他不断反思、不断总结经验，最终用新的眼光去看待现代化，从世界大尺度、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竞争、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改革开放的新坐标出发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重新进行了定位与思考。

这是他发展观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

## 2. 资本主义“后现代”社会的来临

正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在探索中出现曲折的时候，二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几经危机、调整、跃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我们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着眼，考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93。

虑到较之后发展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实际情形，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并且又出现了新的现象与趋势，而这些现象与趋势某种意义上恰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反拨、深思和批判，故把这一进程称之为“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换。有关这一时期学术界有不同的提法，比如“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大跃进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工业社会”、“高级现代化时代”、“后现代社会”等。

迄今为止，人们关于现代化实现的指标参数的理解也歧见丛生，很难达成共识。不过大多数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以之衡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现代化最显著的标志，首推经济领域的工业化与社会领域的城市化。

作为“先发内生”现代化类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走向资本主义的漫长历程”中，还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兴起”时期，乃至“大衰退”与危机时代，主观上“他们都必定要把经济增长列为（现代化中）最关键的特征”。两次世界大战虽然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受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大战之后仍然风波迭起，矛盾百出，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基本动力的私人投资获取利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调节，以至国家干预和国际范围的广泛合作，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促进了经济以循环的形式不断高涨。特别是60年代以来，

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第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4、89、148页，东方出版社，1986。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的经济增长：发现和思考》，载《美国经济评论》杂志，第63卷。

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更将经济增长推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创造了远胜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的300多年的成就”，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推向了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经济增长的后果之一，是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其中包括劳动力中体力劳动比例的相对缩小与城市化程度的明显提高。而前者表现为劳动力所占比例的下降与科技人员数量的增加两个方面。以1992年的美国为例，劳动力所占比例不足1%，而其中科技人员却有120万，占整个劳动力的17.5%。后者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从反映城市发展的一般指标看：市镇人口比重增大，已占全部人口的90%以上，市区人口已达80%；城市数目大增，规模扩大，城市相对密度比战前增加了70%以上。从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指标看，基础设施中自来水普及率达98%，每100人中有电话人数40人，每万人中有医生数、商业服务人数分别达50人、67人，人均绿地面积12.5平方米；文教事业方面万人中有大学生人数达500人、人均拥有图书馆藏书量100册。

从生态环境方面讲，大多数国家从60年代起就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注意到生态环境的整治、保护与培育等。

至于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是一种可以从不同角度予以分析，因而结论未必会有一致的指标参数。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自由的秩序与法西斯式的镇压相伴，慈善、正义、友爱与道德败坏、腐化堕落、欺诈敌视同在。个人的自由被奉若神圣，但却无时不感到物质和精神的压抑，处处有人道的丧失和人性的异化；成套的法律、法规和密布的警察、监狱之下，是有增无减的吸毒、抢劫与谋杀。正是基于后一方面的情形，旨在对全部“现代性”进行审视、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



潮应运而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物”的层面上完成工业化、现代化之后，在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态势、新趋向。

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即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换，给予人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其一，要从“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的划分转到“两制并存”“合作共进”。如果说，毛泽东在60年代注意到整个世界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情况，以“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突破了斯大林提出的“世界已经分裂为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两极对立思维，那么在世界格局再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便不能教条式地囿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些词句和个别结论。当代资本主义走在现代化的前列，而且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发展，仍有巨大的潜力，为此邓小平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角度，提出“和平共处”、“相互合作”的问题，他认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由此实现了由“拒斥资本主义”到“利用资本主义”的策略转轨。

其二，资本主义不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佳方式。虽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世界现代化的前列，但它们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作为这种现代化的后果，警示后发展国家“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极分化”始终是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资本的“自私与贪婪”造成的只能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特别是在当代，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事实上也走不通。

其三，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与突破口。

参看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第7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93。

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多次科技革命就像多极火箭，把现代化引向更高的发展，当代社会经济的增长与社会进步越来越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科学技术已从“一般生产力”成为“第一生产力”。

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给予邓小平思考中国发展问题的“背景启示”。

### 3. 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艰难步履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之一麦里安·丁·列维曾从“现代化的前景”的角度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社会或地区”更具体地分为三类：先行者。这一类国家的现代化已发展了很多年，并且没有任何模式、榜样可以引导他们。这包括了英国、美国和法国。早期的后来者。许多欧洲国家属于这一类。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和先行者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日本、苏联也归入这一类）。其他的后来者。这一类国家此前与先行者基本上没有接触，直至这些国家进入发展阶段，交往才频繁起来。在本书中我们所研究的后发展国家指的就是列维所说的第三种情况，即邓小平所说的“广大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

作为“后发外生”现代化类型，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是在外部条件的刺激和胁迫下强行启动的，而并不是社会内部现代性因素逐渐积累的结果。尽管它们意欲通过政治改革，比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等来加强内部的整合、摆脱殖民统治，然而这并不能使它们完全摆脱宗主国的影响以及政权更迭、政局动荡的命运；即使是那些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政治环境的国度，在实际发展中也交织着复杂的矛盾，出现了特有

的错位、失衡与两难窘境。

这种错位往往是双重的，既表现在传统的瓦解和现代性因素的生成的异步性造成的错位，也表现在突然提出的新任务与正在形成的能力之间的错位。前者因新旧制度、社会结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的“断层”而带来一系列“真空”或危机，随之而来的是自我认识、目标和手段的混乱甚至颠倒。后者既体现在政府的能力上和行政系统中（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政府软弱无力而又没有形成一个完善而有效能的行政系统），也体现在推进现代化的社会力量上（科研人才、管理人才严重缺乏，不能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需要，现代化缺乏经久不衰的内在动力）。

被强力推上现代化之路的后发展国家，由于缺少足够的内动力，所以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一进程在所有地区展开，而往往是从某些地区，特别是那些条件相对好些的地区首先开始，其结果就是在传统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形成一些规模和范围都极为有限的现代化孤岛，也有人称之为“增长极”。久而久之，这些国家就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元结构（或二元经济、二元社会）”：传统的地区和部门与现代地区和部门互相封闭、排斥，城乡关系恶化，工业和其他现代经济部门大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农村的经济则是传统的农业；城市中的现代经济系统多与国际市场、发达国家发生联系，而传统农业生产部门却被甩在外面，越来越“传统”和落后。这就是所谓的“失衡现象”。

既要前瞻世界发展领先水平与本国在这个并不公正的世界上的地位，又要后顾本国的实际状况与人民的基本要求；缺乏现代化内在动力，却要在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任务的艰巨与时间的短暂的冲突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窘境”，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充分表现出来。经济上，出于增强国力的考虑，它们曾实施过“增长第一”的战略，但是仅仅有国民生产

总值的增长并未能解决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而当它们转而采取“边增长边分配”、“公平增长”、“基本需求”等措施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又放慢了。政治上的两难窘境表现为强化政府能力、稳定政治秩序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现代化内动力缺乏、社会力量弱小要求强化政府职能与地位；而民族解放斗争造成的超常政治动员和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示范效应”，又使人民的参政意识和参与意识超过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并由此形成一种要求建立民主政治的巨大压力。无论是选择政府还是相反，都必有一失，政治动荡不可避免。两难窘境在文化上的表现较之经济、政治更微妙一些。不同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不尽相同，但随着现代化的引入，内外两种文化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摩擦与冲突。严重的则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由此又必然会带来深层价值观念的混乱。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错位、失衡现象与两难窘境，使后发展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艰难。这种情况说明：

第一，后发展社会的不发达与发达社会的发达之间具有相关性。二者都从传统农业社会起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些国家通过殖民化完成原始积累，最终走出传统农业社会，完成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另一些国家由于被殖民化，加速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瓦解，却无力完成原始积累，缺少工业化的条件，成为后发展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关系”。

第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只能选择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除东非、南非、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外，亚洲、北非、西非及墨西哥、秘鲁等昔日的殖民地区和国家已进入较发达的农业社会，这使得后发展社会不再有原来发达社会的原始积累条件；另外，发达国家的现实存在不仅给后发展国家以可利用的条件与经验“启示”，而且用它自身的矛盾与危机警示后来者不能重蹈其覆辙。起点与各种现实条件、背景的不同决定了后发展国家只

能走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道路。

第三，后发展社会内部的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后发展社会时空跨度宏大辽阔，历史、文化、宗教、社会制度等各不相同，受帝国主义侵略、剥削和现代性渗透的程度也不等。因此，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必会有所差异。亚洲“四小龙”和日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中国与印度也要“独立思考和解决”“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邓小平所面对的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背景”。

在此基础上，他怎样展开自己的思考与构想呢？

## 二、形成过程

理论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形成的。从理论的自觉及其对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而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为什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成为邓小平重新崛起的一个转折点？这就必须追溯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的思想与实践。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整顿，以及围绕这一整顿展开的斗争，为粉碎“四人帮”并进而否定“两个凡是”的观点，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做了思想准备。邓小平自己也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但如果以1975年作为邓小平形成其发展思想的起点，就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时他提出的思想和做法，会被说成“右倾翻案”？这就要求考察“文革”以前邓小平的思想。据现有资料，邓小平在1956年与

1957年就已经提出了“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原则”要适合于中国实际情况等观点。这样我们的分析也必须上溯到那一时期。

### 1. 思想的探索

1956年，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在中国已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或者是说如何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中国发展的问题，也十分现实地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其时，已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邓小平，参与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了他对这一课题的思考。

一方面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主要的任务已转向“搞建设”；另一方面，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暴露出的严重缺点，特别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他又强调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原则，“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求共产党接受党内、党外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这三个方面的监督，以改造党的思想和作风，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从实际出发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上述观点见于邓小平在1956年11月的《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1957年4月的《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和《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等讲话中。可以看出，在50年代中期邓小平已经有了关涉中国发展的初步构想，其中包括有关这种发展的立足点、方法、手段和执政党保障等。应该说，这是当时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共识，而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的独创。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94。

然而，崇尚务实，立足实践，并力求寻找达到理想的现实途径的个性与品格，使邓小平对这些构想的理解更有一种理性的自觉。

邓小平的可贵之处更在于，在党的指导思想转到“左”的轨道上之后，他仍然坚持上述正确的思路，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之。其主要线索有：1962年7月7日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有些地方农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做法，并引用刘伯承经常说的一句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形象地论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看“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观点。这和毛泽东的主张是不同的。在这前后，由邓小平主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工业七十条》，提出了国营工业企业既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又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的观点，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观点，企业的技术工作由总工程师负全责的观点，企业的职工实行代表大会制度的观点，等等。诸如此类的事实表明，邓小平在60年代初期已经把“从实际出发”的哲学原则推进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比50年代中期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对于从中国特点出发寻求发展之路，已经有了一些“体制上”的初步设想。

之后，为中国的发展忙碌了十年的总书记被撤销了除党籍以外的一切领导权，被声讨、批判、下放劳动。然而，时刻萦绕于他的脑际，挥之不去的，仍然是关于中国现代化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常在“闲暇”里学习与思考，为他日后的“东山再起”作了厚重的思想铺垫。

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5年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复杂背景下，他毅然提出要在安定团结的前提下，以整顿为纲，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有步骤地在军队、工业、农业、文艺、教育等领域抓了整顿问题：即端正思想、整顿秩序、重组结构。在1975年8月18日《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

见》的谈话中，他讲了以农业为基础、引进技术设备、加强科研、增强企业管理、抓好产品质量、建立责任制、物质鼓励等七个问题，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一些改革开放思想的萌芽。特别重要的，在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中，还指出：归根到底，我们要以生产力标准作为区别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真干革命与假干革命、真干社会主义与假干社会主义的“标准”。这个论断显示出邓小平坚定的唯物主义态度。邓小平1975年的思想与实践，确实“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但时间不长，再次遭到否定与批判。当然，也正是在这种反复中他的思想经受了检验，成为日后他提出完整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思想的前奏。

## 2. 命题的提出

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的十二大，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提出时期。

清理与正确评价历史遗留问题，恢复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优良传统是社会走上正确轨道的重要前提。面对整个国家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小平首先抓住了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前后，他就以各种方式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如果说8月的十一大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左”的错误的影晌未能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那么翌年5、6月间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



“一标准”的讨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却推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在此基础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与转折点性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等四个鲜明问题，实际上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掌握了主动权，开始大规模、有步骤地解决遗留问题，调整各种关系，推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

“左”的错误刚刚纠正，“右”的思潮又起。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79年的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鲜明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1981年又多次重申，并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多年来“左”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作了公正、客观的评价，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历史地位，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观点，为社会主义事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和思想基础。

在拨乱反正的同时，邓小平积极推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思路。他首先恢复生产力在社会有机体系统中的“王位”：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阐明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础；从社会主义“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出发，阐明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通过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阐明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从理论上阐明这些问题的同时，他又果断地使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结合已初步展开的改革实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方

针和战略进行了阐释与部署。

检视这一阶段邓小平的讲话与著述，我们会发现一条完整而明晰的思路。如果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是我国进入发展新时期的宣言书，那么《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等阐述的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对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意见》（1980、1981）、《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1981）等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一系列政治原则和政治界限；《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等则论述的是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改革开放问题。由此可见，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关于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关于要实行改革开放的观点，关于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观点，关于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观点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或先或后形成的。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经过这个时期的思想酝酿，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邓小平发展观的重要命题。

### 3. 轮廓的形成

从党的十二大往后，时序推移五年，到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邓小平发展观基本轮廓的形成时期。其标志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论及其适应这一阶段论的基本路线的提出与阐释。

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向纵深推进，邓小平及时总结经验，充实、完善上述命题。他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

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他认为当时“国外有的人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的含义不准确，这一观点看来比较客观”。而按照马克思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在充分认识我国“总的社会经济面貌没有改变，我们人民的生活始终处于贫困状态”的发展状况的前提下，在1987年8月29日会见意共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明确提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通观这一时期邓小平的论著，可以看出，他先后发表的《一心一意搞建设》（1982）、《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我们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1984）、《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984）、《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我国方针政策两个基本点》（1987）、《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1987）等重要谈话，都体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的实际经验，并通过这种概括和总结明确了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揭示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点。

还需指出，这一阶段，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党的文件中对初级阶段理论的阐发也由针对不同问题的零星揭示逐步过渡到从社会发展的全局上立论。这经历了一个过程。理论界对此鲜有梳理，我们特在此作一甄别。

有的论者认为，毛泽东在1958年郑州会议上已提出“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概念；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只是这位富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93。

吴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载《人民日报》，1986年5月5日。

创新意识的伟人零星闪烁的思想火花，这一概念他既未在理论上详加阐释，在以后的历程中也未反复重申或一再坚持。新时期意义上的“初级阶段论”的萌芽是1979年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用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不过它的主旨是要说明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尽管还不发达），借以批评那种认为我国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观点。邓小平在讨论这一报告时，明确肯定了上述提法，认为“是客观的”。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不过强调的仍是进入社会主义，同样是针对当时一股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而讲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不发达”，但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里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建设精神文明，是针对一些人提出物质文明不发达，精神文明建设无法展开而说的。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1986年《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重申了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点，不过当时是针对道德建设而言，指出初期阶段的道德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要求过高。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20页—221页，人民出版社，198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8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87。

超越具体问题、从全局出发对“初级阶段”作阐述的，是中共十三大。1987年3月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座谈、讨论十三大报告提纲之后，就草拟报告的总的设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强调，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根据，“因为以此立论，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邓小平赞称“这个设计好”。在此基础上，十三大研究与论证了当代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概括与阐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分析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个“凝聚了全党智慧”的报告，也集中地体现了邓小平当时发展思想的意图与总思路。

#### 4. 体系的建构

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到1993年10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是邓小平发展观理论体系建构时期。其中他1992年视察南方发表的谈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十三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更加全面展开，其间虽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内也一度出现政治风波，但中国的现代化之舟在邓小平的指引下乘风破浪，继续向前。改革由农村到城市，进而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教育体制直至整个社会系统工程的整合与运作。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总结了过去十多年的经验，邓小平宣告：党的基本路线与十三大的决策不变。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原则。

转引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来龙去脉》，第9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

1992年，邓小平不顾高龄，南巡6000多公里，沿途发表的蕴含着巨大思想解放能量的谈话震撼了中国，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观点，关于“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观点、关于“稳定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观点、关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的观点等等，充实了他的发展观内容，把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如果说此次南巡向全国发出了掀起新的改革开放高潮的总动员，那么，5月他视察首都钢铁公司则意在解决已成为改革难点的大中型企业问题，使改革向纵深挺进；而10月会见党的十四大代表使全国人民的情绪达到高潮。有人形容，一年中邓小平“这三次露面使中国人民三度形成兴奋中心”，“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象征”。

1993年10月，汇集了邓小平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初视察南方这一时期119篇著述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它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清晰的发展脉络以及朴实、简洁的语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这部著作与经过修订的《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一起，前后衔接、相互贯通，标志着邓小平发展理论体系的建构的完成。诚如十四大政治报告所指出的，邓小平的特色理论（自然也包括发展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这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理论。

英国《金融时报》，1992年12月9日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5页。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16页。

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莱尔曾经写下这样的话：“在世界历史的任何时代，我们发现伟人是他的时代必不可少的拯救者，是离开了它干柴就不会燃起来的火花。我已经说过，世界的历史就是伟人们的传记。”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看，此种见解似乎有些荒谬，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深藏于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中，归根到底作为物质生产和生活主体的、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推动者、创造者和主宰者。可是，肯定这一点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经济决定论者一样，把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贬低到可有可无的地位。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在上述前提下肯定了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尤其当某些伟大人物代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顺应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需要，积极地从事一些重大的历史活动时，他们的活动常常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伟大人物既是他自己，同时又不仅仅是他自己。他是一个“集体人”，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化身和代表。

在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邓小平发展观的梳理与阐释，既是在诠释邓小平本人的思想，更是在探索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现代化课题。

## 第二章 总体观照：核心与特色

在初步完成对邓小平发展观形成的背景分析与历程梳理之后，本章拟对这一发展观做一种总体上的观照，着重分析其特色与核心。一个基本的考虑是，作为一种孕育于实践之中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在不同的议题中贯穿着相同的原则与核心，在对各个部分的阐释中凸现出整体的特性；诚然可以单独抽出来评说，但必须先熔铸在一起给予观照。因为理论研究与思想实际形成的顺序正好相反，“先立其乎大者，其小不可夺也”，只有先从总体上把握准确，才能在对具体内容的论述中不致偏离方向或产生歧解。

### 一、中国：当代后发展的典型形态

邓小平发展思想和现代化理论的着眼点自然是在中国；然而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作为现代化中的后发外生类型，中国本身却熔铸着后发展国家的各种典型性因素，体现出后发展所具有的诸多矛盾与难题，代表着后发展问题解决的大致趋向与总体特征。后发展国家之间的情形或许不同，但它们之间各不相同的情况却可在中国这个现代化因素颇为复杂的东方大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或体征。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后发展中最大最典型的课题；中国的发展对后发展问题的解决具有关键性意义。

中国的这种“典型性”，充分反映在其基本国情之中。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曾认为，影响和发动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因素有五个：

- (1) 人口——数量的组成及地理分布；
- (2) 资源或物力——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
- (3) 社会制度——人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布；
- (4) 生产技术——着重于发明的应用；
- (5) 企业创新、管理的才能——改变生产函数或应用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或应用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

此外，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以及进入现代化的时间和国际环境等，都不可避免地对其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发动因素究竟是怎样的呢？似可作如下的概括：

(1) 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基础脆弱。已经迈进21世纪的中国，人口接近13亿大关，并且还在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人口素质低下，老龄化问题过早降临，更给现代化带来多重困难和障碍；由于人口基数大，虽然很多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源相对短缺，而且分布不均，配置错位，人均资源占有量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并非优越的地理位置、异常变化的气候条件、独特的自然环境、幅员辽阔的国土面积等客观因素，造成中国生态环境先天不足。近年来，中国的生态环境有日趋恶化的趋势。未来的中国将以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历史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活动能力。

(2) 中国的人均国民产值1997年仅达600美元多一点，排世界100位之后。工农业产品的人均产量大部分低于世界的人均产量，有的仅及世界人均产量的1/5和1/3。教育科技发展落后，每万人中有在校大学生人数美国为500多人，加拿大、俄罗

斯均超过200人，而中国仅20人。而目前世界文盲人数近10亿，中国就占2.3亿。科学技术水平总体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30年至50年。各个产业部门之间技术发展很不平衡。农业主要以手工劳动为主，技术装备水平远低于工业交通部门，而工业交通部门技术装备水平差和生产工艺落后的问题也很突出。教育、科技落后，是中国发展水平落后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整个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差，且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另外，经济发展不平衡还表现在技术发展水平上，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手工业同时存在；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和手工劳动同时存在；在经济结构方面，一部分具有工业化、现代化因素的城市与广大的处于自给自足、半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村同时存在；资金短缺和人力资本短缺问题十分严重。资金短缺不仅表现在绝对量较少，而且由于资金的积累机制和利用机制不健全，已有资金得不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其相对量也非常少。中国的人力资本短缺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和政策上的重大失误，使短缺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力资本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3）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目的决定了中国可以统筹规划自身的发展，设计发展的道路和模式，预定发展目标，并且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这种设计式的发展踏踏实实推向前进。当然，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还不完善，体制改革与创新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4）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农业文明历史亘古绵长，状态典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没有首先产生现代工业文明，并在1840年以后，一再失去现代化的有利机会。1949年以后，中国在现代化的曲折中走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

的文明对中国现代化而言，既是一份丰厚的遗产，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从以上并不完备的概述中，可以看出，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集中而又较为完整地体现出后发展国家明显的优势和劣势。优势是：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可以直接引进世界比较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技术人才和资金、企业组织制度等，实现跳跃式发展，缩短现代化时间；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下，通过全方位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促进经济结构迅速向现代化转变。劣势是：起步晚、经济技术水平落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现有的世界市场和主要的国际性经济组织基本上操纵在发达国家手里，后发展国家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后发展国家大都受种种因素牵制，负担沉重，如不能及时抓住机遇，将被甩出更远的距离。

具体到每一个后发展国家，或许并不具备以上的全部特征，但总括起来，中国的情形以放大囊括、包容涵摄、典型体现等不同形式反映着后发展国家所处的境况和所具有的难题。或者说，大部分的后发展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分有”了这些特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成为后发展的典型形态。很显然，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也就不能不是他对整个后发展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这就是典型所体现的普遍意义。

## 二、设计：驾驭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主导方式

在当代，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系统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人类高度自觉与高度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如果说过去人类在现代化的起步与发展中，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先发内生型国家，社会基本上是在半自发状态下发展的，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进行活动，相互之间形成“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作用，一只“看不见的

手”在操纵着社会运动。那么，在当代，社会问题的综合化、总体化，方法、道路的多样化、交叉化，价值选择的复杂化、多元化等等，就要求人们以高度理性的态度、长远的目光来设计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前进得更快、更合理。特别是对于发展与现代化这样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其方向、趋势、道路以及这一道路上各个阶段、环节、要素、侧重点等等，都要求作出总体性的构想，减少盲目性，增强自主性。

以之观照邓小平的发展观，它不仅对中国乃至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着客观的把握与理解，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与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它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统筹、严密、长远的构思，并使这种构思具体化，使理论具有了可操作性。从理论上宏观的设计到具体操作上微观的设计，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独特之处、闪光点。正是由于这种设计，使得中国的当代发展不仅对后发展国家显示出重要的意义，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成为当今世界上较为先进的一种发展形式，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借鉴意义。

邓小平发展观首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有关中国发展的远程视野。

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虽然在特定场合下所讲的这段话涉及的只是教育，但“三个面向”包含的精神、展现的视野、反映的境界远不止于此。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深层决定因素，中国的发展同样需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对中国发展的总体思路。

中国发展的目标取向是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历经旧中国时的海市蜃楼般的幻想与新中国建立以来被拖延、搁置以及惨

遭流产的命运，现在已经是到了毫无退路且迫不亟待的时候了。如果再度落伍，则永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足。

中国发展的必要手段和必然趋势是面向世界。时代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把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一个国家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放眼世界，利用世界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资金发展自己，同时把自己的发展自觉地纳入世界潮流之中。

中国发展的落脚点要落在未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后发展国家，在完全实现现代化之前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立足现实的同时，更要放眼未来，因为未来导引现实发展的方向与目标。使现实的发展不至于走弯路、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这样，从中国发展的目标取向到必要手段和必然趋势再到落脚点，显示了邓小平对中国问题的宏观把握。

还必须注意到，在邓小平的著述和谈话中，“模式”和“特色”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词汇。这不是偶然的或无谓的。正是在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历程和类型进行了宏观考察与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产生了关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要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的社会发展思路，继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给予了合理的解释，最终形成关于这两个概念的科学理解，这里凝结着邓小平对现代化问题的全新构想，它与“三个面向”的精神指向一起，构成其发展观的核心理念。

### 1. “模式”解剖

先让我们扼要地梳理一下邓小平对“模式”问题的论述。

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

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1983年，他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又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划脚，是要犯错误的。”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和自己革命的实践来寻找革命胜利的道路方法和方式。“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86年，在同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从邓小平这些富有代表性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模式”问题的理解：首先，革命和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有不同的思路和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模式”的产生就是必然的。它是人们的活动方式与经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定型化的活动结构，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所选择的道路、方式、方法的凝结，而且比“经验”、“道路”、“方式”、“方法”更具稳定性与系统性。邓小平曾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家的特点和自己革命的实践来寻找革命胜利的道路、方法和方式”。这里的“道路、方法和方式”的凝结，就是“模式”。特别是在当代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系统化，走向现代化成为人类高度自觉与高度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如果说过去人类在现代化的起步与发展中，社会基本上是在半自发状态下发展的，人们从自己利益出发进行活动，相互之间形成“力的平行四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93。

形”的合力作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社会运动，那么，在当代，社会问题的综合化、总体化，方法、道路的多样化、交叉化，价值选择的复杂化、多元化等等，就要求人们以高度理性的态度、长远的目光来设计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前进得更快、选择得更合理。这些把“模式”的意义更加凸现出来了。

其二，“模式”又是具有特定内涵指项的，它并不是把一个系统中所有的因素都包括在内，而是要把其中非本质的东西舍弃掉。比如，从现代化的实现方式看，邓小平就列举过苏联模式、东欧模式、东亚模式、欧美模式、日本模式等。很显然，对“作为社会普遍出路”的现代化的追求而言，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必然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模式”并不是指这些相同的一般原则或一般原理，而是指体现它们独有的个性特征。诸如苏联模式的特征是重速度、轻效益的赶超战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等等；欧美的现代化模式表现为较早的现代化起步与渐进的发展过程、“增长”与“滞胀”相交替的经济现象、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多元化的价值追求等方面。……这些“模式”之间就其内容与实质而言，都各有特点，不容混淆，也不可能混淆，这充分体现了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和不可重复性。

其三，承认模式的存在，但不能过分迷信模式，哪怕是业已取得成功的模式。因为任何模式在体现历史进步性的同时隐含着潜在弊端，在暴露了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也有某些合理因素。以苏联模式为例，它在当时就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它曾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它注重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建设，坚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即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从而第一次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比较可行的初步的实践框架。它曾三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巨大的优越性，第一次在30年代，与西方发生大的经济危机相反，创造了苏联工

业高度发展的奇迹；第二次在40年代，它保证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第三次在50年代实现了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普遍高速发展。可以说在社会主义70余年的实践中，它留下的决不都是失败的记录，而是有不少成功的记录。当然这些成功也付出了历史的代价，因为这一模式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比如快速增长和统得太死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权力过于集中，领导干部易于脱离群众；管得过多不可避免地造成管理机构庞大和滋生了官僚主义等等。正是这些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减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使社会主义面临严重挑战，以后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与此不无关系。因此，应当理性地分析任何模式的功过，切忌情绪化地给予定论，或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总之，在邓小平看来，对待“模式”问题的态度应当是，既不否认模式的存在及其意义，但也不过高估价它的作用及其影响，即应当是“借鉴”，而不是“照搬”。现代化进程推进到今天已呈现出多种样态；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于基础薄弱和任务繁重，既要求尽量避免那些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后果与危机，又要求加强整个现代化过程的调控与操作，以消除盲目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多种多样的现代化实现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程度不同的“借鉴”、正面的示范与反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但是不能因此而走到极端，把某一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具体的做法直接套用到我们国家中来。原因在于每个国家的条件只适宜于确立自己的发展模式，强行植入的异质模式只会变形或流产；当然各种发展模式之间也只有在对比中才能显示出意义。

这就涉及到邓小平运用得更为广泛的另一个概念——“特色”。



## 2. “特色”论证

黑格尔说过：“熟知并非真知。”由于“特色”是邓小平著述中运用最广泛、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汇，而且他通常不是在给概念下定义的、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讲的，所以为研究者的不同理解留下了极大的回旋余地。我们注意到，有的论者把“特色”等同于“实际”、“现实”、“特点”、“特有”、“质”等等，这是否符合邓小平本人的意思呢？

系统地检视表明，邓小平从来没有单独、孤立地用过“特色”这个词，总是把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等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他是从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方式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的，是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角度来提出这个词的；因此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理清“特色”的本来含义。

“特色”的形成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现实”，但“实际”、“现实”还不是“特色”。“实际”、“现实”指的是当前状态与实际情形，比如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所指出的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人口是农民……”这里描述的是中国的“现实”状况，但显然不能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而只能说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和现实支点。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形成“特色”。邓小平的功绩在于，改变了过去人们的一种观念，即搞社会主义和建设现代化不研究各国实际，否定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特殊性，而认为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普遍性之中有特殊性，在共性中显现出个性，这种特殊性和个性就是各国的“特

色”，它是从“现实”出发的，顾及到各国“实际”的，又是与普遍性、共性结合的。“现实”、“实际”与“特色”之间有联系，也有层次上的差别。

“特色”也不能完全归结为“特点”、“特有”、“特质”，它的外延要宽泛得多。因为“特点”、“特有”、“特质”表证的是为某事物独有的、使该事物与他事物区别开来的质的规定性。比如邓小平说过：“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有的论著在引用这一段话时，将‘特点’易为‘特色’，除了造成词语搭配不当的逻辑错误外，也混淆了二者不同的内涵）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所谓“底子薄”，“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人口多、耕地少”，九亿人口，七亿农民等都是为中国所独有的，在其他国家不存在，这就是中国的“特点”、“特质”。而中国特色并不是中国独有，也不是中国特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一定只有中国这么一种做法。外国有的做法，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国可以借鉴。外国有的做法，不适合中国情况，就不要照搬。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的形成带有中国的特点，也借鉴和吸收了其他模式的有益成分，因而带有更大的包容性。

“特色”一词的科学诠释，显示出邓小平思考中国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全新视野与宏观驾驭能力。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按资本主义方式来实现现代化，也不能按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僵化的模式，按苏联、东欧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干的现代化”，不是“资产阶级”或“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在一个有现实特定国情与历史

传统的东方大国搞现代化，不能靠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和仅凭主观热情的“走捷径”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上述所有这些方式、模式，不管“成功”或“不完全成功”，“正确”或“并非总是正确”，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无谓的，我们对它们应该“利用”、“借鉴”、扬弃，以有助于我们创出自己的特色。只有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总进程中才能显示出“中国特色”，同时“中国特色”也只有在与别的发展模式与特色的“对话”、交融中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用哲学术语说，特殊性不能离开普遍性，个性在共性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用毛泽东的话，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在世界现代化总图景中显现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以此衡量学界的其他诠释，便可看出，它们或者把“特色”等同于“现实”、“实际”，这其实是混淆了“出发点”与“最终目标”的区别，从而在观念中降低了中国现代化的层次；或者把“特色”误以为“特点”、“特质”，这实际是剔除了它本身应包容的外延成分，从而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放在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予以观照；而那种认为“模式”是比“特色”更根本的范畴、形成特色才能形成模式的论点，除了没有注意到“模式”的异质性与“特色”的包容性的区别外，也离开了邓小平的逻辑意旨，因为邓小平从来认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形成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而不是仅仅建立“模式”。顺序上应该是先确立“模式”，尔后从“模式”中显现出“特色”。

总之，把邓小平对“模式”的解剖和“特色”的论证综合起来，可以发现这样一条总的思路：搞现代化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这是基点、出发点；必须抓住本国“特点”，这是根本点；把世界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通行惯例与本国实际、特点结合起来，“积累经验、探索规律”；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本

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在世界现代化的总进程中与其他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对话、交融，进而确立自己的“特色”。由“实际”到“经验”到“模式”再到“特色”的过程，应是普遍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越来越深入的过程。

### 三、邓小平设计中国现代化的原则举要

邓小平对像中国这种类型的后发展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思考，不仅仅体现在指导思想、路线方向上，更体现在他对整个过程的具体设计上，对包括发展原则、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手段在内的诸要素综合、协调、快速、有效的运筹和构想之中。这使得他的发展观独具实践性、调控性、可操作性等特点。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实就其思想的普遍意义与指导价值以及它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而言，他也可称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总设计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文设专章予以阐述。这里只谈邓小平思考这一问题时的总原则和总思路。

#### 1. 开放的，但不是“依附”的

在一篇文章中，我们曾指出：“不发达国家在进入世界历史体系时，极容易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大多数国家看到社会要发展就得开放，封闭不得。另一方面，开放了，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又很容易处于‘依附’地位，结果摆脱了政治殖民统治，又落入了发达国家新的控制和剥削，经济得不到发展或只能

畸形发展”。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不仅从时代发展的总趋势的角度肯定了“开放”的必要性，同时也阐明了“开放”过程中的三重任务的思想；不仅切中肯綮地指明经济“依附”的政治性质，而且说明了后发展国家走出困境的三种对策。

邓小平认为，现代化使世界进入了一体化的时代，“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国的“建设离不开世界”，因此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必须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国策”来认识和看待，“长期坚持”、“坚定不移”。但是，应当看到，对外开放这一原则的确也有一个具体理解和运用的问题。综观邓小平的论述，他总是把它作为一个贯彻始终的过程来看待。既然是过程，那么就有一个阶段、层次问题，进而在不同的阶段和层次上担负着不同的任务：“了解”、“熟悉”阶段。邓小平认为，这一阶段应当是全方位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这是基础阶段。“辨别”、“分析”阶段。了解是基础，不是目的，需要对了解到的情况做由表及里的、“历史主义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鉴定，辨明是非、好坏、对错，这是中介阶段。

“借鉴”、“吸收”阶段。在分析的基础上吸取有益的成分、有价值的思想和经验，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消化”，“为我所用”。显然，对外开放的过程是一个主体选择的过程，是一个担负着“了解”、“分析”、“借鉴”三重任务的过程。“依附论”的阙失就在于把对外开放的原则作了单一化的理解，从而导致了“主体消解”。

总是习惯于“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的邓小平还认为，后发展国家的“经济依附”是发达国家“政治霸权”的集中表现，体现了这一经济现象的政治性质。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的

发达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对后发展国家来说，迎应的措施不是藉此“闭关锁国”，不再开放，而是在对外开放中应注入政治考量和政治策略：反对“霸权主义”。不论是明显的“政治霸权”还是不明显的、作为“政治霸权”表现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存在，必须时刻警惕，并予以坚决反对。“扩大”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实行开放是必要的，但应注意“朋友要交”，更“要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要向不发达国家开放，“取长补短”、“发展自己”。发展民族经济和支柱产业，增强综合国力。只有在经济上强大与自立，才能在对外交往中“拥有发言权”，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 2. “调控”的，但不是“计划”的

邓小平对后发展问题的设计是战略性的、“宏观调控”性的，而不是那种面面俱到、条块分割的“计划体制”型的。他总是把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设计与“改革”联系起来，把“改革”提高到“第二次革命”的高度；而改革的对象就是那些不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种种方式和体制，其中僵化的计划体制尤显突出。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分析了这种“计划”存在的几种弊端：即“统得太死”，一切按预想行事，不计成本，不计效益，不考虑变化了的形势；“管得过多”，以行政方式统摄一切，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放权”，实际上是一种“家长制”的管理方式；“分得太细”，没有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强以国家计划顾及每一企业、任一产品的产、供、销，其实不利于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计划”“失当”，经济比例失调，特别是没有把人民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放到重要位置。

为纠偏矫正，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勇气与思维，引入了“市场经济”这一一向被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独有的经营管理模式。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转轨，从而使对社会发展的战略设计由传统

走向了现代。这种设计是面向市场、面向实践的，与过去相比，它“下放权力”，调整了比例，校正了布局，并且随时准备再下放、再调整、再校正，从而体现出发展思路中的变动性与灵活性。

同时，这种设计又不是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无规则地“支配”与运作，完全失去自主性。邓小平不仅看到市场的正面价值与意义，也看到了市场的负面影响与局限。作为一种手段，它是有作为的，但并不是万能的。因此既要利用市场，又要制约市场。体现在战略设计上这一思路就是“宏观调控”。其要旨是：其一，这种设计是“权威的”。既反映了现实状况与发展规律，预见了若干变动因素与多方面影响，从而体现出稳定性、科学性，又确保了目标实现的具体措施、方案的切实执行与落实，杜绝“各路诸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体现出可操作性。其二，这种设计是指导性的，不是面面俱到、各方面都管的，只是大的思路、宏观方向上的。意见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其三，这种设计是依赖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机制保障的。“设计观”的这种变革体现了邓小平把握社会全局问题时的高超艺术。

### 3. 系统协调的，但不是齐头并进的

现代化是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整体转换，是一项具有多层次、多相关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

彼。” 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是“从相互依存的关系”上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整体系统，进而关注于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协调发展。他把这作为后发展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中必须注意的重大问题，这主要是鉴于西方发达国家曾出现过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失衡现象与怪圈。

邓小平1986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用反说正的方式阐明了上述思想。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相当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这种状况。它充分表明，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多层次、综合性的范畴，经济增长相对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手段，社会现代化的目的应是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和本民族文化价值特定需要的发展过程。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风气变坏，不平等加剧，优秀的民族文化价值受到破坏等等，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一致的、不协调的。它产生的便是“有增长而无发展”状态，即经济增长而社会没有发展。

邓小平正是从辩证法的矛盾相互依存的原理出发，坚持把现代化作为一项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来抓。他既抓经济体制改革，也抓政治、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既抓物质文明，也抓精神文明；既抓建设，也抓民主、法制；既抓改革开放，也抓“四项基本原则”。他始终认为，只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搞好现代化。

当然，辩证法的“两点论”不排斥“重点论”，系统因素协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9—250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93。



调论并不意味着各因素的齐头并进。深得辩证法精髓的邓小平对后发展问题的设计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他把经济现代化看作是其他现代化的基础，认为抓住了经济就抓住了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和系统中的重要性因素；他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现代化的关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系统中重要性因素的关键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根本。因此包含着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思想文化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诸多方面的现代化，对后发展国家来说，既是一个广泛的社会综合的范畴，也是一个表现为差异、突出了先后、表现为主次的矛盾统一体。后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平衡现象，追赶现代化的道路上也就不可能企望马上消除差别。因为所谓“协调”与“秩序”并不意味着无差别。

#### 4. “渐进式”的，而不能是“激进”的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步入正常轨道之后，要想培育一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氛围，保持稳定而高速的发展态势，必须采取“渐进式”的而不是“激进”的方式。

渐进式发展的含义是：发展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前面的台阶为后面的台阶奠定稳固基础，提供有利的条件，整个发展过程显得扎实、可靠，实实在在，不含水分。整体呈现出类似“金字塔”式的模型。政策、措施要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渐次推开。比如：中国的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第一推动力，从农村起步向城市逐步推进；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改革，从沿海向内地逐渐推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从体制外向体制内逐步推进。这样一种自觉自为的做法，通过大胆的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闯出了一条积极与渐进相结合、胆子大和步子稳相统一的渐进改革之路。发展中伴随大量随时随地的调整、纠错甚至局部的措施转换，目的

在于“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快的发展”。邓小平主张，走过一段路后停下来，回顾一下，看哪些是成功的、哪些不成功，错误及时纠正，经验逐渐积累，以使以后提高得更快。渐进方式选择的目的是不是平平稳稳地按部就班的发展、低速度的发展，而是一种“跃进”式的、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发展。目的是使发展阻力最小、震动最轻、代价最小、得利最多、速度最快。

与渐进方式相对的是“激进”型。对后发展落后国家来说，在与发达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形成强烈反差的情况下，选择这种方式的可能性极大。事实表明，在处境落后的情况下，人们极易走极端，要么丧失信心，要么急躁冒进。邓小平在思考不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时，反复强调，“承认落后，但不意味着没有希望”；同时告诫一定不能采取诸如中国1958年“大跃进”的方式。有趣的是，就在中国改革采取渐进方式“取得成功”之时，1989年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之际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形，从而把两种方式的优劣对比得格外鲜明与醒目。当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几乎达成一种共识：即改革必须采取激进方式，大规模私有化，立即放开物价，通过“休克疗法”，从计划经济一步跳到市场经济。但这种改革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生产持续下降，失业急剧增加，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大多数国家居民生活下降，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欧洲战后最大的经济‘灾难’”。诚如英国工党议会党团经济顾问约翰·罗斯所说：“东欧1989年开始的经济变革、俄罗斯1992年1月开始的‘歼灭机变革’导致了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延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是几百天。邓小平设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的制度。” 在新旧体制逐步交替更迭的过程中，某些旧体制组织和功能即使在改革的终点必加消灭，但在被消灭之前往往无形中发挥着作用。试图在很短时间内消灭旧体制的一切特征和方面，只能带来破坏，而不可能马上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新体制。此外，在整个变革阶段，特别是对后发展国家来讲，政府始终应该是改革的操纵杆，发挥着培育市场、调控整个社会运作的功能。假如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打烂了这根操纵杆，势必造成政治动荡，导致改革的失败；假如激进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大规模的私有化，使得政府两手空空，又失去了培育市场、调控经济乃至社会的能力，同样要归于失败。

总之，激进方式导致的是欲速则不达，反而渐进方式提供了“跃进”的基础与可能。

#### 四、“现代化”与“发展”内涵的当代阐释

在对邓小平发展观的核心与特征做了以上的分析之后，至此我们可以把邓小平对“现代化”与“发展”范畴的理解作一综述。不难看出，邓小平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从多种视角、以多种方式来看待与把握“现代化”、“发展”范畴的，赋予了它们以新的内涵与诠释；这反过来也使他的现代化理论与新发展观具有了广泛的普遍性与鲜明的时代特点，从而实现了社会发展理论中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 1. 多维视角下的“现代化”理论

从世界历史演化的大趋势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转轨，是地域文明演化为“世界历史”的全人类的文明的过程。

马克思曾高瞻远瞩地预见和把握了18、19世纪开始的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与特征，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邓小平则终结了20世纪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孤立状态”，将中国的现代化纳入了世界历史演化的大潮流。他准确地看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在于，大生产的技术基础对小生产的生产方式的否定，世界性的工业文明对分散的农业文明的取代，亦即从传统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向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转变。因此现代化是一个大历史概念，标志着一种世界性的巨大变迁，特别是在全球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下，就成为落后和不发达国家赶超先进国家、发达国家的进程。

从实现方式与保障方式的角度看，现代化是当代人类超越社会制度选择的最高命题，社会制度只为现代化提供实现的形式、方式和保障。既然现代化“是今天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不管是选择了哪一种社会制度，都必须努力达到现代化的目标，否则将在各国竞相实现现代化的大进军中落伍。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不是把它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本国过去的情况进行纵向比较，也不是看它选择了哪一种社会制度，而是同世界上先进水平做横向比较。只有在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等方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才可以被公认为实现了现代化，邓小平所说：“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了现代化的世界参照系。由此可知，现代化具有超越社会制度选择的特征，一定的社会制度只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9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94。

其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式，提供的只是一种保障。正因为如此，就不能把现代化这一“最高命题”做单纯而片面化的理解，即把它与社会制度等同起来。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只是“干现代化”的方式，而不是现代化本身。在当代，它们都有存在的现实基础。西方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倡导者，现代化首先由西方搞起来，如今现代化了的国家即发达国家大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说明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可能性。但事实同样表明，资本主义发展了300年，迄今只解决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问题，而今一百多个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仍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对于广大后发展国家来说，“按资本主义方式解决不了”现代化问题。而社会主义方式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比资本主义方式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并且避免两极分化。特别是当“社会主义经历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后”，以事实表明自身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好的形式、方式和制度时，“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由实现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决定的。

从现实形态和具体类型的划分看，现代化又是与特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多种发展模式，呈现出多种特色。邓小平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概括出现代化的类型大体有五种：第一类是英国、法国、荷兰等第一批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是“老牌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第二类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后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称它们为“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第三类是中国、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力图以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现代化问题；第四类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香港等小型国家和地区的急速腾起的现代化；第五类是原来作为殖民地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这一类型的现代化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现代化的众多类型的存在表明，不能按一种模式解决现代化问题，尤其不能把现代

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只是上述第一、二类的典型，至于后三类就具有不同于西方化的特色。为此，邓小平一再强调“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其要点是：其一，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其二，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既要注意现实国情，又要考虑历史传统；其三，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后发展、不发达国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因而更要加快速度，艰苦奋斗，促成“跳跃”。

从结构系统中要素的整合情况看，现代化是关涉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整体变迁和综合运作，必须保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态势。现代化的整体性、系统性源自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系统性。社会是由众多方面、部分、层次、环节组成的，这些方面、部分、层次、环节在组成整体的同时，又隶属于整体，并受整体的制约且相互制约。从历史上看，社会的结构系统与生产发展水平相关联，在生产水平低下的社会，社会结构的系统网络比较简单；随着产业发展多样化，管理社会的相应组织也会愈加复杂。在现代社会，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组成的主体结构基本构架没有变化，但其内部要素、水平、性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为一种立体网络，如有的论者所说的“巨系统化”。因此，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注意全面、协调发展问题。在注重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充分注意到法制、人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教育、科技、人力资源与生态资源、城市化、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及其他社会问题。说到底，现代化造就的应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道德高尚、科教昌明、文化繁荣的新时代。

参看郑杭生主编：《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第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 2. 体现时代特征的新“发展”观

描绘事物运动变化、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范畴，在邓小平那里获得新的时代内涵。

(1) 邓小平从现代社会呈现出的新特点中把握发展，把它看作是一种以高速度或加速度形式出现的前进运动。现代社会活动节奏明显加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产品的替代，“都非常迅速”。在这种“一日千里”的快节奏的社会里，一步落后，步步落后，“赶都难赶上”。因此邓小平认为，“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不能只跟自己比较，只感到有所进步即低速度运动就是发展，而事实上“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因为其他国家都在高速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一种飞跃式的发展，跳跃式的发展，是一种以高速度或加速度形式出现的发展。世界现代化进程推进到今天，如果不对发展作这种理解，就会出现更为明显的“马太效应”：“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将再失良机，遥遥无期。

(2) 邓小平从社会“机体、机制”的运作中把握发展，把它看作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扎扎实实”的上升运动。高速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依靠社会机体、机制的协调运作实现。否则单纯的高速度如果“伤害了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就会造成破坏，最终产生灾难。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一种带有灾难性后果的“发展”，是一种主观任意的“头脑发热”的唯心主义跃进，是完全违背经济规律的轰轰烈烈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

烈的群众运动，最终伤害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机体，破坏了发展的机制。与此不同，中国新时期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是一种稳步、协调地发展”。因此，真正的发展，既是高速度的，也是协调运行的。

（3）邓小平从与其他相关因素与措施的关系中把握发展，认为别的“都是相对的”，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探讨了发展与稳定、发展与调整、发展中的平衡与不平衡等关系，认为要在现代化进程中真正地发展起来，便要认真处理好这些辩证关系。一方面，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秩序和国际氛围；在发展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及时加以治理”；同时需要打破“贫穷”的平衡、“大锅饭”的平衡，采取措施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依靠诚实劳动和对外开放先富起来，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影响和带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较之稳定、调整，发展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较之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目标。发展是主要的，只有发展，才有真正的稳定，没有发展只有死路一条；治理整顿也必须在发展基础上进行，否则“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这是发展带来的调整，是依赖发展的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的调整。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总是有条件的地方、有能力的人先发展，打破原有平衡，进入到不平衡状态，形成新的关系和格局；而这种不平衡关系一旦发展起来，也就带动了其他关系，于是形成一种向新的发展、新的关系的全面运动。在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运行中，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6—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



## 第三章 立足于当代实践的分析构架

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以当代实践为其驱动力量的，要深刻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变革，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增强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自为自觉能力，就必须研究当代实践的主要特征。因为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社会实践的规模和水平；时代的变迁，根源于实践方式的变革。社会的发展是同实践由低级到高级的推进同步的。

而当代实践较之以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是建立在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可以说，科学技术已成为当代实践的纽带和灵魂，它以其剧烈的变革和巨大的社会功能，使当代社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征；它不仅带来了丰赡的物质财富，而且促进了社会主体结构的变化；它不仅培育出一种新型的实践方式与实践观念，而且呼唤与之相应的实践精神。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正是从上述思路出发来思考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

### 一、科技革命浪潮的激荡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究竟发生过几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专家们的看法尚待统一。不过以下几个阶段是不能不给予注意的：即最初的制火技术革命，使人类由采集狩猎社会进入畜牧社会，由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发生于大约几千年至一万年以

前的农业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由游牧生活进入稳定的田园生活，由畜牧业社会变为农业社会。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技术革命，使西方迈开了现代化的步伐，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社会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迁，马克思说：“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地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的钢铁、化工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工业由以轻工业为主转变为以重工业为主，自由资本主义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故被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或“第二次产业革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以电力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其时西方刚刚开始电气革命。列宁曾预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能使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早地实现电气化，表明社会主义应该而且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所以他说：“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时代，电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时代。”当然，后来实际的发展不完全是这样。

这便是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在科技革命影响下人类社会大致的演进历程。

较之上述科技革命，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涉及领域最广、达到水平最高、取得成就最大、对社会影响最深”的一次新技术革命。邓小平敏锐地注视着这场革命，准确地预见它“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95。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86。

高放：《社会主义在中国与世界》，第47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召开的有关科学问题的第一次专门性的会议，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邓小平列举了新科技革命所关涉的众多领域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为我们勾画出一幅新科技革命的图景。这就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以电子计算机、机器人和生物工程为先导，以信息、能源、新材料为支柱，以管理技术和社会系统工程为最高成就的科技领域的整体变革。

电子信息技术作为新科技革命的“先导”、“火车头”和“核心”，其主要成果是电子计算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连续研制出五代，现在正在研制第六代，计算机的运用，使人们的生产、工作、生活逐步自动化；由于具有人的部分功能而被戏称为“钢领工人”（Steelcollar Worker）的机器人的出现，是新科技革命的第二大成果，它不仅使人类未来可免除各种笨重、肮脏、危险的劳动，以至出现“无人工厂”，而且扩大了人探索过去不曾涉足过的领域的的能力；激光技术把亮度比太阳光高几十亿倍的激光束运用于通讯、医疗、农作物的育种，扩大了人类在这些领域的作为；生物工程技术改变了过去技术革命成就仅限于增加自然物的产量或加工自然产物的局限，能够人工制造很多新的生物品种；而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技术、航天技术的变革，拓宽了人类劳动对象的范围，增加了劳动资料的种类；从5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开始用计算机来管理企业，使管理技术发生了重要变革，现代企业管理中“矩阵结构”的出现，把纵向领导和横向领导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社会系统工程则把被称为“老三论”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7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三论”即突变论、协同学和耗散结构论运用于管理社会，

把社会综合成一个大系统，旨在研究其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功能和反馈，保持社会的平衡和安全。

这次新技术革命明显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它使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生产越来越一体化，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类活动的统一体系。过去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也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它依靠的更多的是生产实践，这种情形下，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即生产—技术—科学。而在当代，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成为技术进步、生产发展和生产管理、社会管理的主导因素，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周期运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加强，使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的认识（即科学）、改造自然界的综合手段（即技术）和创造物质财富的实践过程（即生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新的科学思想从产生到它在社会和生产中实现的周期不断缩短，科学向直接生产力的转化不断加快、加深，这便产生了科学、技术、生产合而为一的趋势。诚如邓小平所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这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最重要的特征，它充分展示了科学在当代的重大作用，预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当代科技革命直接改变了生产力的质的构成，生产力诸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越来越成为科学的“物化”。其主要表现在生产工具发生了质变。科技革命集中体现在工具的变革、改进上。历史上科技革命使石器发展为青铜器、铁器、机器。而机器由发动机、传动机和工作机三部分组成。当代科技革命使机器在原来三部分的基础上增加了电脑自动控制中心，由四部分组成。过去工具的改进是减轻人的体力劳动，而电脑的出现使现在的生产工具完全可以代替人的体力劳动。劳动者素质发生了质变，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当代生产劳动者的必要条件。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劳动者中间必不可少地包括着科学技

术工作者，未来更高级、更发达的社会中的物质资料生产者都应当同时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劳动对象也发生了质变，过去人们的劳动对象是天然物（如土地、木材、矿石、煤、石油等）或天然物的加工品（如冶炼的金属、烧制的陶瓷、玻璃等）。现在劳动对象逐渐改变为人工合成的新材料（如人造橡胶、化学纤维、塑料等），这些都是自然界从来没有的，而且取材广、产量大、品种多、用途广、性能好。产品发生了质变。过去人类产品都是加强自然物或加工自然物，如农业产品是加强自然物，工业产品是加工自然物，如今生物工程的产品是创造新的自然物。

第三，当代科技革命使自然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被直接用于管理社会，形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很多交叉学科。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过去只有自然和社会两大门类科学领域各自分支学科之间的交叉，而现在出现了两大门类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如信息管理学、数学经济学、经济控制论、社会医学、计算机语言学等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过：“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这一设想随着当代新的科技革命的到来而变成了现实，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这表明人类将能够更为自觉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更好地治理自然、治理社会。

总之，这场被赋予“第三次浪潮”、“后工业革命”等诸多名称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激荡着整个世界。

唯物史观历来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科学技术被赋予人类社会变革的“伟大杠杆”的地位与作用，被“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71。

和进步推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又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进一步推进了上层建筑的革命，以至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但是这一逻辑意旨过去长期没有受到注意，教条主义只讲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不理解阶级斗争只限于阶级对抗的阶级社会，而同阶级斗争相比还有一个更持久地发挥作用的、更从根本上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这就是科学技术。阶级斗争也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前提下起作用的。教条主义论点的流行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基本理论的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具科学意识的领导人之一。早在60年代，他就曾明确地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联系起来看待。1975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十分肯定地讲“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列”。那时他曾向毛泽东就此作过汇报，毛泽东说：我不记得我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了。有人借此大造舆论，攻击邓小平。邓小平激愤地反击说：毛主席只是说记不得了，不意味着他没说过，更不意味着他不赞成。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

不仅如此，邓小平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并没有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现有的观点上，而是立足当代实践，追踪现代科技革命，赋予上述观点更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78年，他就指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在现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988年，他在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又对科学技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94。

同上。

术的作用作了新的概括：“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他再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里有必要甄别一下“一般生产力”和“第一生产力”的内涵。生产力发展具有系统性，具有不可分离的整体性，即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其构成要素的每一次的重大变革，必然会像连锁反应一样，迅速波及、影响到其他要素，以至改变生产力系统的整体面貌；但生产力系统发展的整体性，并不意味着每个生产力要素的发展都是绝对平衡的，相反，其各个要素的发展倒是必然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生产力发展往往主要依靠某一要素。从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角度看，一定历史时期相对突出的要素，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突破口，或者说，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第一生产力”。显然，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第一生产力”。例如在渔猎采集和农牧业、手工业的自然经济时期，第一生产力是自然力；在17世纪—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中，生产力的变革是“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的”，工作机、动力机以及电子的广泛使用，大机器动力就成为第一生产力。人类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已处于一切生产力形式、过程和因素中的首位，现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相对独立的要素，是生产力诸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主导因素，这表明，科学技术已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突破口。邓小平正是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及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当然，“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是个比较的概念，只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作用和功能不同，才用“第一”来表示。切勿

误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将排斥劳动者是“首要生产力”。两者说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因为在生产力范畴中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三者是物质实体性要素，而科学技术、管理和人的劳动积极性等是生产力中非实体性要素，或“智力要素”、“软件要素”。在现代科技之前，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理解为“一般生产力”或“精神生产力”，科学本身还不属于“物质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而在当代，科技革命中科学从“一般生产力”经过生产力中实体性要素的中介，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即前已指出的把科学知识“物化”到劳动资料（尤其是劳动对象）中，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性质和水平；把科学知识“物化”到劳动对象中，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状况和范围；用科学知识武装劳动者，提高并强化了劳动者的智力和生产技能。这种把科学知识“物化”或对象化到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中的过程，也就是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鉴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各要素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劳动者本身中的智能因素和体力因素关系而言，体现科学知识成分的智能因素日趋重要，位居第一，故我们称之为“第一生产力”，而把劳动者看作是首要生产力，是就生产力中人与物的关系而言的，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体，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因而处于首位。归根到底，两个命题的一致性在于，当代生产力发展主要依靠劳动者科学技术素质的提高，而掌握了科学知识的劳动者是当代生产力的主体。

显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长期落后，要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是不行的。只有用最新的观念来规划自己，才能后来居上。这就要充分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诚如邓小平所说：“靠科学技术才有希望！”



## 二、当代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

在当代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的科技革命，其神奇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这些特点作出条分缕析的概括是困难的；我们注意到，在邓小平的视野中特别关注的是以下几点：

### 1. 世界的整体化

所谓世界的整体化是指，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无论其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以至于一个国家发生的变化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的变化也必然影响到每一个国家。马克思曾高瞻远瞩地预见了世界历史的这种整体性，他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失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在当代，借助于信息革命、交通革命和世界市场，交往方式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达到了古代和近代所无法比拟的程度。人类不再由于高山、大洋的间隔，由于交通和信息传递的困难，而处于独立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发展状态。被纳入世界历史潮流之中的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成为世界有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一颗土豆和一袋土豆的关系（因为一袋土豆只是机械的组合，而有机整体和它的组成部分的关系与机械的

组合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各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日益获得了有机整体和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有机整体和它的器官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事件都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前提”，是世界综合因素与国内因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产物；而这些事件本身又以自己的新形式、新姿态，引起这些国家以至世界“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使其“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事实”。

从当代交往的层次上看，类型不断扩大，不仅不再限于契约交往、血缘交往和战争交往这些传统形式，也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政治交往这些近代形式，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到科学交往、文化交往、情感交往和信息交往等形式。与此相适应，还产生了许多新的交往实体、交往“系统质”。在交往不发达的时代，形成的是民族市场、民族文学、科学的单线发展、民族语言、方言等等，而在现当代，则产生了世界市场、国际联合体、世界文学、同一符号和公式化的科学用语、世界语等等。

从当代交往的质上看，一方面由于交通和信息手段的发达，可以跟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进行交往，不再产生“望洋兴叹”、“远隔重山”、“天涯海角”之感；另一方面，当代交往中也可以不拘泥于直接的形式，而是采取间接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技术方式，去收集信息，达到彼此交往的目的。两种方式取长补短，就把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结合起来了。与此相联系，当代交往中还出现了空间扩大和空间浓缩相统一的新特点。一方面，由于科技的发展，当代交往空间无限地扩大，人类已开始探索“星外文明”、“走向宇宙”，建立太空城，空间范围远远超出地球；另一方面，在当代交往中，空间又浓缩化了，人们可以通过电脑走上信息高速公路，在小小屏幕上展开全部交往活动，或者把全部交往信息收集起来。空间扩大和浓缩在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达到了奇特的统一，这是人类交往方式发生的革命性变革。

当然，世界的整体性并不意味着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齐一性。相反，在当代，人们总是带着民族的、个体的爱好和需要，以不同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卷入到世界的整体竞争中来的。当代交往一方面具有整体化趋势，同时也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和个体化的特色。这表面看来是相反的，实质上却是相反相成的，是整体性和个体性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辩证统一。

## 2. 节奏的加速变化

节奏是人们社会活动的时间规律，它表现为各种活动的时间长度、变化程度和发展速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节奏，从节奏的变化中可以集中地体现出时代的变化。

人类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节奏是缓慢的，它以自然节气的变化为自己的基本格调。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社会节奏随着自然的变化跳动着，春种秋收，冬闲夏收。这种自然节奏又扩大为循环的历史观，正如春夏秋冬无限循环更替一样，人类社会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事兴衰，按一定节奏轮流周转。

工业社会的兴起，使社会的节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摆脱了自然的束缚，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农民离开土地的大规模的“流浪时代”，机器生产吸引着这些游民，人类由自然节奏时代进入到工业节奏中。隆隆的机器不停地运转，连续的流水线作业调节着千百万人的行为节奏。社会活动高度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按照机器运转的节奏来规划人的节奏，充满着全部丰富性的人性仅仅被当作“机器人”、“生物人”。这是工业节奏的最终后果。

而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社会节奏更加加速度前进化，同时，节奏的基调和核心再也不是自然界、不是机器，而是科学和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体现出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现代社会活动节奏的特点主要是：

(1) 周期加快。这表现为科学向技术、生产转化的时间越来越短。在19世纪以前，从科学的发明到投产往往要用近百年的时间。例如，蒸汽机从1680年发明，到1780年才正式试用。而在19世纪后周转节奏则日益加快，从发明到投产，电话50年（1820—1870），电子管31年（1884—1915），汽车27年（1868—1895）。进入20世纪，情况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发明到投产，雷达用了15年（1925—1940），电视机12年（1922—1934），晶体管5年（1948—1953），原子能利用从发现原子核裂变到建成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只有3年（1939—1942），激光从在实验室里发现到在工业上获得应用仅用了1年，而近年来微型计算机领域仅隔6个月就有新一代产品问世。这种加快的周期节奏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科学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二是由原来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结构变成科学—技术—生产。

(2) 更替加速。在当代，节奏加快不仅体现为周转节奏，更重要的是更替节奏。正如邓小平所说：“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每10年的发明就要超过历史上300多年的总和，一个人的知识假如停滞不前，在5年的时间里他所掌握的知识就有60%会老化；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中，一个5年前得心应手的人，5年后会变得很不适应。同样，由于发明的速度快、信息多，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事实，当一项发明做出后，突然发现这是几年前其他地方早就作出的发明。所以，在迅速更替的节奏中，信息的收集、查询、处理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它能避免人们的重复劳动。正是基于此，邓小平说：“现在不是

讲信息重要嘛，确实很重要。”

(3) 及时性加强。节奏的迅速更替和周转导致了时间观念的加强。人们越来越注重时间，及时性原则成为人们行为的根本原则。它是由信息原则、反馈原则、控制和调控原则构成的统一体，要求人们迅速地收集各种信息、及时反馈，立即把获得的信息用来对自身的行为、目的和手段进行调整。因此，现代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实质上是现代行为方式、活动方式的必然产物。它体现出当代活动节奏的动态性、时效性、调整性。社会活动节奏加快，无疑对人们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感和思维方式等产生广泛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不能不随着时代节奏的加快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就会感到极不适应或被淘汰。

### 3. 社会的智能化

前文说过，当代科技革命的核心是微电子技术的革命或者说是计算机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主要还不是减轻或替代人的体力，而是替代或延伸人脑的部分职能，是一场智能革命，它开辟了智力解放的新时代。在当代实践中，知识的产生、积累、传播和应用，信息的接受、筛选和利用，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统计，进入6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到90年代初，每年出版的图书已达50多万种，每年发行的科学杂志超过10万种，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约500多万篇，每年公布的专利达70多万件。80年代，科学技术作用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在一些发达国家约为60%~80%，约有四分之三是靠科学技术实现的。从整个世界来看，实践活动的经验型正在向知识、科学非经验型转化，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知识生产、智力生产为主的历史阶段。

当代实践的这一特点同样也对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活动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它的牵动下，社会经济结构、劳动者的

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结构，以及人的活动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产业结构，传统工业像汽车制造业、钢铁制造业等日薄西山，被称之为“夕阳工业”；相反，适应现代节奏的以高技术为基础的高智能、高信息化的公司或企业却雨后春笋般兴起，如日本的“硅岛”、美国的“硅谷”、“硅岸”、“三角研究区”、“波士顿128号公路”等著名的新产业中心，它们以技术更新、产品更快、成本低、机动而具有生机和活力，从而被称为“朝阳工业”。再如就业结构，美国的“白领工人”已超过“蓝领工人”，用电脑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4000亿人年，即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口能完成工作量的200倍。电脑已走向工厂、办公室和家庭，这不仅提高了工作、生活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包括管理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

#### 4. 发展的多元化

随着时代的前进，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多样化了，人们的生活可供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这是同现代实践水平的提高，同现代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发展的多元化首先源于可供选择的机会多样化。在当代，随着人们知识的丰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出现了极富个性的、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的选择日益增多，那种狭窄的只能二择一的社会正在逐渐解体。当代社会的发展，“多种选择”的社会正在形成，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发展的非单一性和多样化，不再是二者择一的单一化选择了。

从发展的单一性到发展的多样化，从选择的单一性到选择的多样化，这是历史的重大进步。马克思早就论证过，在一个生产力和交往活动不发达，社会实践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和民族里，要

发展是极其困难的。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如果发生一些突然事件，如天灾、人祸和战争，都会使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减慢和倒退，已有的发明失传，这时人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发展生产力和社会文化。而且，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的生活地带是狭小的，并且是封闭的，彼此之间没有或很少交往，他们在各自的孤立状态下所进行的发明、创造也往往是重复性的，形不成借鉴和互补，因而是单调的、缺乏多样性的。因此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几乎没有可供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社会发展表现为某种单一的过程。

在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与可供选择机会的多样性是一种普遍的趋向。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显示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呈现出非单一化的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性。社会发展具体模式越来越多，没有一成不变、只能做如此的选择而无他途的僵化模式。就业已现代化的国家看，都走过了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模式，如前苏联、东欧模式、日本模式、西欧的英法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形成，有的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的得益于特有的地理环境，有的利用了不可多得的时机，有的采取了独特的措施。但他们都没有涵摄和解决广大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因此，诸如中国这种类型的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中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借鉴别国的经验，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子，形成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而且进一步说，不仅在不同的国家其发展具有不同的模式，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经济生活和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并非单一化的，而是变得日益丰富、生动和多样化了。

### 三、当代中国社会主体结构的变革

世界整体化、节奏加速度化、社会智能化、发展多样化等等都是在科技革命影响下的当代社会的“显性”特征，而从更深层次的后果看，科技革命对当代社会的主体结构和主体素质的变化也具有重大作用。邓小平十分注意主体结构和素质的这种变革，特别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体的结构重组与精神塑造。

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是作为一次深刻的革命，还是作为一项规模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都需要由敢于承担并有力量完成的人——现代化主体来进行。对于现代化的主体来说，他们既承担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把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作为一项根本性的任务。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同时完成的，而人的现代化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重要的目标和产物。要理解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就不能不研究其主体结构及其特征。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是个人、集体、社会三种形态和层次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在社会活动中积极而创造性地工作并努力发展自己的“实践力量”的个人，是现代化主体最基本的形态。个人是集体和社会的前提。个人在形式上是单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但在本质上却是社会的劳动者，尤其是在现代化社会中，集体的意义更不可忽视。集体作为一种主体形态，是个人主体的联合体，它的主体性在于，它是个人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手段，是能够协调个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的组织。社会主义集体作为真正的主体形态出现，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只有当个人和集体形态确立之时，社会才能以一种自觉的组织形式调节和控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实际活



动。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它们具有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性质。

从现代化的过程看，包含着认识与实践的双重活动，因而现代化的主体也就成为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统一体。他们具有双重的职责：既是现代化系统工程的设计者，又是执行者；既是现代化系统活动的参加者，又是观察者、研究者和控制者作为一种社会系统工程，现代化的设计师与执行者的区分是相对的，这双重责任往往集于一体。需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时候，现代化目标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背离了这个基本原理，任何实践都不能顺利进行和最终成功。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民群众的事业。

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因为它首先是由人民群众选择并积极参加的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广泛的积极的参加，社会主义不会成功，即使成功也不会保持下去。其次，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最能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首创性的事业。再次，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的事业。它不是由圣贤先哲设计好了蓝图，然后交由人民群众建造的某项工程；人民群众绝不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国家管理者、决策者和实际执行者的社会分工并没有否认和排斥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作用，相反，领导者、决策者只有经常地深入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倾听和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情绪，总结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发现和吸取人民群众中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和意见，包括理论工作者提出的新的理论和方案，才能顺应历史潮流，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方针和政策来。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主体的“人民群众”不是一个抽象、空洞、完全感情化的字眼，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们的一定集合体。毛泽东在确认“人民”的现实范围时，根据“历史进步原则”和“绝大多数原则”把站在历史前进方向一边、

对完成历史任务起推动作用（质的标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由多种不同阶层构成的一个最大复合体（量的标准）划归到“人民”范围之内。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的失误在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任务、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判定出现了偏差，在代表人民和忠于人民的关系上主观态度和客观地位出现了偏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邓小平正是依据当代中国所处的阶段和世界现代化的趋向，重新恢复、落实和深化了“人民主体论”的思想。确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事实，从而进一步指出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状况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这种整体思路的转换，从根本上对确立什么是当前的主要历史任务和目标，为更全面具体地理解新时期的“人民”范畴奠定了基础。同样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毛泽东当年这样讲时，曾由于当时对“建设”的理解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政治和阶级斗争上，所以这个广泛的“人民”概念并未能充分地贯彻。如今的深化恰恰在于，对于建设什么、用什么来建设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对“人民”也有了新的具体观念。例如，随着对科学、技术、知识、文化在形成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根本作用的理解，知识分子不再被看作一个游移的阶层，而被承认是人民中一个中坚的、先进的部分。“人民”的含义和标准不再仅仅属于政治和阶级斗争的领域，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把经济和文化的含义和标准也包括在内。显然，这是对“人民”理解的全面化和深化。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社会的变动和发展，特别是20年来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社会主体结构发生了很大变革，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以下几个阶层：

### 1. 产业工人阶层

从人数上看，如果把生产、运输、工业、商业、服务、邮电人员以及办事人员等都称为产业工人，那么产业工人阶级总数1990年约1.65亿，占就业人口的30.6%，到2000年已达到2.58亿，占就业人口的39%。从内部结构看，如果按所有制分组，全民所有制职工在数量上仍占有优势，1990年统计，全民所有制职工占39.5%，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占53.5%，民营和其他经济成分职工占6%。如果按产业来分组，产业工人阶层中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占6.8%，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占53.3%，第三产业占39.9%（在社会劳动人数中，第三产业占16.4%）。这些数字表明这是一个处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的产业工人队伍。

### 2. 领导阶层

在传统阶级结构观念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现在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从传统的工人阶级内部分离出一个领导阶层。1982年人口普查中第一次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单独列栏统计，当时为813万，占就业人口的1.6%。现据1995年统计，领导阶层总共1600万人，其占就业人口2.8%。他们作为国家现代化设计者、决策者，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这一阶层也出现不少问题，最为突出的是腐败现象，而且在社会转型期有某种程度上加重的趋势。据统计1996年1月至12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结案162860件，比上年同期增

长14.8%，处分165906人，比上年同期增长12.76%。显然，这个阶层能否遏制乃至铲除腐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顺利进行至为关键。

### 3. 企业家阶层

这个阶层的产生与扩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出现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在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下，企业由国家直接控制，企业干部是国家委派的工作人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国家集权多，企业自主权小，企业领导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决策权。这种管理模式是一种低水平的民主管理，由于企业管理干部和企业职工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企业干部谈不上什么权威，而管理中也缺乏任何奖惩制度。改革使得企业干部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使企业干部和职工的相对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的外部环境变了，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同国家只有缴纳税款的关系，而不受行政管理，国家主要通过市场以各种经济措施调节企业行为，这种变化转变了企业的经营目标，市场和利润已变成企业经营的动力，也切断了职工和国家的直接的利益联系，职工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资也将不由国家统一规定，这使职工同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企业内部领导体制变了，厂长（经理）已经确定了企业法定代表的身份，这使企业领导者成了国家资产的“经营者”，或者说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的人格化代表，必须从企业资产的利益出发从事管理。这两方面的变化归结起来便是，国有企业是国家的资产，这资产必须在周转中增殖，企业领导人便是这一资产的经营者，而企业职工的利益同这一资产的经营状况直接相关。

私营经济这些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由于一开始就面对市场，机制灵活，充满活力和生机，所以发展迅猛。而且企业管理

者大都是中青年人，意识更新，束缚更少，前途不可限量。当然，在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新情况，不完全是好的，比如大量的家族型企业的管理，就有不少弊端。这是值得注意并加以规范引导的。

总之，企业家阶层的出现是当代社会主体结构中引人注目的新现象。

#### 4. 处于历史性变革中的农民阶层

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庞大和最古老的群体、集团，中国农业已有持续繁衍4000年的历史。据统计1995年我国农村人口11亿人，占总人口的84.6%，农村劳动力9亿人，占全国社会劳动者总数的68.5%。在1979年以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在生产队里从事集体劳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把农民束缚得死死的，根本无法通过直接的努力从世世代代重复着的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保守狭隘的思想意识中解放出来。1979年以后，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在全国展开。到1984年，效果已充分显示出来，该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户数18398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7.9%，其中大包干的户数为18146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6%。这一改革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4年全国农业生产创历史最好水平。但随之而来出现了农业过剩人口。因为按现有耕地容纳不了这么多劳动力。于是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个“亦工亦农”的边缘群体。有的流向城市，从事个体经营、家庭服务、雇工经济等行业，更多的是“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走农村城镇化的道路。近年来，乡镇经济大发展，有的地方，比如江苏、浙江等地，一部分农民通过乡镇企业跨入产业工人阶层、企业家阶层，已经不是一个前景，而是一个事实了。

## 5. 知识分子阶层

大转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结构中变化最大的阶层之一，比农民变化的意义更深远。过去3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也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对知识分子造成不应有的伤害。造成这种情况，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多方面的原因，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长期失误，混淆了新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本质差别，致使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社会地位较低，抑制了他们作用的发挥。邓小平在新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做了重新估价，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实现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进而采取一系列落实知识分子的措施，使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大为提高，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知识分子的重大变化表现为：正确解决了阶级归属问题，他们不再被归入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之中，被列入“革命的对象”，而是被肯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显著提高，据1995年统计，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就业人员中科技人员有58万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12.8%，比1978年增加近7个百分点，在国民经济关键部门中，知识分子比例更高，有的高达70%以上；在社会整体转换中知识分子起到了文化传承、引导与弘扬的作用。

在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的同时，作为一个阶层，知识分子的自身结构也在发生种种变化。据统计，现在我国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数达4465万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145.8万人，中级738.9万人，初级1820.5万人。这些年中青年知识分子人数迅速增加，使这一阶层成员年轻化；从事应用技术学科和经济管理、法律等工作的比重增加，使这一阶层更加适合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渗透经常化，不再集中在文

化、教育、科研等有限的几个部门，也向其他阶层转化，从政、经商的不乏其人，同时从其他行业中自学成才的人也不断涌现，开辟了知识分子来源的多种渠道；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增强，不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别人“皮”上的“毛”，从而处于“客卿”的地位，意识不到自己的独立存在，不再追求书斋式的清高、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与世无争的态度，而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采取积极介入和自觉参与的进取姿态。

阶层细化、结构复杂化，是当代中国主体形态的特征。显然，不从这一基本状态出发研究他们的深刻变化，就不能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

#### 四、新型实践观呼唤新的实践精神

新的科技革命所带动的当代社会整体实践格局的深刻变革，必然引起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相应变化。实践观念是对实践本身以及如何进行实践的认识，当代实践的特征必然在实践观念中反映出来，而新型的实践观念又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实践精神。

新型的实践观念是包容着体现时代特征的一系列观念的整体系统。邓小平特别注重的有科学观念、信息观念、系统观念与时效观念等等。

##### 1. 科学观念

20世纪进入科学知识不断膨胀的时代，证实了恩格斯一百多年前的预言：“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留下来的知识量成比例”，而且“可以说是与其从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

比的”。邓小平正是以富有战略性的眼光注视到“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的趋势，借知识的激增和科技的作用，趁机引导全民族实现观念上的跃进，形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给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注入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新血液。这体现在：其一，突破以往发展生产力的思维习惯，推翻了“左”的思想占上风的年代试图通过“人民公社”化、搞“大跃进”等先改变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思路，而是主张通过发展科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发展了的生产力去作用于生产关系，使之发生变革，再让变革了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使其发展。其二，在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上，强调“基础在教育”的思想，认为后发展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入手，主张抓科学技术必须同时抓教育，强调各行各业都要支持教育，同时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手段等要加速实现现代化，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人才。其三，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上，指明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方向。邓小平准确地指出：“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四，在科技发展的运行机制上，提出改革科技体制的方针，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解决好科技人员的管理、使用问题，把力量合理地统一、组织起来，建立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机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7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8页，人民出版社，1993。



## 2. 信息观念

信息是现时代运用最广泛的概念之一，它与材料、能源并称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三大支柱。正确利用、分配和创造信息，成为当代社会极其重要的方面。信息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上升为重要因素，与信息本身的特点和当代实践活动的需要分不开。信息的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它能够提供各方面的动态情况，能消除实践活动的盲目性和自在性。虽然信息本身既不提供坚固的材料，也不提供丰富的能源，但它能把各方面的状况随时随地反馈回来，使人们能够根据信息的变化来加强社会、经济、生活和生产等各部门的自我调节，使各个部门、各个要素形成一个有序的动态整体。当代社会实践的复杂化，要求把对信息的认识扩大到人类的整个活动系统、操作系统上，从系统与环境的信息交流过程考察社会的一切系统。有人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五次信息技术的革命，即象形文字的发明、纸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以及电讯、电话的发明和现在的第五次信息革命——电脑和卫星技术的综合发明，其中第五次信息革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信息技术智能化、国际化和社会化，这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突出信息观念，认识信息的意义，利用和创造信息，就成为现时代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 3. 系统有序观念

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使得社会、经济与技术的管理日益复杂，各种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情况日益明显，这就迫使人们必须从整体上或系统上去认识和处理问题，即把社会作为一个由各个子系统、层次、因素组成的复杂的有机运动体，考察其要素与要素、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实际操作使之协调地、合理

地运作，展示一种综合前进的态势。邓小平要求把中国现代化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恰到好处地处理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内容与形式、本质与手段、统一性与多样性、规律性与曲折性、变与不变以及小民主与大民主、体制与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大国与小国等等的辩证关系，就是基于这种辩证系统的观念。

#### 4. 时效观念

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活动的对象是自然界，整个活动则是以自然节奏的变化为参照系数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的经济生活，没有竞争，因而也就不需要严格的时间、效率观念。但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生产者必须高度注意劳动时间的节约，只有以最少的时间生产出最多的商品，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同时，竞争使社会生活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动之中，生活和工作的节奏空前加快，更要求人们增强时间观念。而对时间的紧迫感必然导向追求工作效率，随着时间观念的加强，效率原则也成为一项社会选择原则。竞争使每个企业和个人都时刻处于因缺少效率或效益不高而被淘汰的威胁中，因而也必须经常考虑和采取措施以提高效率、增加效益。总之，时间和效率观念，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注重时效应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观念。

实践框架、实践观念的变革最终必将表现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活动方式的形成，一种时代精神的产生。在当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型实践框架和实践观念，也必然呼唤一种新的实践精神、一种在当代实践中应该具有的主体精神。我们从邓小平大量的论述中提取出“实”、“闯”、“变”、“新”四个字所体现的这种精神，予以阐释。

“实”。当代实践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当然也就是一种充满风险的实践。这种实践要求一种求实精神。邓小平强调，想问题、办事情，首先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坚持“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样做的实质就是求真务实，讲求实效。在另一处邓小平更苦口婆心地说：现在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

“闯”。当代实践是在一种新旧体制转轨、新旧观念驳杂的情况下进行的，旧的经济模式和体制、旧的思想框架和观念仍在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需要一股“闯”劲，即一种敢“冒”的精神。邓小平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要百分之百的正确，百分之百的人同意才去干，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实践。当然，敢于“闯”并不是盲目地干，而是确实从现代实践出发的。现代实践活动的根本特征之一，便是提供着各种发展的可能和机遇，是以可能性来设计现实发展的实践。从根本上说，可能性是现实提供的，但是，可能并不会自己走上门来，如何认识这种可能性，如何为新的可能性创造条件，取决于我们头脑中的框架。一个从旧框架出发的头脑，即使在可能性较充分展现出来的时候，仍然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有换了脑筋的新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

头脑，才会充分把握可能性，并设计出新的可能空间，从而迈开步子，敢闯敢为。邓小平的要求是：“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变”。现代化实践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根本转轨，因此必然要求一种改革的精神，一种变革的意识。“变”贯穿于实践活动始终。就深度言，邓小平认为当今中国的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修正、补充和改良，不是枝节的、细微的、日常性质的变革，而是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体制。它既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性质，即从所谓的产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又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即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转换又必然在生产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方面引起重大变化。可见，“变”的指向性首先是经济体制的深层结构和根本问题。就广度言，当今中国的改革不是仅对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改变，而是全方位、多方面的改革，即要“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并“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可见，“变”应当辐射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促使社会生活发生整体转型。

“新”。现代化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创造性的时代，必须突出主体的创新意识。“我们要以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越高越好、越新越好”。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实践就没有新的事业。置身于现代世界的交往体系中，我们不惮于暴露自己身上的弱点与困境，我们承认落后，以先进做参照，找到落后的原因，从而改变落后，我们再也不能固守意识形态的成见，不屑于了解人家，反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94。

而无谓地浪费精力和时间去创造人家已有的东西；迎接现代化潮流的挑战，我们要敢于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方式来认识、处理各种情况、各种问题，不怕“标新立异”的指责，不循“自古有之”的旧例，因为“除旧布新”、“优胜劣汰”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新”意味着进步，意味着发展，意味着现代化。

当然，主体精神不是一个可以分隔开来的变量，以“实”、“闯”、“变”、“新”为主要特征的主体实践精神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突出强调这四个特征，是因为它们对于处在现代化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邓小平站在当代实践的基点上，抓住了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与新特点，分析了由此所引发的社会总体特征的变革和主体结构变化的重要趋向，以及所造就的新型实践观念与新型实践精神。这是一幅完整的有关当代实践的总体图景。

## 第四章 作为现代化新型实现方式的“社会主义”

进行现代化建设既是客观现实的要求，也是主体能动创造的过程，因此既要立足于当代实践，也要选择好实现方式。实现方式的选择不仅关乎现代化建设进行的速度，更关乎现代化建设未来的后果。从业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形看，并不是“充满芳香的园圃”，而是掺合着“杂草与败叶”的“歧路花园”，显现着财富与进步，也充斥着窘困、矛盾和危机。追溯这种“发展性危机”产生的根源，我们发现，不在于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因素、条件以及局部策略，而在于其整体实现方式的弊端。如果说封建的小生产方式的土壤之中扎不下现代化大树之根，那么以资本主义方式培植出来的现代化之树也不会是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对资本主义做这种评价，并不是抱有极“左”观念下的意识形态成见，相反，诚如前文已说过的，现代化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最高选择，但作为现代化实现方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本章中我们拟在现代化实现方式的视角下，遵循邓小平的思路，对两种社会制度作一优劣评判。我们将会看到：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中确实包含着许多不正确甚至属于谬误的东西，理应而且实际上也正在对此进行深刻反思；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对于避免和解救现代化过程中的危机不仅回天乏力，反而是这些危机产生的根源，而充满活力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正好可以纠偏矫正，剔除痼疾。对于现代化来

说，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更合理的实现方式。因此从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来看，也存在一个现代化实现方式现代化的问题。

### 一、“资本主义式”现代化所存在的“发展性危机”

任何事物与运动都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现代化也不例外。当我们审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之路及其显示的现代化后果时，就不能只看到进步，而不注目于危机。特别是对后发展国家而言，分析与解剖这些危机，进而寻求解救之方，从而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形，尤其显得重要。

也许正如俗语所言：“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谈及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存在的危机，西方一些思想家倒是结合自己的体验作了比较深刻的揭示，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他们的分析，特别是不同意它们的结论（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危机产生的最终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罗列的现象、提供的材料，还是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便利，具体的论证也能权充借鉴。

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危机的揭示与批判吸引了西方众多学科的学者。我们不妨看看在这一问题上属于不同学科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的论述。

西方一些社会学者长期从事对西方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他们对“现代性”的腐朽与没落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观点，较著名的有乔恩·谢泼德和哈文·沃斯的“现代化的贫困论”、斯卡皮蒂的“‘扔东西’社会（the 'throw-away' society）论”、柏忠言的“西方‘社会病’论”等。

乔恩·谢泼德和哈文·沃斯论述了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的12个

方面的社会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类。其一，由于西方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其二，由于西方人价值观的变化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其三，由偏差、过火行为所产生的问题。他们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大多数人陶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用对发财问题的关注代替了对贫困的关心，认为贫困不再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了。其实，现代资本主义并没有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贫困问题不引人注目并不说明它已经消失。他们还指出，贫困问题是与两极分化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两极分化越严重，贫困的威胁也越大。实际情形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了。

斯卡皮蒂则从以下四个方面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酗酒和吸毒猖獗；犯罪率增长速度惊人；自杀案件不断增加，死于自杀的人数已超过了死于他杀的人数；道德败坏，离婚率高。他说，资本主义社会是逐步演变成一个“扔东西”的社会（the "throw-away" society），而现在，则在“扔掉人”，因家破人离而遭受心灵创伤的儿童与日俱增，他们踉跄街头，举目无亲。随着“性开放”、“性革命”的兴起，性买卖、性变态、性瘟疫已到了望而生畏的程度；失业所造成的最大危害是失业者丧失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从而越来越厌弃现代化的生活。

柏忠言也揭露了种种“西方社会病”。他着重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危机的种种表现：打开电视、翻开报纸、走进书店，满目尽是犯罪、杀人和黄色的新闻、影片和小说；广告泛滥成灾，主要宣扬享乐主义；电台所播送的歌曲，为靡靡之音；继50年代的“摇摆乐”，60年代的“灵魂乐”，70年代的“乐与怒”之后，从80年代起，一种新的暴力音乐又在悄

参看乔恩·谢泼德、哈文·沃斯：《晚期资本主义》，第2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悄兴起；出现了一批奇形怪状的青年，他们把头发剃光，身上绘有各种图纹，以伤残肌体，惊世骇俗的服饰，表达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唾弃；流行一种所谓“求生主义”，有人害怕核战争突然爆发，也有人感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不惜耗费巨资，到深山孤岛去营造避难工具，并在地窖储藏大量食品、燃料和武器；“整形热”方兴未艾，“减肥热”又紧锣密鼓；各种整形、减肥广告真可谓琳琅满目，争奇斗胜；养狗养猫成风，人们对狗、猫一往情深，到处可以看到一些人以狗、猫为伴，而疏离人群；赌风日盛，赌博已成为一种一本万利的“新兴工业”；科学、文化不断受到摧残，达尔文的进化论受到宗教势力的顽固抵制，居然通过法案，规定学校必须同时既教进化论，又教“创世说”；不断以宗教为寄托来寻求安慰，甚至一些科学家也走入神学的迷宫，今天的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信徒，已各占人口的一半……柏忠言指出，上述种种意识形态的危机说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有了巨大的物质进步，却没有相应的幸福的增长。人类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原始人的状态，他被科学奇迹所包围，并不因此真正感到更为幸福和欢乐。人们可能处于电视机、游艇、大量金钱和各种富裕生活的声色欢娱环境中，但是却仍然需要医生在处方中所开的合法毒品把自己麻醉到眼球部位，以免精神崩溃之虞。他声言他的《西方社会病》是在为中国敲响警钟，提醒中国不要蹈入西方社会的覆辙，产生种种现代病症，葬送现代化的前程。

如果说这些社会学家主要从社会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病症的话，那么，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博卡拉，“左派经济学家”卡斯泰尔斯、巴兰和斯威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巴特拉等则就是从经济角度剖析资本主

义的弊端了。

曼德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条件的历史变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古典的帝国主义；晚期资本主义。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来就存在严重的危机，又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条件，这些危机就具有“爆炸性合乎扩散性”的特点，这些危机主要有以下五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资本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的危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个体合理性与总体非合理性之间的严重对立而引起的社会生产的危机；由于资本主义企业家权威的动摇与企业结构非等级化而引起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危机；由于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升级而引起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危机；由于生产力国际化而引起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矛盾危机。

巴兰和斯威尔确认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们认为，由于“存在着一些外部刺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可以获得发展；但也正因为这些刺激因素是外在的，其作用必定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一旦这种“外在刺激”弱化或消失时，便一切如故，陷入长期萧条的泥坑。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则是：一方面形成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另一方面不能提供为吸收日益增长的“经济剩余”所必需的消费和投资的出路，从而使这个制度和谐的运转由于“经济剩余”不能被吸引，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常表现为人力和物力的使用不足。因为不能吸引的剩余不会被生产出来，所以，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从根本上来讲，它的正常状态就是停滞。

巴特拉则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财富高度集中。财富高度集中带来了三种结果：其一，财产很少或没有财产的个人人数增加，这样，由于穷人或中等收入阶层的借款需要超过富人的需要，以致对贷款的需求增加。其二，既然占人口大

多数的穷人和中产阶级的财产现在减少了，所以借款人的信誉一般比以前下降，在信誉普遍减低的环境中，大多数银行不可能对借款人挑三拣四，这就增加了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其三，当某些人富起来时，他们对风险的厌恶就减少。于是，投机性投资迅速增加，投机狂想趋向自行助燃。他认为这三种结果的背后就是大萧条的到来。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正处于“聚财者兼荡动者时代”。在这一时代，一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些人，把心智完全用在追逐货币上面，致力于积累财富以实现通常所说的美好生活，一切集团都屈服于货币的诱惑，其结果一切事物都商业化了；另一方面，正因为那些所谓的领袖是如此的自私与贪婪，以至于大多数人追随着他们的脚步，表现了一种被本能行为、贪心与完全自私自利等品格所支配的心态。目前的西方社会具有“聚财者兼荡动者时代”的一切弊端，其最鲜明的标记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他提出，只要把80年代的西方社会同处于经济大萧条之中的20年代—30年代的西方社会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又一场或许比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的灾难正在孕育之中”，“如果现在不采取任何的措施，那么历史很快将会重演。”

不同的学科决定了不同的批评视角与话语方式。上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诚然各有其真知灼见，但从总体上讲，在论及资本主义现代化危机的广度、深度上更进一层的还是哲学家们。5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哲学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影响巨大，曾吸引了不少人，其中著名的有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哈贝马斯等。

马尔库塞用“异化理论”来代替“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武器。在他看来，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矛盾消失了的世界”，而用“异化理论”分析，所看到的却是世风

日下的景象。他提出，根据马克思的人权主义、异化理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生活在这一社会里的人其人性是实现了还是异化了。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是个“病态的社会”、“罪恶的社会”，正在于它压抑、扭曲了人性，他从以下诸方面分析、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第一，在他看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恰恰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最基本的需求，这种不属于人本质需要范围的“虚假的需求”是这个社会强加给人的。第二，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痛恶一方面在于把不属于人的本质特征的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强加于人，另一方面在于真正的人的本质遭到肆意压抑，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第三，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人的生本能——爱欲遭到重大压抑，所以使本能结构朝着有利于死本能——攻击本能的方向发展，攻击本能逐渐占了优势，从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攻击性”的社会。第四，他指出，自然界不仅仅是人的生活的源泉，而且也是人的想象、人的关于美与和谐观念的源泉，人只有与自然界处于有机统一之中，才有自己的快乐与满足。他认为，现在人把自然视为可以无止境盘剥的对象，把自己从自然那里引开，这就切断了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的纽带，从而使自己成为一种没有根基的、迷失方向的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的出现，使自然界不再成为人的本性实现的“天然空间”，而成了人的本性被奴役的“地狱”。

弗洛姆也基于他对人性的特定理解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分析、批判。他认为指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一是：任何事情只要在工艺上是可能做的，就应该去做，如果制造核武器是可能的，就一定要制造它，即使它可以把我们全部毁灭。这一原则意味着把一切基于人道主义传统的道德都否定掉。指导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基本原则是：为获取最大效率和产量而奋斗。这一原则使“交易型定向”成了现代西方人特有的性格走向，从而形成一个“人格市场”，现代人放弃从内心追求真正的自我，而把人格当作商品一样在市场上销售。他详细分析了在这两个基本原则指导之下人性遭受严重异化的具体表现：人与其所做的工作相异化；人与其消费的物品相异化；人与其同胞的关系相异化；人与其自身相异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完全机械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但人却失去了独立性和主动性；另一条路导向新的人道化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切技术和工艺都是为了人的健康和幸福服务的。就目前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迈向第一条道路。

哈贝马斯是完整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论的阐释者，他的一系列著作如《合法化危机》、《文化与批判》、《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进化》、《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性危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的独到之处更在于，建构了一个“危机论”体系。我们可以列出如下两张图表对这一体系加以说明：

表一：

发生危机的层次	系统危机	同一性危机
经济系统	经济危机	——
政治系统	合理性危机	合法化危机
社会文化系统	——	动因危机

表二：

危机趋势	说明
经济危机	(1) 国家机器作为价值规律的无意识的、自发的执行机构在运转 (2) 国家机器作为联合的“垄断资本”的计划代理人在运转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由于下述因素而遭破坏
合理性危机	(3) 个体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4) 不属于系统本身的结构的生产（对持续生存是必不可少的）
合法化危机	(5) 系统的局限性 (6) 政府对文化传统的干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政治化）机
动因危机	(7) 对持续生存至关重要的传统的削弱 (8) 普遍价值观体系全面超负荷（不断产生“新的”需求）

“表一”反映了这四种危机各自所产生的领域、表现形式以及相互的转化；“表二”则反映了它们各自产生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之间的内在联系。哈贝马斯强调，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因危机”这四种危机是一个整体，互相牵制，互为因果，共同起作用。应该说，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确实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危机所作的分析、批判，达到了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片面的深刻性”。大抵说来，这种批判都可归入人本主义性质的批判范围之列。但是由于这种批判立足于人性论，所以尽管也有它独到精辟的地方，但终究未能

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矛盾中探究其根源。这种批判乍一看来颇感新颖，有启发，但仔细想来又感到不尽兴，它列举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病症，但没有涉及到最要害之处，也就没有找到治疗疾病的有效药方。

那么，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出现的问题，何种看法才是公允的呢？对此，我们作如下的评论：

其一，“危机”是普遍存在的，但不是一个层次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出现的危机是一种全面性、普遍性危机，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因此有的论者只立足于经济视角、有的只立足于社会现象描述，还有的从哲学上抽象批判，都是不够的。但是这些危机之间又是有层次、轻重、制约关系的，摆不正这些关系，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从前文可以知道，哈贝马斯倒是从各个角度都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但他有一种倾向，就是他用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淡化经济危机，认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经济危机即使继续存在，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是细微末节。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其二，“危机”是存在的，但危机本身不是现代化、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喜欢走极端，情绪化。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现代化的后果充满危机，那么就不要再现代化了，要颠覆“现代性”；既然科学昌明、技术发达带来了这么多生态、人口、环境问题，那么就要批判科学技术，因其负面效应的存在否定其自身。我们说，现代化没错，科学技术的革命也是正确的，错就错在现代化实现方式选择错了，科学技术的功能被误用、滥用了。任何颠覆“现代性”、否定科技革命的走极端的做法只能是一种情绪发泄，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非理性的选择比理性的失误更荒谬。

其三，“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的总根源。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的历史过程在其发展中受一定规律支配的最基本的物质关系，是说明社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特点和变化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要“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把它当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在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并划分不同的社会形态时，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生产关系，即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唯一的客观标准。在分析某个具体的社会形态时，马克思主义特别要求必须分析这个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即分析社会中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以及产品在人们之间的分配方式。其中，又以作为生产关系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最为重要。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关键在于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工业资本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就是说，是一个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私人占有为基础、由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并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为榨取剩余价值，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扩大生产；他们主宰一切，剥削和奴役着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并把其他一切不属于自己队伍的人们逐渐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使“现代的国家政权”成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总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性质说明了整个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可以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形式和生产关



系中找到答案。

其四，解救危机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共同富裕为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有规划、有设计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它既能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那种“灾难与不幸”的后果，又能集中优势发挥能动性，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

## 二、传统社会主义的反思

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存在的“发展性危机”表明，资本主义不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佳的、最合理的方式。那么，以传统的社会主义方式可以实现现代化吗？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入的思考。

### 1. 传统的社会主义状况表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的认识并没有达到科学的程度

先看中国的情形。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追求。它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纲领上，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进行民主革命所期待的前途。经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中国共产党豪迈地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确立起来，中国进入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人的兴奋，不仅在于自己的奋斗目标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而且真诚地认为有了这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社会生产力将迅速发展，中国将摘去“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然而，时隔不久在实践中我们就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严重失误。而且，在这些失误发生前甚至发生过程中，我们都非常自信地认为：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大踏步地奔向共产主义。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了极点。因此，当我们从

“文革”这场灾难中走出来时，不得不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

邓小平认为，关键在于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在公开发表的材料中，从1980年到1994年他先后不下20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其中主要的出发点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比如1980年4月12日，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尤其是1985年4月15日，他系统地阐明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里，鲜明地强调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如果说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如果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造成的，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有不清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116页，人民出版社，1993。

醒的地方，那么，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又如何呢？邓小平在1980年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样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 1985年8月，他又一次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这就是说，像苏联这样已有相当实力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正是鉴于这一点，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

还有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到60年代，一大批国家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束缚获得了独立。由于它们长期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歧视和欺凌，对资本主义有一种自然的厌恶，加上它们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大多获得过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或帮助，因此其中不少国家独立后都向往社会主义，甚至直接把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联系起来。其中，流行于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社会主义思潮，尤其引人注目。比如恩克鲁玛主张的“加纳式的社会主义”、尼雷尔提出的坦桑尼亚“乌贾马社会主义”在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很有影响。这种非洲社会主义思潮在各国形态各异，名目众多，而且同我们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许多非洲国家在搞社会主义时，都以不同形式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如加纳建立了大批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坦桑尼亚广泛实行主要经济部门国有化和建立农村乌贾马村运动（土地和主要生产工具归村社所有，村民集体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3。

动，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形成财产公有、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乌贾马大家庭）。这些新兴独立国家原来想通过这样的社会主义措施来建立平等、公正的新社会，但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标，而且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比如加纳从1963年3月到1965年9月的两年半时间内，粮食价格上涨了83.3%，引起了人民强烈的不满，再加上不顾国力进行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终于造成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致使恩克鲁玛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失败。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也是如此，迫使他们在1975年决定停建乌贾马村。尼雷尔在1984年坦率承认：“我们犯了许多错误，国有化实行得太多、太广泛了，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邓小平很重视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次同非洲国家的政治家探讨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早在1980年4月21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他就振聋发聩地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是名字很光荣，就好。”同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988年5月18日，在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他特别指出：“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

参看《参考消息》，1985年12月23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93。

不难看出，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存在着不少疑问，距科学的社会主义尚有距离。

## 2. 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长期以来，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一种倾向，即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客观经济标准来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苏联模式”在实际工作中就长期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按照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一味按照僵化的、被扭曲的社会主义观念裁判现实生活，结果使社会主义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科技竞争中，严重落伍，处于明显的劣势，进而导致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的挫折和失败。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重新提出并审视了社会主义的客观标准和实现、发展的途径问题，把它当做一个既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着力予以解决。

是以生产力状况还是以制度本身和意识形态作为判断社会主义是否实现的根本标准，事实上是存在着很大分歧和激烈争论的。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重新审视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提出判断社会主义是否实现的根本标准，是生产力状况而不是属于主观范畴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

第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合理和优越，最根本的不是看它的自身结构如何，而是看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怎样，即是否更有利于生产力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制度结构的评价主要依据的是实际功能。离开社会制度的实际功能孤立地评判其优劣，是不科学的。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功能则是束缚或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既然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那它的基本原则的实现必然带来生产力的更快发展，或

者说只有确实比其他社会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那才能说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原则实现了。

第二，从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变为社会现实的历史过程看，正是基于资本主义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于解放生产力，满足和保障人民利益的原初动机，社会主义才应运而生，广大人民才选择和接受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在于它更能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胜，最根本的是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否则，就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利益，就会丧失其经济合理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实现。

第三，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普遍的共同的贫穷更不是社会主义，特权利益和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而无论是消灭贫穷还是消除两极分化，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不能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消灭贫穷和两极分化，就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原则。这样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是冒牌的社会主义，最起码也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第四，只有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公正原则才能逐步实现。同时，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再加上精神文明程度的同时提高，也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基于生产力标准，邓小平认为，像我国这样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够格”的，还处在“初级阶段”，只有在达到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实现了人民普遍的共同富裕的时候，才能说社会主义比较“够格”了，社会主义原则也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实现。当然，这不是说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原则。由社会主义来完成本应由资本主义完成的现代

化任务，确凿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在缩减，社会主义的适应性在增强。尽管未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但只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通过更科学、更民主、更有效的方法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发展了生产力，那就是在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社会主义也就是在逐步实现。

与判断社会主义是否实现的根本标准紧密相关，邓小平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在许多人看来，社会主义本质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因为本质总是隐藏在现象背后，不是经验所能直接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社会主义的许多原则和制度要素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我们现在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邓小平文选》中，多次谈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比如：1980年5月5日，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1985年8月21日，他指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 1990年12月24日，他又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1992年初，他做了明确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些论及社会主义本质的地方，前面两处提出了这一概念，然后论及到“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最后是总结性的理论概括，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这说明邓小平是经过长达十多年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3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

思考才逐步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它的提出和解决代表着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先进水平和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这是因为这一概述中体现出以下的特征：

（1）完整的层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由单个要素构成的简单事物，而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会经历发展的漫长过程。对于这种具有特殊的系统性和过程性的复杂事物的本质，如何进行界定，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研究与创造工作。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本质作了两个层次的概括：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一个层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又一层次。这一概括既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问题，又包括了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突出地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纠正了过去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观念，反映了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初级阶段特别需要注重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体现了在当前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战略决策；它突出强调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指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与以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根本不同。

（2）科学的阐释。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概括时，特别注意到在这一问题上“左”的和“右”的理解，强调必须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各个因素不可偏废。因为光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无法同右的观点划清界限，无法澄清人们头脑中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例如有的人就提出一个怪问题：按照生产力标准，美国生产力发达，难道美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不仅在强调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且同时强调生产



力的解放和发展是为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样，仅仅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貌似正确，但它无法同过去那种离开生产力实际状况“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的“左”倾观点划清界限。同时必须看到，邓小平在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之前，先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不是偶然的，它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原理，即社会改造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因此，这种表述的完整性，正是这一理论达到科学性的体现。

（3）实践的价值。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直接而又深刻的指导性。首先，它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次，它指明不要把计划经济等非本质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固守。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时，它前面的那句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重要本质的科学概括，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再次，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它为坚持公有制、完善和发展公有制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革中如何对待公有制经济的难题。目前我们提出不仅要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体制，而且还要大胆探索公有制的各种实现形式，这一决策的出台与实施应该说直接延续了邓小平的思路。

### 三、“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式”的现代化

邓小平认为，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进程，绝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一种实现方式。有“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即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现代化；也有“无产阶级干的现代化”即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的现代化，以及“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当然，承认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它们彼此间优劣的价值评判。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应当成为其实现现代化的主体方式。

#### 1. 资本主义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方式

邓小平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也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用这种斩钉截铁的语言，决绝地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严格区分开来，从而批判了现代化问题上把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的错误观念。

应该说，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等同起来，认为实现现代化就要“全盘西化”、资本主义化的观点还是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的：第一，西方资产阶级确实是现代化的第一批先行者和倡导者，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第二，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曾经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获得过成功，自英国始，然后涉及西欧、北欧、东欧，其次是北美，后又东移日本，资产阶级占据着统治地

位，资本主义方式是历史上现代化曾经成功的一种模式。第三，在当今世界上，现代化了的国家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第四，在当代要实现现代化，某些方面要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也不可避免地是经济上不发达国家追赶经济上发达国家的过程。比如我国21世纪中叶要发展到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考察人均收入与国家实力时，也常用“美元”来统一评价等等。由上述这些原因所致，确实会引起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作同一理解的错觉。

然而，这仅仅是历史的一页。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这一模式，只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种模式。邓小平向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仅仅是“资产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以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现代化，它只是以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一种道路、一种方式和一种途径。而现代化，即实现社会化大工业的方式，决不会只有一种模式，而是多种多样的。有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新兴资产阶级的现代化，也有无产阶级现代化以及第三世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它是世界各国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实现的世界历史大潮。如果说在20世纪中叶以前，现代化的主要模式是资本主义化、西方化，那么，历史进入到当代，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加之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后果所显现的种种危机动摇了它的主导地位，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也就必然产生变化，现代化的模式必然发生历史性的转换，应当是以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模式为主导的。在中国，邓小平提出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实质。

当然，邓小平是辩证论者。在否定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确认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的同时，也强调现代化问题的共性。无论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既然都叫现代

化，便应当符合现代化的共同性。现代化的内涵是对多种模式现代化的共性的抽象和概括。这个抽象是有深刻的基础的，它是对以社会化大生产、工业文明代替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农业文明这一历史过程的一些共同规律的抽象。依据邓小平的理解，这些具有共同规律性的东西主要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发展必须经过市场经济这个阶段，必须解决从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到非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转变，必须解决人口合理性流动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性配置的问题等等。

既抓住现代化的共性，又强调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这便是邓小平对现代化的辩证理解。一方面紧紧抓住现代化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认定解决的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方式、西化的方式，而是社会主义的方式、有中国特色的方式。邓小平的这种理解走出了现代化问题理解上的历史怪圈，剥夺了西方资产阶级对现代化将近二百年的垄断权，使现代化成为全人类的财富，成为全人类走向发展的必经途径，从而为中国、为世界的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展示了极其广阔、极其丰富的前景以及多样化的道路、模式和实现方式。

## 2.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式：内在根据·现实必然·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长期以来遭到被误解的命运，上节我们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和认识没有达到科学的程度；实际情形还不仅如此，在西方许多学者那里社会主义更被曲解得变形、离谱。他们抓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和缺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认定社会主义学说从“哲学基础”上就错了，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没有多大合理性与科学性；社会主义学说夸大了理性的作用，崇尚暴力、专制、阶级对抗和仇恨，忽略了人对个人自由及其他基本权力的追求等。

必须指出，这些观点并没有尊重全部事实，没有分析社会主义成就的原因，只是在谈论社会主义失误的原因；他们更多地是在评论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评论“左”的思潮及其造成的影响，把僵化体制和“左”的思潮的错误当作社会主义，而不是客观分析、评论社会主义。他们更没有看到，社会主义自己也已经否定了僵化体制和“左”的思潮，重新回到科学的社会主义轨道上。无视科学社会主义的存在和作用，用并不能完全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社会体制和根本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左”的东西取代社会主义本身，是本末倒置和张冠李戴，是科学所不能容忍的混淆。由此得出的否定社会主义合理性和科学价值的结论，也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

当然，若说他们完全没有分析社会主义原则本身，也有些冤枉。事实是，他们也激烈批判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却离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病和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镇压、离开封建主义势力的反抗等基本要素来抽象地批评社会主义“崇尚”暴力和阶级仇恨，离开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来看待暴力斗争。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崇尚暴力和阶级斗争，如果能和平地进行社会变革、实现社会进步，那么社会主义者何苦非要去流血牺牲呢？资产阶级不要忘记自己的自私和偏狭，自己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在进行这种镇压时是多么地热中于暴力！撇开暴力的社会积极功能不讲，如果把暴力斗争一概视为“灾难”与“谬误”，那么也应该说，资本主义正是造成这种灾难和谬误的主体之一。

究其实，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所具有的必然性、合理性基础和无可否认的科学价值在于：它较科学地洞悉和透视了早期资本主义的状况、弊病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推进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表达了人类对公正、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指明了方向；从重视社会、整体

协调、理性和平等的角度，对个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自由与必然、本能与理性、效率与公平、社会与环境等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科学探索，提供有别于并在许多方面优于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有利于人类社会向既充满活力又持续协调的良性状态发展；从更广阔的背景看，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反映社会发展大趋势的不同制度和道路、方式的探索和实验，人类将在不同制度的和平竞争与合作中走向更高级的多样性统一。社会主义方式是不可或缺的和最终必将取胜的。

对于现代化来说，社会主义方式不仅有上述理论上的内在合理性，更有现实必然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以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快地速度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200多年以后的20世纪，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方式。后发展国家面临的诸多问题，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方式才能得到解决。邓小平一再指出：“中国的麻烦在于人太多，每年就业的青年有七百万到八百万，按资本主义的方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低下是后发展国家共同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搞资本主义，只能使大多数人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尽管可能有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的问题。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结晶。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历史，诚如邓小平所说，它“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同样中国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由历史发展所决定的，邓小平说：“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改变的。”而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六十年的斗

争历史”。

那么，这种既有内在理论根据，又有现实必然性的社会主义方式，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

（1）社会主义方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作有益的补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共同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做‘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本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若是现代化瓦解了公有制，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中也是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深圳的，他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

（2）社会主义方式以共同富裕为目的。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以私有制为基础，导致了尖锐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冲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而要既不导致两极分化，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为此设计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发展方针，力图使中国式的现代化成为史无前例的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成为全社会成员合理地利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发展自己的现代化。

（3）社会主义方式是有规划有设计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基本上可以说是自发地实现的，既没有谁事先设定目标，也没有谁统一地规划出一定的道路和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做不到的，社会主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人民出版社，1993。

义可以做到。社会主义可以综合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的优点和缺点，吸取它们现代化进程中经验和教训，事先统筹规划自身发展的目标、道路和步骤，这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目的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优越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点。

（4）社会主义方式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这仍然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

总之，无论就内在理论根据，还是就现实必然，以及基本内涵看，社会主义都是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方式。

#### 四、现代化实现方式的现代化

我们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但并不是说二者之间无优劣之分、正误之别；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新特点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看，现代化实现方式应有一个大的转换，近300年来的资本主义方式应让位于社会主义方式，现代化实现方式亦应该现代化。

##### 1. 对比的启迪

我们的论证先从两种制度和方式的对比开始。

在《邓小平文选》中多处涉及到两种制度和方式的优劣对比，体现出一种全面、科学、实事求是的价值评判原则，对此可



以作以下的概括：

（1）纵横对比，即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就是看历史的发展。邓小平多次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体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超过我国现在的水平，并且已经揭开了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的序幕。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刚刚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我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起步的时间不同，发展的基础不同，这正是造成我国现实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尚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因。我们要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二百年发展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更加适应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以相当高的发展速度达到了今天的水平，如果不是抱有偏见，那么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做纵向对比时，我们不但要看到经济，而且还要看到政治、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

横向对比，就是把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置于同一阶段上进行比较。例如，我国从1979年到1990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从1978年到1991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2%。这种速度是世界少有的。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人均产值增长1倍，分别用58年、47年、34年，而我国只用了10年时间。从这种对比中也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方式大大优于资本主义方式。在做两种生产方式的横向对比时，邓小平也注意进行现实的比较，找出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以此激励我们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2）动态对比。即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两种社会制度和实现方式。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在世界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

革，无不经过曲折反复的斗争；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无不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所以，邓小平在做两种社会制度对比时，坚持发展的观点。具体说，他充分注意到资本主义在当代也在变化、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征，仍然有一定的生命力，但由于其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驱使，使资本主义正一步步走向衰落。当然，这一过程不是直线的，但却是它的必然归宿。社会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且同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尚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经济发展速度却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坚持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运用适当的手段，就能不断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3）系统对比。即把两种社会制度的比较看成一个系统，然后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具体说，两种社会制度不仅要比经济，而且要比政治、文化、道德风尚；不仅要比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要比现实生产力发展速度；不仅要比社会现象，也要比社会本质；不仅要比局部，而且要比教全局；不仅要比现状，而且要比历史和发展趋势；不仅要比结果，而且要比原因。总之，要全面比较两种社会制度的全貌。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衡量社会的进步与差距。

（4）区分对比。即对两种社会制度进行比较时，特别是谈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某些弊端和问题时，注意本质与现象、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分。具体讲：第一，把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实际存在着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区分开来，避免以某些不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现象来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二，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区分开来，避免利用某些体制上的弊端和不完善来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第三，把可能性与现实性区别开来，不能因

为社会主义目前还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就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必将超过资本主义社会。

(5) 典型对比。邓小平认为，历史、国情大体相同的国家最有可比性。这方面中国和印度是条件大致相近而又分别采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典型。两国都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近代以来，两国都曾遭到帝国主义列强野蛮的侵略、掠夺和蹂躏，处于贫困落后的境况之中。印度于1947年独立，比新中国成立早两年。在当代，它们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拿中国和印度相比，无论从横向比，还是从纵向比，可比性因素很多。印度独立时，在人均资源、自然条件、原有工业基础方面比新中国成立时要好一些。目前印度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人口的比例以及科学技术某些领域也比中国先进；然而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方面看，中国明显超过印度，这已是国际公认的事实。在主要产品的人均产量方面，到1998年，中国的粮食为印度的1.6倍，钢为3倍，煤为3.5倍，发电量为1.8倍；在医疗、初等中等教育、营养健康水平方面，中国也明显高于印度；至于主要产品的绝对产量，中国更是遥遥领先。印度至今仍有半数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之中，每年有大批人死于饥饿。造成中、印差距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差异，即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印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对比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适合社会化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更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更能保证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

## 2. 从奈斯比特的预测说起

对比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在当代社会呈现出新的特征，而适应这种特征的是社会主义方式。

被称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

翰·奈斯比特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10个新方向》中分析了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即：从工业社会向以创造和分配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转变；从受制于技术到高技术和高情感的平衡转变，人类会给每一种新技术配上一种起补偿作用的反应；再也不能安然地置身于孤立、自足自给的一国经济体系之内，必须承认自己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从一个由短期考虑和短期报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向处理事务时以更长期考虑为框架的社会过渡；重新发现革新与追求成果的能力，由集权到分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向组织机构求助转向依靠自助；在立即可分享信息的时代，代议民主制已过时，转向民主参与制；不再依赖等级制而赞成非正式的网络；从具有经济活力的北方转向南方；从选择范围有限的非此即彼的社会迈入一个多种选择的社会。

而在1991年推出的《90年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书中，奈斯比特又对90年代社会的变迁作了具体的预测。其基本观点主要有：科技的发展和各国政策的调整将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将给国家和个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国际间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西方经济将继续保持繁荣，东方也将迅速崛起，中国在未来的20年之后会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环太平洋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心，中国沿海会成为“黄金海岸”；个人的能力将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大潮流势不可挡，社会主义国家正处在市场机制的大变革中；全球生活方式日趋统一，民族化也日趋加强；生物技术时代的来临，生物工程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将日趋深远；全世界将再度兴起宗教信仰热潮；个人的创造性和价值将得到充分发挥。当然在展示未来光明前途的同时，奈斯比特也提出了忠告：科技高速发展令人忧喜参半，尤其是生物工程技术有可能伤害人类本身；癌症和艾滋病都是威胁人类的大敌等等。

我们看到，奈斯比特的预测有现实依据，但原则却相当混

乱，比较起来，前一本书着眼于宏观走向，后一本书着眼于具体变迁。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供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并使人类“防止”光明前景被“蒙上阴影”，而“告别过去，迎接新的时代的黎明”的途径、手段、方式。

资本主义方式显然不能奏其效。比如说，高技术条件下人的异化状态、考虑问题的短期效应、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少数富人阶层对财富和权力的统治以及全球经济振兴中不忘保持世界工业领袖地位的图谋、极欲推广价值观念的霸道、科技成果的误用和滥用、现代病的蔓延等等，都将与资本主义方式相伴始终。不放弃资本主义，这些就无法疗救。

社会主义正好能适应新时代的这些变化趋势，且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威力。

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重视加强政治手段。一是政治为经济服务，实施宏观调控功能，二是政治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这是一些资本主义所不可比拟的。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多数采取经济手段（偶尔也使用军事手段、政治手段）。加之，资本主义所有制导致组织松散，无政府状态突出，因而现代化进程出现自发趋势。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却处处注意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不可能具有西方工业化时通过血腥手段而得到的原始积累。社会主义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内部积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注意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保证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只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忽视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社会问题极为严重。社会主义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尤其注重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时，抓精神文明，努力造就既有理想目标、文化素质，又有高尚道德情操的新人。同时，对外奉行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的独立

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国内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处理好各种关系，保证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和平安定。

第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无疑也要大力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吸取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决定了只能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光靠外援是没有前途的，而必须充分发挥内部的优势与潜力，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对外开放方针也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进行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展国家决不能做别国的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不能做任何大国的附庸，而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

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政府的指导和组织下进行。在现代社会，政治在经济上仍然必须拥有相当的宏观调整权力，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既有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成分，也有其他小型经济的有益补充。政府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也使整个经济具有计划性，国家通过计划的、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对整个社会的重大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管理、检查、指导和调节，实行统筹规划。这样做的优点是能够迅速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基础工业建设，支持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加快建设速度，有利于技术和市场的开发，提高产品质量。

总之，现代化进程推进到当代，进入一个转折时期，在资本主义方式渐显颓势之时，社会主义正前途光明。

### 3. 社会主义方式取代资本主义方式的必然性与现实性

无论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对比，还是从对现代化当代趋势的适应程度看，社会主义都是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更合理的方式。但是在现实情况下，二者之间还不会是一方立即替代另一方，“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才能代替资本主

义”。这是因为：

第一，历史的起点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制约着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式的完善和成熟程度。因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充分发挥要有一个过程。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这种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不完善的、不成熟的，它所体现的优越性，也必然是不充分的。而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过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越来越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式的优越性。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改革的社会，而改革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式的优越性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现实社会主义中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合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彻底改革。中国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解放思想，经过反复探索、比较和总结，才终于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由此可见，通过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将是长期的。

第三，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由于主观和客观始终存在着矛盾，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失误和挫折。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式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也往往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从十月革命算起只有90余年，在我国也只有50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几十年时间还不可能积累起十分丰富的经验。在中国有过两次严重的失误，一次是“大跃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都

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一方面挽回失误造成的损失，从挫折中站起来需要较长的时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保证在今后不再发生一点失误。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可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过程，只有扎扎实实地沿着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或者说不犯大的错误，不走大的弯路。这样就能加快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式的优越性一天比一天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和方式的优越性由现在的初步发挥到充分发挥，取决于许多条件，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有待于我们几代人的长期努力。

正因为如此，在现实情况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既不是剑拔弩张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也不是不讲原则的“趋同”关系，而是有竞争、有合作、有借鉴、有继承、有扬弃。

在这方面列宁是颇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的晚年思想是一个尚待挖掘的宝库，正是在那种非常时刻（国际国内情形复杂、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等），他高瞻远瞩地谈到应向资本主义学习和继承的问题，他论述得很多，很明确，很具体。比如，在1919年俄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就反复说，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所遗留的一切“材料”，一切技术和文化成就，我们只有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使共产主义变成群众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不仅要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文化遗产，而且要向资本主义学习。他说：“我们现在要向他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

《列宁选集》第3卷，第766页，人民出版社，1995。



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我们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的知识。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时，列宁仍然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的必要性。他在《论粮食税》一文的结论中写到：“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学到东西就行。”

同样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认为：“列宁的思路比较好。”在当代必须转换思路，解放思想，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本身没有什么阶级性，社会主义应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同样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没有什么阶级性，社会主义也应学习、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落后，在发展生产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等方面，缺乏经验，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则经验丰富。因此这个学习更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把这方面一切有益的东西都当做资本主义性质的，一概加以拒绝，惟恐学习了这些东西，社会主义就不能坚持，就会演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左”的思想的当代表现，我们“应当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当然，邓小平也看到，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总有那么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怀有天然的敌意，总把社会主义视为异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看作是对自己的威胁，对

《列宁选集》第4卷，第525页，人民出版社，199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3。

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更不能容忍。惟恐这些国家发展了，强大了，对世界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会使一些国家摒弃资本主义，选择社会主义。为此，他们采取各种手段，从施加政治和意识形态压力，到经济封锁和制裁，压制、扼杀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朋友要交，但要做到心中有数”，涉及到原则问题不让步；经济上既要学习又要竞争，政治上既讲和平也讲斗争。

最后，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归纳：在当代，现代化实现方式的现代化，包含着双重内涵，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更新、更快、更合理的方式在逐步崛起，走向完善；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方式未完全丧失价值而被替代之前，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与趋同，而是竞争（包含了斗争）、合作、促进。

显然，这是符合现代精神的理性态度和正确选择。

## 第五章 “后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设计

如果说对当代实践格局的准确分析与现代化新型实现方式的慎重选择，显示了邓小平对现代化与发展问题清醒的理性思索，那么对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现代化起步比较晚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与设计，就更集中地表现出他的发展理论所具有的实践性、操作性特征。我们说，邓小平对现代化与发展问题的思考是全面的，但也是有侧重点的，他那广阔的远程视野的落脚点，是对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展问题的实际解决。

### 一、“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不平衡问题

马克思是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创始人。他预见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交往的渐趋普遍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将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整个世界进入“一体化”进程，这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就现实情形看，这种世界历史体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而形成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

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生产的繁荣和社会化以及需求的扩大，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随着美洲的发现以及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发现，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世界市场中所进行的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交往、文化交往，并且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样，资产阶级就“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由于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加之在世界历史形成中资产阶级所扮演的先行者的角色，而且在当代业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大多是资本主义国家，决定了这个由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必然会出现畸形、扭曲和不平衡发展。在上章第一个问题中我们着重谈到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发展性危机”，这里我们来剖析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世界发展不平衡现象。

### 1. 根源与本质探究

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世界历史体系的总体结构必然具有“等级森严的性质”。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与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分不开的。因为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内在地含着的生产的国际化与社会生活的民族或国家组织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具有对抗的性质。进而言之，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生产的国际化过程是与资本强行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使世界上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少数发达国家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特有的“中心—外围”结构正是由此而形成的：“中心”地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

集中和垄断着物质、科技形态的资本和财富，是生产与控制中心、债权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外围”地区则是贫困不断蔓延的债务危机区和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地区。这种两极结构在二次世界大战前表现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农村”间的国际分工，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表现为“世界城市型”地区与农矿业低技术加工以及污染工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地区间的国际分工。

在当代，以非物质材料生产（即第三产业及与其相关的部门）为主的经济结构，以高新技术和高资本有机构成产业为主的生产部门，高度发达的科技教育，实施高社会福利政策，这四点“世界城市型”地区的基本特征。“世界城市型”地区的形成是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首先，中心区通过数世纪对外围的掠夺，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并抢先建构了重工业经济结构，这就为率先实现工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再则，中心地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通过剥削全世界以加速发展自己”的特殊部分，为了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和垄断高技术，为了把输出的技术商品转化为不断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当代就必然在外围区发展民族经济的浪潮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技术控制的形式延续其产业资本的剥削网。最后，利用当代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伴随着按零部件和工序生产的新工艺分工出现的机会，追逐高额垄断利润的中心地区将污染工业、基础工业、夕阳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等逐渐转移到外国，而把大量资金投入科研、教育、为银行和个人生活服务的电信行业以及高技术领域。总之，中心地区的财富、资本扩展的规模和范围越大，它对世界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利息率）、国际贸易的垄断和控制能力也就越强，从而对外围地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而农矿业低技术加工和污染工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区则是另一番“景象”：承担越来越多的低技术、笨重或污染性的体力劳动；在“世界城市型”地区所铺设的产业资本剥削网、借贷资本剥削

网和国际贸易剥削网的控制下而负债累累（据统计，发展中国家负债总额在1999年已达到1.5万亿美元）；生存危机加重；贫困和落后的状况日益加剧（80年代以来，南北差距日趋加大。据有关资料统计，1968年南北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14.9，1977年为1:15.5，1987年则为1:20.2。1990年占世界人口76%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收入的20%，其中占世界人口半数的穷国的收入仅为世界总收入的2.6%，而占世界人口15%的“中心区”占世界总收入的70%）；难以摆脱的增长危机和财政赤字（1981年，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3.8%左右，到1999年已为80%左右）。有些西方学者往往把外围地区日趋悲惨的处境归之于该地区的政府管理不当、政策不对头等方面的原因。应当承认，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但在总体上却不能说是正确的。从本质上来看，外围地区日趋悲惨的处境是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结构、基本矛盾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扩展的基础上产生并发生作用的。

## 2. 不平衡现象的表现形态

在当代，世界历史体系中不平衡发展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但从其本质上看都根源于结构性不平衡发展规律。主要有：

（1）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不仅反映在西方各国的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及其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同时反映在中心区各国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中。自80年代以来，这种竞争愈演愈烈，其结果，美国在中心区的绝对优势丧失了。先从国际贸易方面看，1983年以来，日本的贸易顺差迅

速上升，最高年份（1996）达904亿美元，德国最高年份（1998）达728亿美元，而美国贸易则连年逆差，最高年份（1997）年达1669亿美元。直到1991年，这一不平衡的态势仍未减弱，当年美国的外贸逆差为660亿美元，日本和德国的外贸顺差分别是782亿美元和130亿美元。巨额的贸易顺差和逆差又反过来加剧了中心区国家的贸易摩擦，从而使保护主义抬头。再从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看，自1990年以来，美国、日本、西欧经济实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到1999年，欧共体12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60100亿美元，已超过美国的53910亿美元，日本也达29420亿美元，为美国的一半以上。在国际储备方面，欧共体达3366亿美元，远远高于美国的852亿美元，日本也达797亿美元，与美国接近。另外，在高科技领域方面，美国也受到了来自日本、欧共体的强有力挑战。例如，日本已成为半导体方面最大的生产国，并在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电信、生物工程和制药等方面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简而言之，90年代以来，中心地区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强烈的冲击使不平衡态势有增无减。

（2）后发展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70年代以来，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趋明显，发展较快国家的年均生产增长率几乎是发展较慢国家的5倍。与其他洲域的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处于领先地位。在9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在亚洲。而拉美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有所好转，但也只是刚步出经济长期下降的阴影（指经济增长刚刚由负转正）。90年代的非洲经济增长率与80年代后期基本持平，保持在3%左右，然而由于其经济增长率仍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故这一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在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必然导致发展中国

家在利益要求上的差别。其中某些发展较快的国家日趋向发达国家靠拢，从而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内聚力，同时对南北关系也将产生复杂的影响。目前学术界有的人根据某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外围国家被纳入发达国家的经济集团这一事实，断言资本主义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将会弱化。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能被纳入发达国家经济集团的外围国家，除了经济增长较快外，还要具备优越的投资环境和资源条件，或对中心区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意义。具备上述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外围区当然是少数。对发达国家来说，外围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早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了。在这种情况下，企望发达国家帮助大多数贫穷国家“致富”，那是空想。

(3) 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日趋加大。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性不平衡发展规律最基本的表现形态。这种不平衡的加剧除了表现在人所共知的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方面外（据统计，1993年世界人口约56亿。北美、欧共体和日本16个发达国家的人口为8.7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6%，国民生产总值约18.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70.34%。西方七个大国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2%国民生产总值却占世界总产值的62.5%。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50年内，全球财富增长了6倍，但穷人与富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占全球人口20%的富人拥有世界财富的75%，而占全球人口20%的穷人人均每天不足1美元。少数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其中瑞士高达3.06万美元，人均每天100美元，而有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0美元，人均每天0.2美元。）还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发展日趋不平衡。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迅速发展，南北贸易愈加不平衡。由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建构调整较慢，出口商品层次较低致使不少国家贸



易条件恶化，贸易地位日趋低落。目前70%世界贸易集中在发达国家或为发达国家所控制。另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需求逐渐下降，致使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生产下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二，国际资本南北流向的日趋不平衡。8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际资本流向日趋转向发达国家，而对南方国家来说，投资不仅日趋缩减，而且还出现了资金严重倒流现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贫富鸿沟的日趋加深和扩展，必将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不平衡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发展。只要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存在和发展下去，这种现象就会持续出现。对于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来说，如何探寻到一条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又符合本国国情的强盛之路，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 二、“后发展”国家特有的难题

作为邓小平发展观形成的大背景，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艰难步履，在第一章中我们已作过大致的分析；而要为后发展国家设计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方案，又必须更加具体细致地分析这些国家面临的种种难题，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作为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类型，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从动因上讲，并不是自身内部现代性不断积累的结果，而是在外部条件的刺激和胁迫下，即使是本社会内部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的积累，也必须将现代化强行启动，以摆脱自己的落后状态，消除外部威胁。这样政府不仅要直接介入现代化过程，而且往往必须成为现代化的实际组织者。正是认识到这一

点，本世纪以来后发展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政治变革，摆脱了殖民统治，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试图加强内部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的程度，为统一的全国性的经济和政治的形成创造条件。然而这一良好愿望并未完全得以实现，有的宗主国表面上将统辖权撤消了，但殖民主义影响并未随之消失，仍以隐性手段和方式控制这些国家；有的后发展国家国内政治派别争权夺利，政治持续更迭，政局动荡频繁；还有的掌握了全国性的政权的领导人却没有推进现代化的志向或影响力。

就是那些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政治环境的国度，在实际的发展中也交织着复杂的矛盾，出现了特有的错位、失衡和两难窘境。

### 1. 错位现象

所谓“错位”指过去农业社会那种自然演进的逻辑关系被打破。这种错位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由传统因素的瓦解和现代性因素的生成的异步性造成的错位。

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将外部的现代性因素引入到传统社会中去引起传统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的解体，促使新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生成。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是现代化初期阶段最基本的过程。问题在于，传统因素瓦解的速度与现代性因素形成的速度往往并不同步。传统因素瓦解与现代性因素生成的这种异步性，会给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带来一系列的“真空”或危机。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传统的权威基础消失很快，而新的法理型权威基础形成缓慢，会形成权威真空或权威危机，政权会由此缺乏合理性基础，不被统治者所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难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连自己的生存和稳固也大成问题。第二，经

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教育的发展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增多，都会从根本上动摇原有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整合机制，而新的整合机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结果是形成生活方式的整合危机，严重时会造成生活和政治上的分裂。第三，旧的价值和规范系统的迅速消失和不能发生作用，以及新的价值和规范系统形成的缓慢，会形成“价值真空”现象。随之而来的是自我认知、价值目标和道德规范的混乱。

其次，突然提出的新任务与正在形成的能力之间的错位。

这种错位现象首先表现在政府的能力上。正如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中，往往需要政府发挥多方面的作用，甚至要成为现代化的主要启动者和组织者。但在许多后发外生国家，政府却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而政府效能的低下，则是更普遍的现象。这就使政府很难具有为启动、参与和推动现代化所必需的能力。其次，政府要成为现代化的主要推进者，除要具备明确的现代化取向之外，还需要有一个完善而有效能的行政科层系统。但在许多后发外生型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行政科层系统很难形成。第三，推进现代化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力量。但许多后发外生型国家，这种社会力量的形成也是困难的。在军人充当现代化主要推进力量的国家，军人也明显缺乏鼓励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而民间现代化力量的缺乏，不仅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而且使现代化缺乏经久不衰的内在推动力。

## 2. 失衡现象

后发外生型国家启动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部现代性因素的拉动作用。而在传统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开始的现代化，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这一进程在全国的所有地区展开。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现代化往往是从某些地区，特别是那些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首先开始。其结果就是在传统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形成

一些规模和范围都极为有限的现代化“孤岛”，也有人将之称之为“增长极”。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化的地区和部门同传统地区和部门之间形成一种互相封闭和排斥的关系。在现代化的地区和部门变得越来越现代的同时，传统的地区和部门似乎变得越来越“传统”和落后。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元结构”（或二元经济、二元社会）。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二元结构不仅没有逐步减轻和消除的迹象，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状况如不能改变，现代化就很难得到全面地推进和发展。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这种失衡现象也表现为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城乡关系的恶化。在这些国家，工业和其他现代化经济部门大都是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更有甚者，在有的国家中，一两个特大城市（有人将其称之为“首要城市”）就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经济力量，而农村的经济基础则是传统的农业。这些国家城市中的现代经济系统首先并不是与本国农村的传统经济部门发生联系，而是与国际市场、与发达的早发内生型国家的经济系统直接发生联系。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被甩在现代经济系统的外面，甚至成为这个系统的负担。这种分裂，不仅会对工业与农业产生双重不利的影晌，而且使城乡关系恶化，使城市和农村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发展中国家经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城市是高度现代化的，而农村则处于落后之中。早发内生型国家现代化伊始，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发展大体保持了同步状态，城市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几乎是同时成熟的。在有的国家，农村中的商业式的大农业制度的建立，甚至要早于大规模的工业化。这样，就在不同部门的发展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协调关系。但在后发外生型国家，典型的情况是其最发达地区（通常是首都再加上一两个大城市）的发展程度与西方最发达的城市不相上下，从经济到知识层

的思想意识上都具有某种“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其他一些城市通常处于“工业社会”阶段；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而在最边远的地区，甚至还处于前农业社会阶段。这样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反应在社会成员的情绪上，就是一种多样性的往往是互相冲突的要求。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自由民主的要求，工人和城镇居民对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社会公正的要求，农民对温饱的要求，有时还掺杂着部落成员对保护土生土长的文化、抵制现代性侵入的要求。但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政府只能集中精力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群体的利益和要求的忽视。这就要求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对这些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具有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 3. 两难窘境

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交织着各种极为复杂的矛盾：内部缺少现代性因素的基础，却要在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前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实现下一个目标的压力就已经达到不容忽视的程度；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基于人民的要求，又要有利于加强本国在这个并不公正的世界上的地位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两难窘境”。直到目前为止，这些窘境仍在困扰着许多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首先，经济上的两难窘境表现为解决贫困问题和增强国力的矛盾。在这一矛盾的背后，则是改善人民的基本生活与增强国力从而改善本国的国际地位的双重要求。从60年代到70年代初，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都曾实施过所谓“增长第一”的战略，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首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目标。毫无疑问这里有增强国力的考虑。但不久人们就发现，仅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

长并不能解决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也不能在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第一，相当一部分与人民的基本需求相关的产品的产值并不高，而一些产值高的产品却与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并没有直接关系；第二，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急剧恶化，相当一部分穷人很少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于是，自70年代中期以后，相当一批发展中国家转而采取“边增长边分配”、“公平增长”、“基本需求”等一些更带有人道主义色彩、更多地面向社会中的贫困人口的发展战略。但一些国家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的同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放慢了。

其次，这种两难窘境在政治上表现为强化政府的能力、稳定政治秩序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后发展国家现代化中现代性因素的缺乏，民间现代化推进力量的弱小，以及特有的规模和速度，都要求政府在现代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甚至要成为现代化的主要组织者和推进者。这样，就要强化政府的地位和职能，提高政府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而且，在现代化的初期，各种社会矛盾会进一步激化，现代化本身也会带来种种阵痛和混乱，这都要求创造一种稳定而有秩序的政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展开创造条件。但问题是，在这些国家中往往还同时面临一个政治动员超前的问题。其原因是，其一，早发内生型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示范效应”，唤醒了后发展国家人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意识。其二，许多后发展国家是经过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获得独立的，而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会造成超常的政治动员。这两个因素的作用结合到一起，就使整个社会的政治化过程加快，人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意识远远超过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并由此形成一种要求建立民主政治的巨大压力。从理论上说，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加强政府的效能和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并不是矛盾

的。但在后发展国家缺乏有效的政治整合的情况下，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就会出现矛盾。有的国家选择的是优先考虑政府的作用，尽量推迟民主化进程，结果是无法将已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吸纳到体制中去；还有一些国家做出的是相反的选择，结果是政权的软弱无力。在这两种情况下，政治动荡都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文化上的两难窘境。在外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后发展国家内部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会处于一种很微妙的境地。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中，由于传统文化自身的性质不同，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也不尽一致，但在外部的现代文化传入后，自身性质各不相同的文化之间又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摩擦或冲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较为严重的地方，现代化过程还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问题在于，在新的社会生活机制完善之前，传统文化还在承担着一些重要的社会功能。同时，现代化领导人在动员人民参与现代化进程时，也必须使用容易为人们所理解的由传统文化提供的符号系统。因此，在传统文化解体的过程中，便会带来一系列的解体 and 混乱。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发达国家现代化很少遇到的。直到目前，这些窘境仍在困扰着许多国家，能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它们能否取得现代化实践成功以及何时取得成功的关键。

### 三、社会发展的“跨越性”论证

必须指出，尽管后发展国家面临着上述许多特有的错位、失衡现象和两难窘境，增大了其走向现代化的艰难程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后发展国家只能承受一种永远落后的宿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存在永久的先行军与落伍者，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跨越、赶超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

跨越式发展更具有了内在根据与外部条件。

### 1. 跨越式发展是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具体形式

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总把跨越现象视为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之外的特例，认为是“对普遍规律和事件的符合逻辑过程的局部的暂时的偏离”。究其实，这种观点是割裂了社会发展的一元性与多样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的辩证关系。我们认为不存在离开多样性的一元性以及离开个别、具体性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从总体上看，社会发展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一般的道路，但这种共同规律、一般道路要通过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体现出来。跨越式发展就是这种具体的形式之一。

不妨把社会发展的历史作古代、近代、现代的粗略划分，我们便可以看到跨越式发展的普遍性（当然各个阶段跨越的特点并不相同）。

在古代，虽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还局限于民族或地域的范围内，各民族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但是通过“战争”这种“经常的交往形式”，落后民族在对先进文明民族的征服中不自觉地跨越了在隔绝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状态；或者征服者适应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被征服者，或者征服者带动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者。比如，在西方，日耳曼民族通过对罗马帝国的征服越过奴隶制而直接进入封建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每一次周边民族入主中原，最终无不被中原先进的社会制度所同化。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以及建立清朝的满族，都是通过征服使本民族的发展跨越了奴隶制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的。

到了近代，依靠“战争”与“征服”等形式已经不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辟了“世界交往”的新时代，形成了生产的国际市场和生产的国际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矛盾运动越出了狭隘的民族与地域界限，具有了世界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而是以跨越的方式跨入了世界民族之林。比如，非洲在成为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前，社会发展处于氏族公社阶段，美洲和大洋洲也处于类似的发展阶段，东方和斯拉夫民族则处于亚细亚公社所有制时期。但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交往”使这些落后的民族的历史发生了跨越，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现代社会是近代的延续。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了一个适合资本本性的世界体系。这种世界体系的运动，体现的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对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的剥夺，使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落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悲剧的色彩，处于一种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的畸形状态。这就迫使落后民族从资本主义之外寻找发展之路，因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成为现代社会跨越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古代跨越是自发的、盲目的，近代跨越是被迫抉择的，那么，现代跨越就是主体自觉、自为的行为了。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不是人类总体历史之外的特殊、个别的情形，而是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具体形式。从社会形态的一般发展而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亦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人类总体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这总体上的规律性、顺序性，在具体的民族历史中却常常是以跨越式的、曲折前进的方式来体现的，社会的发展是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即一元多线地进行的。

## 2. 跨越式发展的条件系统

跨越发展是社会普遍存在的具体形式，但它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它是社会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前提”。

(1) 生产力水平。我们说，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不仅仅是在最终意义上讲的，也是就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而言的。跨越的产生离不开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条件。跨越不是随意的，生产力作为主体的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能力，形成于人的需要向劳动的转化过程中，既是人们以往实践活动的结果，又是现实人的活动的前提。生产力并不是人之外的抽象存在物，而是形成、存在并发展于人的活动之中，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力的发展的历史就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或者说是社会主体力量不断增长的历史。前文所指出的古代、近代、现代跨越之所以有不同的特征，首先是源于生产力发达的程度不同。

(2) 交往方式。人类社会最初的发展是在彼此隔绝、互不干扰的条件下进行的，马克思设想，如果社会长久或永久处于孤立状态，那么每个民族都要重复同一的历史必然性，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正是由于交往促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逐渐冲破狭隘的地域与民族局限，打破了发展的隔绝状态，从原生态开始发生偏离，进而发生跨越。这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即使遵循着同样的运动规律，也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作为

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交往使得社会发展的确定过程发生了摇摆和偏离，社会发展产生了跨越。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所走的道路“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3）机遇。机遇是社会在波动中形成的可能性时间与空间，它往往表现为多种社会关系与矛盾链条的某一特殊环节。这一特殊环节既是国际矛盾交织而成之时，也是国际关系重组与调整之时。机遇具有随机性与不可重复性，因为时间具有一维性，即不可逆性，它以其一维性向前运动，去而不返。而当时间运动到一个关节点，由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一种有利于跨越的可能性空间时，如果及时抓住这种机遇，跨越就成为现实；否则，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失去了时间，也就失去了机遇，跨越就不可能了。

（4）主体自主能力。跨越式发展是主体利用交往而进行的选择、创造性活动，它体现着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人类总体历史的确定性与规则性要通过具体民族的历史发展体现出来，具体民族的发展往往是基于个人或民族的利益和要求而进行的，表现为社会主体趋利避害的价值选择行为。历史上的跨越，常常是在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落后民族与先进民族相交往的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迫或主动地利用先进民族的先进经验和成果，从而自发或自觉地超越某种社会形态，“减轻”发展所带来的痛苦，“缩短”发展的必然过程。社会主体的自觉自为程度，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的实现程度，决定跨越式发展的自觉程度。

### 3. 跨越式发展对后发展国家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在当代，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跨越式发展实质上就是其自

觉选择和建构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把握历史机遇、缩短发展过程、尽可能减轻发展代价、加快发展节奏的现代化实践，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跨越式发展”是后发展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惟一方式。

面对世界一体化、节奏加速度化的当代局势，以及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之间“富国越富、贫国越贫”的马太效应，后发展国家必须使出浑身解数，不甘落伍，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迎头赶上。邓小平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必须快，不应该总是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但稳定、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如果不明确或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丧失良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必须从新体制的角度来审视跨越式发展的高速度。百分之十几，这个速度是病态还是常态？站在旧体制的角度，超过以往惯常的速度就认为是病态。邓小平认为，有的人对此感到惊慌，大声呼喊，要“防止过热”，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婆婆当惯了，企业生产什么，速度有多快，由长官意志决定，现在放开了手脚，快了一点，打破了过去所谓的“计划”，似乎剥夺了某些政府的行政职能，因此有人就有些慌，就提出“防止过热”。但站在新体制的角度看，旧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革我们的社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出现百分之十几的速度，这就是常态。这种高速度、大发展，同大跃进时期不顾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在有可能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不敢迈大步，不敢登上新台阶，这是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思想特征，这是旧时代体制下形成的行为方式的表现。不改变这种旧体制下形成的行为方式与思

维方式，就不能适应时代的加速发展，达不到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就不能驾驭现代化的航船乘风破浪，后发展国家就要再次落伍。

其二，跨世纪的形势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

抓住时机，使现代化及时起步和长足发展，是后发展国家必须十分注重的问題。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许多国家都是抓住良好时机，形成一个高速发展阶段的。即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产生了许多时机，50年代西德腾起，60年代日本崛起，70年代跃出亚洲“四小龙”，8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也迅速发展。所有这些国家、地区的起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抓住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利用比较宽松的国际自由贸易环境，作出决策，抓住时机，迅速崛起。

在跨世纪的形势下发展的时机就变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后发展国家从落后中起步，若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发展，而且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还耽误了二十年”，已经错过了世界性的科技革命的那一次大好时机，错过了的时机再也追不回来了，关键是再也不能丧失新的时机。

邓小平认为，现在就是好时机。这个好时机是由以下条件造成的：

(1) 后发展国家国内条件有利于发展。大多数后发展国家认真总结了过去建设、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大胆改革了不适应时代特点的经济、政治体制或模式，确立了发展经济的总思路。同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所有这些表明，抓

住新的时机，迎接更大发展的国内条件已经具备了。

(2) 国际环境有利于发展。世界正处在旧的格局瓦解，而新的格局尚未定型的阶段。世界经济由原来的美国单一化格局走向美、欧、日多极化格局；政治上则由原来美苏争霸世界的两极化格局走向有利于和平的新格局；世界上巨大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如欧共体统一市场、亚太地区经济圈、美加自由贸易区等，由于竞争，将有利于后发展国家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总之，在国际环境挑战与机遇、风险与利益并存的形势下，后发展国家经济腾飞的时机大大增多了。

(3) 科技革命的新发展有利于后发展国家的发展。50年代的世界性科技革命正在走向一个新阶段，高科技的特征来势汹涌，“下一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后发展国家若能赶上高科技这股新浪潮，便能迅速地加入到新的国际竞争中，从而在经济上起飞，加快现代化进程。

#### 四、“后发展”问题的整体设计

思考“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不平衡现象、后发展国家特有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跨越式”类型，还只是邓小平解决这类问题的基础性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停留在这种纯粹的理论思考与宽泛的议论上，而是在实践中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设计了一条实际发展之路。这是一个由发展目标、发展阶段、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发展战略等构成的完整而系统的社会运动。虽然邓小平设想这些问题的着眼点在中国，但其意义已远远超越了中国的界域，对于后发展国家具有广泛的普适性。

##### 1. 发展目标

邓小平对发展目标的设想要言之有三点：发展中国家发展

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又是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同时，现代化的目标是一个包括社会各方面因素系统运作的整体。

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标是现代化。现代化是当代人类超越社会制度选择的最高命题。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或迈向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就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进而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现状的惟一途径，必须以此为目标、为中心，长期坚持，决不动摇。

但现代化又不是一个抽象的所指，发展中国家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邓小平一再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借鉴别国的经验、模式，但归根结底要有自己的发展目标，是一种特定模式的现代化。正如我们不能把“西方化”作为自己的现代化目标一样，发展中国家将来发达了，也不能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别国。质言之，发展都是“发展自己”，是从自己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发展。

同时，邓小平还注意到，现代化目标是一个整体系统，是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与运行。通过对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邓小平逐步完善了对现代化目标系统的认识。比如，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国家工业化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的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正式提出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重申了“四个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一次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这反映了对现代化认识较前有了深化。在80年代的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这种认识又产生了新的飞跃。1981年邓小平提出建设繁荣富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几次谈话中他将富强、民主、文明视为现代化的三大要求和目标，从而继承并扩展了对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认识。发展目标的全面性与他所强调的生产力发展中心论，相得益彰地把辩证法运用于对现代化目标的规定中，从而显示出对发展目标的科学性认识。

## 2. 发展阶段

客观现实的国情制约着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要想成功地解决现代化问题，就必须首先认识清楚本国的国情。发展中国家过去在现代化建设中屡遭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视本国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实际情形，生搬硬套别国的模式或他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某些时期以“超大、超公、超优越”的空想来指导处于现代化初始起步阶段的实践。这种教训十分深刻。为此邓小平深刻反思了中国国情认识的历史轨迹，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把握国情。这就是通过详实的社会调查把握大量真实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运用现代化科学的整理和统计方法对国情材料进行必要的处理；然后在科学抽象的基础上把握寓于国情现象之中的社会总体性质；又通过科学的比较方法即如历时态的纵向对比和共时态的横向对比确定本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正是通过上述认识过程，邓小平作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就中国的情形而言，经过28年（1949—1977）社会



主义实践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如何估计这种状况的性质，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颇不容易回答清楚的问题。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打破了那种静态的现象罗列和简单的价值定位，而是将其置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深刻反思中，更主要的是将其置于对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整个时期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的出台、执行到初步成功的经验的概括中。因此，他对这一构成其发展阶段论逻辑起点的问题的完满解答从反思历史到转换思路、从酝酿命题到明确内容、从尝试论证到准确表述，经过了从1977年到1987年整整十年的风雨征程。并不是原本定型、成熟的论断、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单向运动，而是实践孕育理论、理论提升实践的双向互动反馈过程，是新形势下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把握与运用。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初设想的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同。这一点，列宁、毛泽东都已有所意识。列宁在晚年提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毛泽东在1960年也有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提法，但他们都没有形成较成熟的认识，也就没有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邓小平在新时期所面对的是长期极“左”路线所造成的深重灾难的局面，是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路线指导下的“曲折”的实践。他指出，我国要搞现代化必须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什么是国情？就是九亿多人口的大国，80%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快30年了，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因此亟须改善生活。“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国情昭示，中国要发展必须确立从生产力角度来观察、思考问题的新思路，否则“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只能是缺乏根基的空中楼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是邓小平发展阶段论提出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正是基于首先解决全国人民特别是8亿农民的吃饭问题、温饱问题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考虑，邓小平主张不妨采取一些“往后退”的措施。他率先支持在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倡导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正是这些“往后退”的措施在实践中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促使邓小平更加清醒地对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作出再认识，在1981年由他主持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使用了“初级阶段”这个用语，但没有展开详细阐发，这说明这一命题已处于酝酿阶段，但其整体内涵尚待明确。对这个问题真正达到深刻的认识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实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而且改革开放的范围与程度渐次逐步扩大和提高。到1984年改革开放的实绩充分显示出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一实践历程把确定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三项内涵指标凸现出来：一是我国社会政治性质的鉴定；二是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准的估价；三是我国社会发展长期性预测。很明显，实践与认识发展到这一步已到了可以从整体上将先前提出的命题进行系统概括与阐释的时候了。正是在这一情况下，邓小平于1987年及时作了理论上的阐释，先后在《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十三大的两个特点》的谈话中阐明了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旨正如十三大报告所告诉我们的：其一，我国已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而不是离开社会主义；其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其三，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至少需上百年时间。这一发展阶段论的产生过程表明，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与邓小平理论智慧的创造性结晶，也必然是“实践”与“唯物主义”的

创造性结晶。

### 3. 发展主体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考察了实践所引起的我国社会主体结构的变化，从“人”的层面对社会发展阶段论给予补充与丰富。在邓小平看来，“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他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人民主体论的思想，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与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与群众观点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又注重研究30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使人民主体结构及素质发生的重要变化，使人民主体论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国社会发展的主体仍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但其内部情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首先取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他热情肯定农民在实践中的大胆创新，果断地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推行家庭经济承包制，使农民真正获得了生产和经营自主权。更为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中期之后，相当数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或就地兴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它不仅改变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布局，而且造就了一大批离土不离乡、而且眼界开阔、活力很强的新型农民队伍，邓小平高度评价农民结构系统中这一可喜变化。

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暴露了高度集中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地压抑着工业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主体性的发挥，而且这种条块分割的体制也不适应生产实践日益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尊重实践的邓小平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这种新型体制的建立将确保企业在经营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企业自身的活力和主体性；而体制的变革又必将引起观念的变革，引起工人阶级素质的提

高，使他们在现代化社会大生产中由自在走向自为与自觉。

对当代知识分子，邓小平主张首先解决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的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经受了长期的锻炼和考验；而且新中国培养的大批知识分子都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邓小平说，这个结论是“实践做的”、“群众做的”，应当在全党倡导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坚持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他说他愿意做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

毛泽东曾十分贴切地阐明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思想。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人的主观思想的好坏、主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实践活动的好坏或成败。邓小平十分关注改革开放条件下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或负面效应，他多次要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把培养“四有”新人和教育要“三个面向”作为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因素，正是基于新形势下对主体素质的迫切要求和回应迅速发展的时代与实践的需要。

前文指出过，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中存在现代化民间力量薄弱的问题，这表明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中主体本身的现代化既是迫切的、也是可能的。邓小平一再强调“人的现代化”，其良苦用心就在于，告诫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改变在既往环境中形成的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某些特性，提高人的整体素质和实践能力，塑造现代人的品格与价值。

人的现代化是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它有许多共同性的具体规定。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们在经过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的

考察之后，提出现代人的标准的具体规定：为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献身的精神；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以非传统的行为方式去生活、创造；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和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计划性强；注重对事实的考察和尽可能多地去获得知识；可依赖性和信赖感；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了解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才能与创造。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则指出了塑造现代人格的几条途径：通过现代化实践活动提高人的能力。每个人都汇入现代化潮流中，承担着一个人的责任。现代化实践亦给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才能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把握时代的脉搏，才可以丰富和超越现实的自我，在改造现实、创造财富的同时，确证和增强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建设精神文明引导人的境界的提升。为了使人的素质提高到现代化所要求的程度，除了实践活动的途径外，还要靠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前者形成新的理想信念、思维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使得实践行动有目标性和方向性，并注以意志力；后者则是具体能力和品格的创造性培养与发挥。

#### 4. 发展动力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动力在于改革与开放。“我们把改革当

作一种革命” ， “ 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 ， “ 不开放不行” ， “ 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

改革从总体上看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决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改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它是一场涉及面很广的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如果不彻底、不深入、不大胆，触及不到旧体制的痼疾，将不可能有现代化进程的跃进；但如果迷失了方向、失去理性、遭致社会动荡又会葬送现代化事业。因此，邓小平提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与对内改革相联系的，是对外开放问题。它也是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开放可以使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取长补短，互助互利，从而共同发展，也可以增强本国对外交往中的承受能力。即使存在别国歧视、掠夺和转嫁危机的潜在可能，也可以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开放和自己的发展把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点。所以邓小平说，开放、交往应是全方位的。“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如搞技术合作、技术改造、合资经营等；“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吸收这些国家的“特点和长处”。同时开放与交往又是双向的，不但是打开大门让人进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9页，人民出版社，1993。

来，自己还得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另外，开放、交往又应是多层次的，不但要同各国进行经济交往、科学技术交往、文化交往，而且还要进行政治交往、精神交往。总之要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为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获取一种外界因素的推动力。

## 5. 发展战略

这里涉及一个更具操作性质的问题。它既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内容，也是在对前面所论述的发展目标、阶段、主体、动力诸方面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所实施的过程。邓小平详尽地设计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三部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后发展国家所具有的意义。故我们用较多的篇幅论述这一问题。

应该说，从建国起我国就比较重视制定发展战略，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再加上指导思想上的—度迷失，反复更改的发展战略过去不曾达到科学的程度，也就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切实落实。比较一下这些不尽相同的战略类型是饶有意味的。1953年我国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制定发展战略的开始，显示了党和人民进行建设的决心，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是一个很把握不准的概念，而就目标说，“一化三改”中“三改”到1956年已完成，而这时距制定这一目标的1953年不过三年。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应该说比总路线在时间概念上稍微具体化了些，但就目标而言仍是很抽象的，特别是“高度”、“文明程度”、“伟大”这些字眼。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初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之后不久毛泽东又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

时间打基础，然后再用七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到200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阶段实现战略目标，这是制定发展战略中迈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一步。但在1957年后党的指导思想上日益陷入“左”的错误，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上不顾客观条件急躁冒进，1958年“大跃进”时期提出用“十五年时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召，结果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损失。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但之后不久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设想成为泡影。到1975年四届人大重提分两步实现现代化的设想，即第一步80年代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显然这里对第二步目标实现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

邓小平认为，认真研究国情，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确定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因此针对过去经济工作中“左”的路线造成结构比例失调、效益水平低下的状况，他在新时期之初就指出：现在中心任务是调整，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结束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这种冷静而清醒的对中国国情的再认识，使党中央意识到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诚如陈云所说：一方面我们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个矛盾。邓小平在1979年8月讨论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时明确提出：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同年12月6日他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提出了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蓝图”的新构思：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现代化的“小康”状态，在此之前先解决“温饱”问题。当时我国人均生产总值只有二百几十美元，邓



小平据此推算说，如果“小康”水平指一千美元，那么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增加三倍”。邓小平第一次用统计指标量化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增加三倍”就是以后“翻两番”指标的最初提法。我们看到，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是审慎的、经过多方深思的结果，而绝非随机性地脱口而出。这一“降低”了的战略目标的制定才标志着我们的的发展战略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相一致的，其中“温饱”目标的实现与农村改革的进程一致，而“小康”目标的实现无疑与我国经济的全面改革推进同步。

“小康”只是现代化的较低目标，而要真正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和奋斗。那么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目标应该是怎样的呢？这绝不能凭主观想象，而要依赖经济发展的实践对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可行性的检验。只有实践证明前两步目标确立的速度是正确的，才有可能科学地预见更长远的发展目标。邓小平密切关注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按照六五计划规定的目标，1981年—1985年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5%，但实际年增长率为1982年8.7%、1983年10.2%、1984年14.2%，大大突破了预定目标。这些统计数字使邓小平对实现在本世纪内既定发展目标的信心更加坚定，这些很枯燥的数据在他眼里展现了夺目的前景，他多次提及，欣喜地说，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这个话过去是不能讲的，只是讲翻两番可能实现，但是要花很大力气，经过4年时间的实践证明我们制定的发展战略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这时邓小平认为，提出21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条件已基本成熟。1984年4月18日在会见外宾时他说：同我们的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达到小康以后，我们还要在下世纪30年—50年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样邓小平就把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时间由在本世纪末延伸到下世纪中叶，并把战略目标定在接近发达国

家的水平上。1987年4月16日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他表述得更具体、更完整：本世纪末我们想达到800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更重要的是有这个基础，再过50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那时中国1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60000亿美元，就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了。这次提出“人均4000美元”和“国民生产总值60000亿美元”的量化目标，发达程度定位在“中等发达国家”上。他胸有成竹地说：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这就是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所设计的战略三部曲。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发展战略是保证社会沿着健康轨道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但制定出合理而适中的发展战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既不能太玄虚与宏观，否则缺乏实现的现实根基，但也不能太短视与具体，否则不具有长远的指导价值，关键在于把握这两个极端点间的“度”。而对“度”作出权衡与评判的，只能是实践。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的功绩在于，倾听实践的呼声，总结经验教训，使战略目标的设定由模糊到明确、由质的估价到量的统计、由一次性规定到分阶段落实、由单一目标到综合指数，从而实现了质的飞跃，使这种战略既合乎实际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它的启迪意义就在于，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必须在“敢于实践”的同时接受实践的检视，逐步提出战略构思，之后又要通过实践来证实。因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项探索性的实践，就探索性发展战略而言，谈不上完全把握规律，也不可能预先有完整的政策示范与模式预知，更不能遵循旧规，惟一可行的是置身于实践之中，让实践来提出问题、酝酿构想，并随时对之进行检视与修正。实践是解开“玄妙”的战略之谜的钥匙。

至此我们看到，邓小平由发展目标—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

发展阶段—科学的国情认识、发展主体—现代人格的塑造、发展动力—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到发展战略—接受实践检视的构想及其实施，较为完整地设计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就这种设计的普遍价值而言，我们可以说，邓小平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设计师！

## 第六章 传承与拓展

### ——邓小平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之关系分析

从本章起，我们将用两章的篇幅，将邓小平的发展观置于世界发展理论的总体图景中，辨析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形态的理论渊源及其与西方形形色色的发展思想之间的关系，借以凸现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从认识史的角度看，都是对以往思想理论的继承，又是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而作出的发展，是认识的继承和发展的结合，或者说是认识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也应作如是观。在这一场由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接力赛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代表着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他们传承着具有共同的内在逻辑与基本思路的接力棒，并结合时代变迁把发展理论都推进到新的水准。特别是对后继者而言，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前人所创立的伟大理论。因此，邓小平的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当代形态，是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思想的继承、拓展与深化。其中既有贯彻始终、体现出共同精神实质的哲学基础；也有由马克思晚年提出设想，经过列宁、毛泽东的曲折探索，直到邓小平这里才得到较为圆满解答的跨世纪难题；既包含着对原有的传统观念的纠正、修错、反拨与廓清；也提供了渗透在一系列具体决策之中的有关“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篇颇为踌躇的大文章方

面所作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答卷。

## 一、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历程的哲学精神

众所周知，在表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上迄今仍存在不同观点间的争论。在我看来，判断一种理论的称谓是否准确，至少应当遵循两条标准：一是看这一称谓能否诠释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二是这一称谓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理论蕴含的时代精神。鉴于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的理解上的分歧，各以其所倚重的著作为依据，那么把握这一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使其间每一部著作都复归为历史的一个环节就显得极为重要。在这里由于题旨所限无法详尽地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我只想指出这样的事实：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实践的唯物主义”是构成其思想发展的共同的基本精神，从而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共同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和精确表述者，1845年他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6年夏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其有关“新唯物主义”是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鲜明表述和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崭新概念与理论建构，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成熟与正式问世；在此之前，从1842年在《莱茵报》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开始到1844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从人性和异化的角度来批判旧世界，在抽象的意义上提出劳动实践观，这是其“新唯物主义”产生的前夜；在此之后，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无论是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经验的总结，还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实际写作与出版，以及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直到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都是马克思上述思想的延展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普适性的检验。

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正式问世的路标，根据在于，从内容上看，两文克服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前期作品在实践观上的抽象性，揭示了生产实践在现实世界中的基础地位，展开了社会实践的具体结构，论证了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性，说明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确立了以实践论为基础与核心的社会历史观。从经典作家的自况看，恩格斯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实际上它不仅仅是“天才萌芽”，而且是“天才纲领”。恩格斯还称《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现形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1条，条条以实践论为中心展开，从批判的视角看，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针对的是全部旧哲学，指出其共同症结在于都不了解社会实践的本质，不从“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出发看待世界，因而也就不可能说明人的生活的“世俗基础”，进而解释清楚历史的真正发展。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与旧哲学对立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世界观的对象是“事物、现实、感性”即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感性世界，要把这一世界当作“实践”去理解，既要承认客体对于主体的独立自在方面（这一意义上它不是要完全抛弃旧唯物主义的合理“前提”），又必须看到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创造方面（这一意义上它看到了唯心主义的局部价值和意义），任何

人类认识之谜与历史发展之谜只有放在“实践”这个准衡器上才能得到诠释，因而新旧唯物主义也就具有大不相同的功能特点。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展开与详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世界不同于抽象的物质世界，而是“以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为基础的“整个现存感性世界”，“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在历史观形态方面它还大大拓展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基本点，建构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里还有一点尚需甄别清楚，有人虽然承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表述，但认为此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就很难说再坚持这一观点了，原因是其著作中不再出现这一概念。对此我想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在马克思晚年所写的《评阿·瓦格纳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一文中指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然后才有理论的关系，“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段话不是对直观唯物主义又一次批评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再度宣示吗？

对于列宁，人们往往讳言他对“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且在研究中看重的是他的完整成型的著作诸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之类。其实，即使是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鉴于当时革命实际需要而不得不全力维护“下半截”的唯物主义的著作中，列宁也表达了对马克思观点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404—405页，人民出版社，1963。

认同态度，他指出：“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把实践……作为唯物主义……的基础。”他举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对经验哲学的批判、恩格斯对康德、休谟不可知论和其他哲学怪论的批判为例，说明只有实践是“最有力的驳斥”。而在作为零散材料摘录和读书札记的《哲学笔记》中列宁就更超出认识论范畴谈实践，不仅指出“人和人类的实践是认识的客观性验证、准绳”，更提出在“实践意义”上“把握、抓住、通晓”“自为存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

关于毛泽东哲学我们可以从《矛盾论》中找到这样的论述：共产党人也讲宇宙观，讲宇宙的物质统一性和运动过程，但是我们承担的历史责任是认识和改造现存世界，主要是中国这个现实世界；我们的哲学武器的功能，是要使中国这个现有世界革命化，因此我们的世界观乃是对于中国人民生活其间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世界的根本观点的总和。在《实践论》中他又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身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这里的世界完全是一个现实世界，而不是无人的原始自然和抽象的物质世界，反映这一现实世界的真实面貌的哲学世界观就必须深入阐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特别是说明“主体能动性”与“客体制约性”的关系。更能说明问题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7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93。



的是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演出”与“舞台”的关系，演出者是主体，演出是主体的实践活动，是自觉能动性的高扬过程；“舞台”是演出的客观条件系统：“舞台说”是实践论的客观论，正是实践论的唯物主义。

由是观之，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毛泽东，科学的实践观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构成其哲学思想共同的基本精神，因而也必然是其发展思想共同的哲学基础，是其思想与实践得以前后传承与发展的内在根源。

时序推进到当代，如何把握这一哲学精髓、并结合变化了的社会实践创造性地作出发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大课题。邓小平正是接过科学的实践观这根接力棒，将“实践的唯物主义”内化于他的发展思想之中，使其发展观既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思想一脉相承，又有创造性的发展，是当代中国交出的一份出色的答卷。

### 1. 恢复与确立实践检验的“惟一性”与“权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质朴原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被突出地强调出来，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对它的强烈需要所致。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清算长期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左”的严重错误，同时又要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维护他的一切正确的东西；必须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路线，扭转按“两个凡是”办事的一整套错误主张；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社会主义模式，开辟一条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崭新道路。那

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页；第二卷，第478页，人民出版社1993。

么，我们的理论武器是什么呢？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强调，实践标准不但必须用之于对理论的检验，而且必须用之于对政策的检验。他几次重申毛泽东1948年讲过的一段话：“政策是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在他看来，实践检验的完整表述应当是两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在说，只有第一句话还不能完全概括实践检验的意义，因为“真理”是理论的规定性而不是政策的规定性，还必须有第二句话。如果再加以概括，那应准确地表述为“实践是检验认识之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由于政策是社会历史实践的观念，这就进一步告诉人们：实践标准不仅是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是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从而也就是社会发展观的基本原理。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为什么具有前进上升性，为什么指导思想错误的实践或早或迟要被纠正，就依赖于实践检验的力量。因此，实践检验不仅在于分清是非正误，而且包含了纠正错误的实现机制。这正好体现了现代控制论所说的“反馈”原则。任何一个社会集团如果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修正，那么它将要无情地被实践检验的力量所抛弃。人类历史总是进步战胜反动、善良征服邪恶，也是基于实践检验的力量。

## 2. 合目的与合规律相统一的客观效用论

对于现代化建设活动来说，要提高预见性与科学性，必须努力寻找实践指导规律。邓小平的发展观十分强调自觉选择和效用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93。

导向。对于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分配方式、企业运行机制、发展速度和经济增长方式，所有这些实践活动都面临各种可能性，都必须作出选择。通过权衡，进行比较，反复论证，抉择方案，是最可靠的决策方法。实践活动以实践观念的建立为先导；建立实践观念的决策要从多种方案中选择；选择是实践的题中应有之意。邓小平是一个自觉的选择论者。他在60年代初期说过：“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 1985年10月在回答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提出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何者占优势的问题时，他说：“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上述两条谈选择的论断，又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效用导向的。在各种可选择的方案中，以是否更好地实现这个效用为准则的。可见，邓小平的效用论是合目的与合规律相统一的客观效用论，在这里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界限。邓小平的哲学还强调客观出发点。在“物质一元论”看来，客观性是人及其意识外的外部世界的规定性，它从未提出这样的问题：人自身是否也有客观性？在科学实践论看来，人作为主体也具有客观性。人的需要、人的主体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作为实践的产物，也有客观性，二者统一，才是我们所面对的客观实际。邓小平于1992年在南方的谈话中分析我国的发展速度问题时，就是从需要和可能的统一中寻找答案的。因此，正确的逻辑结论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实践的本质是实现合目的、合规律的客观效用，客观效用是实践的出发点、归宿和检验实践成败的标准。无论在认识论上和历史观上，都必须把握住“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个原理。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93。

### 3. 实践指导下的社会运动规律的“定型化”

实践检验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恢复了或重新确立了判断是非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分辨着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实践史上的是非曲直，扭转了中国发展的方向，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的历史起点。邓小平十分明确，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正在创造社会主义新制度和新体制。目前能够确定的前提有四：一是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作为实践的价值导向；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为目标模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三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对政治体制实行有序的改革；四是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在这四个方面，经过具体实践，逐步创造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和新体制。这里仍然必须坚持实践检验。邓小平说：“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所谓“定型”，从哲学上说就是：实践指导规律经过检验从主观形态到达客观形态；制度创新经过不断检验和调整从生长形态达到成熟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萌生形态达到成熟形态。到这时，我们才可以宣告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以客观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和规范的依据。这些，是社会历史规律的发生论的大问题，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

实践将是对于这种发生论的确证。

不难看出，“实践的唯物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着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风雨历程，它不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而且标志着这一哲学体系的理论硬核和基本精神。世事沧桑，风云变幻，不变的是这一精髓。

## 二、“跨越”与“不可跨越”：一道难题的求解

19世纪70年代末期，马克思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前景时，接触到一个前所未遇的新课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马克思以一个革命家的创新精神和学者的求实态度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为中心的一系列具体构想。之后，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标志着“跨越”构想的实现，然而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跨越”之中还有“不可逾越”之处，政治上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转型，特别是社会的经济水平、人们的文化素质等不可能企盼一夜之间跨越一个阶段，得以彻底改观。列宁对此作了反思，也曾提出过“补课”等设想，但总体上说，没有提供出完满而系统的答卷，有时还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对经济、文化领域的“不可逾越”的认识，更存在严重的偏差。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再次证明了“跨越”理论的正确；他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使我国迅速摆脱落后的问题上也做过探索，但这种探索充满了曲折、磨难，没有找到一条完全有效的道路。邓小平正是在前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基础上，面对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经济文化却相当落后的现实，举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系统地提出和成功地论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并在新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发展和超过了前驱的设想，为经济

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艰深课题划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从马克思晚年的设想，到列宁在实现这一设想后又遭逢新的难题，再经过斯大林、毛泽东不同程度的探索，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对同一课题的求解，反映了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时并进的活力与水准。

### 1. 马克思晚年的设想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是一尊不朽的丰碑。它以严密的逻辑和翔实的史料证明，由于有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摆脱了假说形态，真正由空想变为科学。但是，同时必须承认，作为无产阶级运动之理论表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恩格斯的论述，无不以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他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特征也无不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对它的否定为前提。

但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来说，恰恰缺少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在广大的东方世界不仅经济落后，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很低，而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本身也很幼稚和孱弱，远未成为能够问鼎统治权力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与西欧完全不同的特殊国情，已经远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背景和初衷，它没有回答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的晚年集中思考了这一问题。

马克思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俄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构想中。与西欧相比，俄国是一个庞大而又落后的东方帝国，也是世界上惟一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村社和土地公有制的国家。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1877年爆发的俄土战争使国内外各种社会冲突

空前激化。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设想如果俄国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那么它的发展应当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这种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独辟蹊径，突破了主要以西方国家为背景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想图式，开始尝试解决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认为，俄国等东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基本原因在于存在着村社土地公有制，而这种公有制又恰恰存在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但这种村社公有制毕竟是从原始农业公社遗留下来的东西，它在现成形式上，决不等同于共产主义所有制。为了将俄国的村社土地公有制提高到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水平，还需要有一系列具体条件：其一，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当在社会制度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同时，必须在生产上吸取同时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以充实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其二，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帮助公社复兴。特别是在俄国公社面临巨大的灾难，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受到日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明显威胁时，“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其三，必须有俄国的内部革命。“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否则就只能听凭它无可挽救地死亡下去。其四，必须有欧洲革命的引发和支持。光指望俄国内部条件，革命难以发生，而没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将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把希望寄托于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引发和推动。

马克思晚年的探索是一个没有最终完成的巨大工程。虽然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人民出版社，19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62。

历史实践看，马克思的设想在细节上未完全实现，公社土地公有制也未起到预期的作用，但这个设想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世界革命重心确实东移，40年后确实在俄国打开了世界革命的缺口。

## 2. 列宁：思想家与革命家的分野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现实。然而，这种转变也使十月革命的缔造者列宁再次遭逢到那个大问题——在俄国这样一个东方落后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不再需要资本主义的东西？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这一问题，40年后仍无现成的答案，“有如一座没有道路、车辆、地图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列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沿着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的轨迹，结合俄国的具体实际进行了新的探索。

列宁的探索在实践中几经曲折。

在十月革命前写就的《远方来信》、《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等论著中，列宁根据对俄国国情的分析，开始认识到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落后的俄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这决定了俄国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并不能使整个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必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在政治上把“民主共和国”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中介，在经济上把在“民主共和国”领导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或一些步骤”。十月革命后在《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列宁进一步深化了上述看法，认为，在一个人人识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与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相同的。为此，他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其迂回走向社会主义的“中



间环节”，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因为它“经济上无比地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

但是这时列宁的心情又常常处于矛盾之中，难免有犹豫、徘徊：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正确地认识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落后的俄国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作为一个革命家，他又希望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落后的俄国能尽快、直接地步入社会主义。在1917年12月25日—28日亲自拟定的《关于消费法令公社的草案》和1918年3月拟定的《俄共七大党章草案》中，他自相矛盾地又设想俄国在小生产大量存在的情况下，采用产品分配代替贸易等措施，取消商品和货币，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从1918年到1920年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更强化了上述自相矛盾中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面。

时至今日，从历史的眼光看，“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既有有利于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正确的一面，也存在着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就后者言，它主要是过低估计了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先天不足的困难，没有把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科学地区分开来，错以为只要对所有制关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可以在落后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正是在反思“战时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从1921年春天起，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作出了新的历史选择——实行“新经济政策”，放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重新回到曲折迂回的道路上去，强调在最近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由宗法制度、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在其生命的黄昏，1923年1月

《列宁选集》第3卷，第556页，人民出版社，1995。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4页，人民出版社，1995。

至3月初，列宁口授了被后人称之为“政治遗嘱”的最后五篇论文和一组信件，这是他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最后思考。其要旨是：在经济上必须实行“社会主义重心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在政治和文化上必须实行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革命和改革，建立和发展新型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

### 3.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应当肯定，列宁对非西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极为深刻的。但在1924年列宁辞世之后，苏维埃政权在斯大林领导下，逐渐抛开了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所提出的“退却”路线，忽略了列宁“政治遗嘱”中的有关非西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重要思想，提出了“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在生产关系领域内进行旨在消灭私有制和建立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斗争，逐渐形成了著名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公允地看，这一模式也有自己的历史必然性与部分合理性（我们在第四章曾有论述），但它忽视生产力这一历史发展中最革命、最活跃、最积极的决定性因素的致命弱点，随着时间的延续愈益明显，种种措施的实施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转变为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以及建设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 4. 毛泽东的探索

从宏观的历史视角看，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是他追求、探索社会主义的一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可以视为他追求社会主义而必须经历的一个前期准备阶段的探索期；新中国建立后的7年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探索期；1956年八大前后

1年半左右，是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的全方位富有成效的探索期；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曲折发展期；而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10年，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场“大试验”，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陷入“误区”的时期。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创立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和转变中介的新民主主义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理论两个方面。前者开辟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后者提出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创立了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论，在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异常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了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批评了那种迷信社会主义没有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的诸多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行机制，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有的具有科学理论的意义，在实践中发挥了或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有的虽然在实践中没有坚持贯彻或在实践中发生过偏差，但其理论的正确性是无疑义的；有一些思想观点虽然还不准确、不明晰、不完备，甚至还掺杂有错误，但其基本思路中的某些理论价值还是应当肯定的；也有的思想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再具有实践意义，但曾经起过的有益的作用不应当抹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存在失误，这特别体现在他晚年的思想和实践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理论失误，主要有两

个方面：一是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急于求成和求“纯”，有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空想论”倾向。质言之，他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没有正确认识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实际，因而也就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方法。他从几个方面较为深刻地触及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对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却缺乏相当的认识。

### 5. 邓小平：较为完满的答卷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几经曲折、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然而在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已跳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选择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邓小平开始了他卓有成效的思考和探索。首先，既然中国人民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就断无重蹈资本主义覆辙之理；其次，虽然我们可以跳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初步的，不成熟的；再者，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作为外部条件与我们共同存在，所以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为我所用，仍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必然选择。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源自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和现状的深刻分析。我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工业化程度极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基本上属于半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中国虽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绝不可以越过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阶段而建立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要求它在各个方面都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它所赖以建立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是非常薄弱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时期以后，必须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去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以奠定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巩固和它继续前进的物质技术基础。

邓小平还特别注意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在许多国家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这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是以巨大的历史痛苦为代价的。这种代价不仅主要表现为农民被强制掠夺，并在转入工人阶级队伍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处于极度贫困状况，而且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社会化、现代化，既可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又可以尽量避免这些历史的痛苦。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总之，在邓小平看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惟一的途径就是靠发展生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具体一点说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设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这样，马克思晚年提出设想，在列宁、毛泽东那里变为现实

却又遇到了新课题之后，邓小平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跨越”与“不可跨越”的矛盾，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大胆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空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科学社会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 三、发展问题的当代推进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容和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性。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既一以贯之，同时又有创新和发展。邓小平在当代实践基础上对“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重新阐释、对社会主义作为实现现代化新型方式的探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整体设计，这些都超过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前面几章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论。在此我们另外就其发展思想的开放性、包容性、超前性、预见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再做一些补充。

#### 1.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的开放性、包容性

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史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没有处理得很好的问题。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社会主义作为多环链条中的一环，得到的只是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论证。虽然在他的设想中，俄国等一些东方国家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如何坚持与巩固下去，他却并没有给予解答。列宁晚年提出过利用资本主义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但也只是设想，没有系统阐发，更未认真实施。斯大

林则迫于当时的形势，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中思维，夸大了二者的不相容性。毛泽东建国初期提出的“两个阵营”，也是着眼于两种体制的对抗与斗争，晚年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有了一些变化，但也是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而主张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搞“统一战线”。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从新的历史视角，大胆提出只有改变姓“社”姓“资”的传统思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能向纵深发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主张用历史的、具体分析的态度来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首先，邓小平认为，必须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他在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强调：“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并不是漆黑一团、一无是处的社会制度，与以前的社会形态比较起来，它是更进步的，因而也是更具生命力的，不应该用非历史的态度去看待资本主义。

其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要向前发展，要显示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的优越性，就一定要学习并继承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的文化成果。他说：“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1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93。

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显然，那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不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而获得成功的想法，不仅是荒谬的，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是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成果——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否认了社会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继承作用，也是否认了社会主义本身。

还有，邓小平认为，即使在考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也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不能把那些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第二，不能把那些本身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既可以为“资”所用，又可以为“社”所用的东西（如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经验等），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第三，有些东西确实姓“资”，但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为“社”所用（如国外资本），也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归根到底，不应该拿着姓“社”姓“资”的帽子到处乱套，这样非但于事无补，而且会使改革开放寸步难行。

当然，邓小平同样郑重地提出，改变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从“拒斥资本主义”到“利用资本主义”，不意味着认同资本主义的一切。在此问题上我们不能走极端，历史发展的趋势仍然是社会主义必须代替资本主义、否定资本主义。今天利用资本主义正是为了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2. 邓小平发展理论的超前性、科学的预见性

这里我不拟再从学理上论证，主要想撷取“典型”说话，从



具体事例谈起。

系统地翻阅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材料，梳理他这一时期思想发展脉络，我惊喜地发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世纪之交，“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而引起整个社会的普通关注，并正下大力气着重解决之际，早在20年前，它已是邓小平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词汇，如“分流”、“考核”、“定额”、“编外”、“培训”、“减员增效”等等已出现在他的谈话、批示当中。在当时他就十分准确地看出国有企业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隐藏的困境，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的原则和总体思路，还具体地涉及到改革的措施与步骤，充分显示了在这一问题上所具有的前瞻性。如果我们联想到，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氛围远比当初复杂，解决起来更为困难，那么邓小平的这些前瞻性思考与论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意义，现在看来，就更具有现实价值。

如果说，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是在改革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来的，那么在改革之前它们就隐性地存在着；正是在这种隐而不显、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情况下，邓小平就敏锐地注意到了。早在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时，就提出了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主要是管理制度）。1978年、1979年，那是一个由他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年代，而他本人便是这一思想原则的忠实体现者。无论是在国内视察途中还是会见外宾的时候，他总是“处处点火”，不避锋芒，发表长篇谈话，淋漓尽致地陈述自己的看法。他历数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指出，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第一，“管理问题需要着重解决”；第二，“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核”；第三，就质量与效率看，突出的问题是“品种、质量太差，规格不合国际上的要求”，“效率很低”；第四，领导班子“思想僵化，条条

框框太多”。而国有企业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最终要“表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从当时的情形看，我们的工业企业确实已经“陷入困境”。

须指出，阅读邓小平的这些谈话记录，我们每每为他清晰的思路、饱满的激情所打动；即使是对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场合重复谈论，他在角度、语气、着重点上也表现出不同。因此以下我们便不再条分缕析地概括，只想集中再现其原貌。

1978年3月28日，在同胡乔木、邓力群就起草《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进行谈话时，邓小平就提出：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管理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不懂得管理。什么事情要发展，首先想到的就是增加人。搞管理，应当是什么事情都要有定额，都要有责任制，都要考核，可是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讲究，实际上是没人管。

同年9月中旬，邓小平在出访朝鲜回国后，一路视察东三省和天津市，沿途发表重要讲话。现在好多论著都强调这些谈话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诚然是错的。但就谈话的内容而言，绝大多数涉及到工业企业存在的问题，表明了邓小平对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和天津市的高度重视和对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的警觉。

9月15日，在听取黑龙江省委常委汇报时，他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严重。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他还特别举例说，大庆要进口一件什么设备，本来经过党委就可以解决，就是转圈子定不下来，拖了一年。因此，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第二天，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和汇报时他又提出，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心消化。企业管理还是过去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

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那个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你看一个厂子几年没有变化，那里的管理人员肯定不好。比如在外国资本家用管理人员，聘请经理，管理他的工厂。你搞一两年的时候，资本家的利润没有显著增加，他都要淘汰你。我们是铁饭碗，一年、两年他那个厂、那个企业没变化，亏损照样亏损。那就关了这个厂子嘛，照发工资、办成学校，也比造出产品积压好的多嘛！积压是最大的浪费嘛。黑龙江省的烟厂，生产的香烟太差，一角钱一包，卖不出去，积压很多，生产他干什么？关了嘛！你们讲轻工业发展不上去。为什么发展不上去，你的产品质量太差，为什么都要上海牙膏？产品质量不好，还强迫人家买，这怎么行，这是害自己。花了原材料，人民还很不满意。

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谈到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还指出，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说法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了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

三中全会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拨乱反正和过去积累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相当繁重，但邓小平始终关注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他不仅在专业会议上讲，在其他会议及重要场合都念念不忘。1979年1月18日—4月3日召开了党的理论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篇重在重申“坚持四项基础原则”的讲话中谈及“形势和任务”时，他提醒大家必须注意到：“我们存在着的困难，而且有些困难是比较严重的。不看到

这一点，也会犯大错误”，他还特别提到工业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有些企业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等问题。

7月下旬到8月中旬，邓小平先后视察上海、安徽、山东和天津等地，沿途又发表重要谈话，触及到国有企业中存在的症结。比如7月21日，在接见上海市委常委时，他指出，我们对工人的福利照顾得不够，外国资本家对工人的权利照顾得非常周到，工人是他们的生命。他说，什么是党性好？把工厂办好就是党性好。8月9日在听取天津市委汇报时说：产品质量不好，宁肯少生产，甚至可以停产整顿。质量不好，这是最大的浪费，产量增长有什么用？把风气搞坏了，把工作搞坏了，现在一建公司就是行政机构，设好多处科，安排好多人，还是原样子，搞那个干什么！谈到干部问题时他说，我们是“万金油”干部多，万金油能治百病，又百病不能治。干部搞万金油不行，都管都不管。还谈到企业资金不足往往靠国家分配，明确地说：“搞国家投资，那是懒办法”！

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国有企业存在的这些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将会产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极为不利。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他严正地指出，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中国人民确实好，房子少，几代人住一个房子究竟能忍耐多久？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应该说，邓小平的上述思考与论述切中肯綮地触及到国有企

业所存在根本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今天看来还有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如果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四人帮”粉碎不过两年，“两个凡是派”仍在坚持“左”的路线，拨乱反正任务亟待进行，那么邓小平的这些看法无疑就十分超前了。

### 3. 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实践性、可操作性

我们仍以邓小平1978年、1979年、1980年三年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为例，来分析。

看到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并不意味着丧失信心；相反，“承认落后，才有希望”，“劲可鼓不可泄”。正是基于此，邓小平并不仅仅停留在对问题的揭露上，同时也创造性提出一整套改革的设想。这些设想，既包括宏观的原则与思路，也辅以具体的措施和步骤。

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工业企业之所以搞不好，除了林彪“四人帮”的蓄意破坏，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不懂得“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个工厂如何发展生产，增加什么品种，怎样提高质量，如何改革经营管理方法，找到市场，如何解决职工的困难，这些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具体地结合实际才能解决。为此，他反复讲，“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过去我们不懂得这一点，而事实证明这才是“科学的语言”。

1978年9月17日，在听取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讲到鞍钢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鞍钢”，如引进技术、自动化，用多少人，怎样管理，管理人员应该多少？鞍山市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也可以是一个，但不要妨碍它用经济规律来管理鞍钢。他还说，中心问题是这个问题，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9月18日在听取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时，他又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

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他还强调，企业改革，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9月20日，在天津他再次要求不要搞老企业的管理，要按经济规律管理企业。10月10日，在会见西德新闻代表团时他说：经济管理制度要改，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方面我们要吸收你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在1979年10月初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做了更明确的阐释。在4日的讲话中，他指出，劲可鼓不可泄。我们需要的是鼓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

如果说，“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只是企业改革的一个总原则，那么，在邓小平看来，还“要有一套科学的方式”与之相配套。概括地看，就是这样一些思路：

（1）改善党对企业的领导。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搞得怎么样，劳动生产提高了没有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他要求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认为，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了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要变成了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2）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权力。1978年9月18日，他在听取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说，要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企业要有主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企业没有自己的权力和机动性不行。企业应

该有点外汇，自己可以订货，可以同国外交流技术。有些事情，办起来老是转圈，要经过省、部、国家计委，就太慢了。10月11日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他指出，我们企业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在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要求扩大企业管理人员的权限，说责任到人就是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3）以先进的管理方式管理企业，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邓小平盛赞国务院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写得好。说明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工人八级工资制，最高一百零几块，出什么资产阶级？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数量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干的好的、干的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奖金制度也要恢复。

在几次会议上邓小平都指出，管理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方式与经验。他说，在美国，丁肇中、杨振宁他们搞科学研究，如果研究员两年不出成果，就得自动淘汰。在外国资本家享福，他用管理人员，聘请经理，管理他的工厂。比如生产汽车，每年都要有新的型号，或者改改外形，有的产品换换包装，就可以创造不少利润，同样产品，包装不同，可以加价，你搞一两年的时候，资本家的利润没有显著增加，他都要淘汰你。我们是铁饭碗。这样的问题，在干部里要多讲，有的是能够搞，可以搞，过去不敢搞，现在要敢，要“敢”字当头，敢于闯。过去不算了，今后这样的精神贯彻下

去后，一两年他那个厂、那个企业没变化，亏损照样亏损，这种人不能用。在会见西德新闻记者代表时，他说，我们的谷牧副总理看了你们年产五千万吨的煤矿，完全是自动化的，只有九百人。如你们帮助我们搞一个煤矿，我们就照你们的办法办，并且以此作为样板来改造我们搞得不好的企业，非走这个道路不行。至于南斯拉夫的自治办法，可供我们参考，有些经验是好的。但中国有自己的经验、传统。它（南斯拉夫）的东西同你们也不同。只有通过自己学习来确定自己的方式。

（4）“企业生产要根据市场的需要”，面向国内、国际市场。1979年8月9日在听取天津市委党委汇报时，邓小平着重谈到这一问题，要求各企业要有科研机构，掌握市场情报，创造新品种。要靠定货，不要靠分配，那个好要那个，不好的就淘汰。过去靠分配，好坏一个样，以后改成生产订货，订合同，生产要根据市场的需要，不然还是调动不了积极性。他还谈到市场调节问题，要求天津的市场要面向全国，而不是光面向全市，要打开销路，可以发广告，全国定货。10月8日，他在一次会议上又讲，经营非常重要，要拼命找市场推销，或者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国际市场。外贸不只是算算出口多少，进口多少，它要负责查清，全面地了解国际上需要什么品种、什么规格、什么质量、什么数量的货物。

面向市场，为企业摆脱困境寻求出路，是邓小平当时一个创造性地设想。应该说，在当时这还不能为全社会所接受，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市场”总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11月26日，在会见林达光时，邓小平明确地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总之，在“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的原则下，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深层问题与矛盾所展开的这些宏观思考，体现了邓小平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当时他已经异常紧迫的感到国有企业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只在于改革，而且是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革命。1978年10月10日他对工会九大祝词初稿作了两处自称“比较重要的改动”，即在“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之后增补了“进行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而在谈到企业领导体制的转换时，他又指出：“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现在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的组织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增加利润，同时不断地改善职工生活，从而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邓小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并不停留在宏观的战略原则与总体思路上，对与之配套的微观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与步骤也有重要论述。将宏观决策与微观实践结合起来，既不使前者陷于空论，又不使后者失去方向，是务实的邓小平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

他当时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措施包括：

(1) 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采取多种方式与渠道筹措资金。在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时，邓小平了解到，海外华侨巨商多次表示想回国投资，但国内不敢接受。回国后在几个场合他都说，这真是太蠢了！利用外资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1979年10月4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他赞同陈云的分析，说，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

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引进一个项目，可以带动一些行业的发展。引进的技术我们掌握了，就能够用到其他方面。

（2）“把财政制度改为银行制度，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更新技术的杠杆”。在1979年10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银行本来是要生利的，可是我们现在的银行只是算账，当会计，并没有真正起银行的作用。比如一个企业，大量是轻纺工业，应该从银行借支，银行收利息嘛。垄断资本的银行也是很灵活的，也不是固定的利息，有高有低。不要用财政拨款的办法，而用银行贷款的办法，收利息。从法律上讲，你不偿付，要赔款的。要有经济法律嘛。比如这个厂，只需要十万，那个企业只需要一千、两千、万把块钱，银行很好解决贷款。凡是这些小项目，小款项，年把就收回。如果我们搞得很活，我们的银行要扩大。建设银行一定要搞起来。不用拨款，用银行起杠杆作用。还说，银行要直接开辟门路，直接去办。既然叫建设银行，就不是只坐在那里收发、算账，要开门路，要做生意。搞建设银行，给企业自主权级一个活动余地。短期贷款，小项目的贷款，技术革新贷款，一下就解决了。

（3）经济立法，企业立法。邓小平说，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这里的法还不仅仅是指一些宏观的宪法体系和政策制度，而是具体的行业性法律、法令、条例。就经济发展来说，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他提出像投资法、税收法、公司法等等必须认真研究，参照世界上的法律来制定我们自己的法律。法要立得很多，譬如滥用国家资金、财产，这样的问题都应该有法律或者政策规定；还有象引进技术、自动化、怎样管理，都必须有法可依；与国外发展经济贸易，引进项目、支付能力与条件等都不能人为地进引，靠领导点头，要有一套规章制度，按法律办事。

（4）调剂编制，裁减冗员。邓小平认为，现在企业的一个突

出问题是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在这种情况下，“总的是要减”。他说，鞍钢二十四万职工，将来整顿好了后，充其量有六万人就够了。他还举北京附近一个养鸡场的例子，用了二百多人，中央领导点名批评了一下，减到二十几个人，比原来人多好办了。事实证明，企业用人多了，大家堆在那里不干事，说怪话，对改革有阻力。对此要下决心，搞得不好的要淘汰，首先是人员的淘汰、更换，还有企业整个淘汰。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就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不管大、中、小企业，都要达到这个水平。他说，不要小看小企业，小企业也可以办大事，可以赚钱。小企业搞起来，连外汇也增加了，这不是好事吗？！

（5）培养专业人员，提拔年轻干部。一方面我们的企业人浮于事，冗员太多，另一方面我们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又太少。这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个突出矛盾。为此邓小平要求各大型企业都要建立科研机构，除了从事研究，还要对在岗职工进行培训，使其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和熟练操作现代化、自动化生产线的本领。此外，企业中的“万金油”干部多、年龄大的干部多的问题必须解决。他着重举了包钢的例子，说，方毅同志到包钢去，内蒙古的同志讲，包钢现在的党委书记、厂长、经理，都是没有管理经验的，不懂行的，但是老资格。可是那个厂有个副厂长、副经理，这个人五十多岁，很有事业心，也懂行，肯干，但是有一条，叫做骄傲。什么叫骄傲？他只要能干出一番事业来，骄傲一点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不选上去呢？我不太了解。如果只是骄傲二字，就应该提起来当经理，他懂行，他有事业心，他有干劲，他有基本条件，也是共产党员嘛。

在邓小平看来，上述措施的实行并非一日之功，还需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还必须辅之阶段性配套工作，才能逐步见到效果。因此，他十分注意改革措施实行过程中的步骤问题。

比如，他提出引进外资和项目，就要权衡一下，按轻重、缓急，看哪些在先，哪些在后。而每个项目又都要考虑支付能力。1979年5月10日在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时他谈到这个问题说，前不久国际上都知道，我们和日本引起了一个争议。这个争论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经验，引进的石油化工项目、钢铁项目都是现汇偿付，利息也很高，所谓利息就是以日元计算还是以美元计算的问题。因此他主张像这类问题，以后要更多地搞补偿贸易。

又比如，相对于我们过去没有法的状况，第一步当然是立法，但邓小平考虑，法本身有个完善的过程，因为我们没有经验；与之相应的另一个问题是立法要守法，按法办事。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1979年6月28日，他会见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时说，我们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个法是不完备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我们政治意向的声明，以后再搞一些具体的执行条例、规定来加以补充。而一旦制定了法律，就要坚决按法律办事。当时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七个法律，邓小平在6月25日党内负责同志会议上着重讲了依法办事的问题，他说，以后党委领导第一条就是保证法律生效、有效。当然，不是干预法律，应该保护法律，党委领导的作用，应该保证法律有效！

邓小平还特别注意企业中富余人员分流的问题。他说，分流问题的解决主要有两条途经，一条是组织培训，作为编外待岗；另一条是在城市里开辟新的就业领域。1978年9月16日，他谈到鞍钢这样的企业，指出，我跟冶金部长唐克说，你鞍钢假设用五万人怎么办？他说，有办法，我也想了一些办法，不管怎么样，你五万人必须合格，开始可能选不出五万人，不合格的当预备工，预备工工资低，有的搞了一二十年的，也只能当预备工，有些年轻的，有本事的，一下子就当六级工、七级工。所有

不合格的工人，作为编外人员，编外的人员都给予进修机会，原工资照发，办学校进修，训练好了，再调到钢铁基地去。当原有行业容纳不了这么多人的时候，他要求开辟新的领域与行业。他还要求注意研究城市结构问题，曾对胡乔木、邓力群说，为什么人家外国的城市能容纳那么多人？而我们的城市却容纳不下？这里面恐怕有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有一个在城市里开辟新的领域的问题。总之，要研究一下什么工业、什么领域，我们要去开辟，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他特别提到要发展旅游、建筑、服务等行业。

现在看来，邓小平这种分步骤落实改革措施的办法确实是切实可行的。

#### 四、“坚持”与“发展”：方法论的启迪

在当代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结合时代实践作出创造性的发展，绝非易事。多少人在这一问题上陷入偏激或迷惘，导致挫折和失误。而纵览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思想，不难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是十分娴熟和精到的，在他的讲话、文章中处处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准确引用和运用。通过这些论述，邓小平出色地处理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从而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提供了方法论范例。

其一，把握精髓与实质。

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既保持着其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科学性，洞察历史大势的有效性，也存在个别结论、某些提法明显的失准、落后或“过时”，还有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未被其所涵摄与论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科学的态度，看到其基本原理与个别论断之间存

在的差别；而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握其精髓与实质。正是出于这种态度，邓小平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时，首先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说，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便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坚持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自身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总之，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抓住根本，重在“结合”，注重实事求是，这正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其二，在驳难中准确理解。

邓小平在新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从某种角度看，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驳难中实现的。在其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过程中，邓小平与党内外各种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作了坚决的斗争。近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也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中制定和形成的。即如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间，中国共产党经过两年徘徊时期，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错误地坚持“两个凡是”，从而使中国没有能够从“左”的枷锁的束缚下解脱出来。邓小平坚持和捍卫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时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报告，提出要解放思想，打破思想僵化。他积极支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希望通

过讨论进一步澄清是非，让人们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不仅要反对来自“左”的方面的错误，而且还要反对来自右的方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思潮的鼓吹者往往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篡改。邓小平在反对右的思潮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他始终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举的方针。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指出：“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的方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后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种右的错误最终形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多次指出和分析了这种错误思潮的本质。他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与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和诋毁意识形态领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认为真理是多元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一元，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学说中的一家。这些论调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鼓吹西方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念，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必须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指导地位。坚持与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坚持是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坚持，也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而另起炉灶；反之，发展是坚持的目的，坚持是为了发展，发展是更高层次的坚持。离开发展，马克思主义难免会被当作僵死的教条。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重要谈话中提出要反对形式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等，就是针对一些教条主义而言的。因此，我们看到，同样是在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得

到更加充分的论证，经受实践的检验，得到更新和发展。

其三，历史反思与实践反馈相统一。

历史是一面镜子。邓小平是自觉的历史反思者，他在思考现代化与发展问题时，首先对历史进行认真的清理。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最为相关和切近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100余年的浮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70多年的兴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40多年的经验、发达国家现代化300年的历程以及对不发达国家近20年的坎坷。正是在对历史的总结分析中，邓小平转换了思路，变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为“科学化”、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变“拒斥资本主义”为“利用资本主义”、变“依附世界体系”为“走自己的路”。历史反思，显示了邓小平恢宏的时间意识和卓越的分析能力，使他的发展观经历了丰富的历史底蕴和超越性质。

如果说反思历史是从纵向的角度、从过去看待今天的问题，那么实践反馈则是从横向的视角、从今天的现状确定行动方案来校准未来的发展。所谓实践反馈方法，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巩固好的方面，纠正错的方面，不断把协调和创新相结合从而向前发展的方法。邓小平指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同时又在抓紧解决问题中总结经验，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一步比一步经验更丰富、路子更宽。这就是实践反馈方法。这一方法保证着我们立足实践，从实践出发，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从而把战略蓝图通过实践具体化。这一方法也是小心谨慎的方法，小心谨慎不是谨小慎微，左顾右怕，实践反馈方法作为小心谨慎的方法，是我们在大胆地“试”和“闯”的创造性实践中，如何不犯大错误，避免犯中错误，迅速纠正小错误的办法。只有通过实践反馈，不断总结和不断纠错，才能保证小错误不演化为中错误和大错误。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就是这种实践反



馈方法，它包括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以及因地制宜、不一刀切的方法，这些方法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创造性实践的重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

必须指出，邓小平在思考发展问题时，历史反思与实践反馈是结合在一起的。既注意历史考察与总结，又注意实践的反馈与修正，从而使他的发展理论更富有操作性与可行性。

其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要旨在于创新

不唯上，不唯书，敢于突破经典作家某些过时的个别论断，最主要的是要有理论勇气。马克思、恩格斯处于19世纪，当时欧洲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其具体而特殊的情况，由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性难免会得出不符合今天情况的结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敢于突破旧的条条框框，结合变化了的时代和背景，为马克思主义添上新的色彩。这需要有探索精神和理论勇气。“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就是邓小平在新形势下运用实践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突破。邓小平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他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如果没有理论勇气，那么一旦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就束手无策，更谈不上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更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作为“方法”来运用，高超地处理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问题。

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之日起，“计划经济”

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不论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教科书，还是中国的教科书，都不回避这一点。甚至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也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观念。与此同时，人们认为，市场经济一直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范畴，而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根本对立。50年代南斯拉夫曾经提出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结果被视为“异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都遇到了市场问题的困扰，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姓“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能够以实践为标准检验各种理论，正确地进行观念选择。当我们真诚地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它优越于市场经济的时候，客观的经济状况表明，在总体的经济竞争中，它创造的经济成果及其效益远不如市场经济，甚至还暴露出一些原来想不到的许多弊端。

邓小平以实践为标准检验我们的理论和认识，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第一次肯定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1979年11月，他第一次提出市场经济问题时，他就谈了两个重要观点：其一，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他鲜明地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其二，市场经济是一种方法，可以为社会主义用来发展生产力。他说：“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在1985年、1987年、1992年，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一论断的重要意义，就是把人们的思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9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94。

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把市场经济定位在“方法”或“手段”上。这样，就解决了它能不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这个关键性的理论难题。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手段的运用确实增强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邓小平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胆结合起来的理论勇气为我们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榜样。

综上所述，邓小平之所以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推进到当代，在于他尊重实践，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力，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具有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纪元的巨大的理论勇气。

## 第七章 扬弃与超越

### ——邓小平发展观与现当代西方发展理论之比较分析

现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反映了西方学者对当代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这是一幅形形色色如万花筒般驳杂的理论图景。在本章有限的篇幅内，我们只能从显然不甚完全的概括中把握其嬗变轨迹与总体特征。总的说来，这些理论在触及到当代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同时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也就不可能达到科学的地步。在一篇文章中我们曾尝试分析过其理论失足的症结，即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单一与框架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特征，以及学院式研究成果缺乏转化为实践的能力。

与这些理论相比，邓小平政治家的视角与注重实践的品性使其发展观显示出独特性、深刻性与超越性。他虽然没有研究过西方发展理论中的具体人物与流派，但由于所面对和所要解决问题的一致性，使他的发展观与西方这些发展理论之间具备了可比性，特别是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症结、特征是为他所准确把握与着力注意的。所以，他能以此为鉴，破除了现代化即“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观念，注重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途径，力求保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快速的发展。邓小平发展观正是以关于社会有机体系统全面运筹的辩证思考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的准确定位，把其设想具体运用于实践，并

获得了成功，从而超越了西方形形色色的发展理论。

## 一、现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嬗变的历史轨迹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heory）又称发展学或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兴起的社会科学分支，其主旨在于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示向，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动力、特征、模式和范型。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中，大致经历了4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70年代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80年代的“新发展观”、90年代的“文明冲突论”等理论形态的更迭。在此，我们试作一简单的梳理。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是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发展学家们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世纪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基本的立论依据，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为基础，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法、德等国的历史经验作了分析，探讨了现代化的动力、特征、模式等问题，形成了包括发展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在内的早期发展理论。

发展经济学主要采用实证归纳方法和统计方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它把“发展”看作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把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的甚至惟一的标准；把以工业比重的上升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的变革当作发展的核心；把储蓄、投资的增加以及科技进步、“知识的增长”等看成发展的动力。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lewis）、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等。

刘易斯主张以有限的资本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通过把它投入到工业部门而实现资本的自身增殖，最终推动工业部门比重的上升，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变革。他认为，对于那些庞大而又极为落后的农业部门与较小但又相对先进的工业部门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来说，发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有效、合理地使用有限的资本。但在诸如有限的资本来源于何处、投入增加这一引擎自身如何启动等关键问题上，刘易斯就陷入了困境；此外，在有关资本被投入于工业部门后又如何实现自身增殖等问题上，刘易斯同样做不出明确的解释。

费景汉和古斯塔夫·拉尼斯以刘易斯的理论为基础对二元经济的发展道路及其动力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他们肯定了工业的重要作用，同时特别强调农业的发展才是“构成一国经济的任何真正持续扩大的基础”和“发展过程的原动力”，提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应该说，这一观点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当他们试图进一步回答劳动生产率怎样才能提高时，又回到了刘易斯储蓄、投资决定经济发展的老路子上去了，实际上重新陷入了迷途。

总之，发展经济学试图按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向落后国家提供一种能够自行启动、自行运转的经济发展模式，又把整个模式启动和运转的动力归结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储蓄、投资等因素。然而，怎样才能获得这些启动因素或推动力量呢？他们没能做出正确的解答。

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注意到了发展经济学只注意发展的经济内涵的偏颇和倾向，试图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经验

参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84。

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第29页，华夏出版社，1989。

为样板，力图从社会进化论角度描绘出一个内容更加宽泛的现代化图景，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背景出发勾画出现代化历史过程的所谓一般特征。例如，它认为，所谓现代化过程是指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渐进的转化过程；西方是世界上最先进入现代社会的地区，其他社会转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现代特性”（modernity）代表了现代化社会的一般特征；因此，其他地区的现代化应仿效甚至全盘接受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及其“现代特性”。简言之，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被称为现代化理论开山始祖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考特·帕森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在古代犹太民族和古希腊文化传统制成的“温床”上孕育、发展出来的，其典型载体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因此，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那一套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向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由此得出结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美国化，现代化应仿效甚至全盘接受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及其“现代特性”。

帕森斯这套理论虽然在西方发展研究领域风靡一时，但在实践中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批评。显而易见，每个国家社会结构、体制特征和文化传统等都各不相同，其现代化过程必然沿着彼此不同的发展轨迹向前推进，而不可能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那一套“现代文明”模式的模仿或“复制”过程。

我们看到，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尽管立论角度不同，然而，同样偏狭的观察视角和现实依据促成了它们共同的本质特征：两者都是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对近代以来西欧、北美国家的现代化历史经验进行单层次的经验描述和实证归纳，并把所描述的

经验事实视为现代化的最佳模式和落后国家学习的样板。正因如此，以这两个流派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理论被称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发展理论。

60年代中期以后，早期发展理论的立论依据和研究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许多观点也遭到“修正”乃至否定。于是，当代西方发展理论进入到新的演变阶段。在这个阶段，发展理论家们开始把考察的视线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转向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实践，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观察视野。虽然一些学者仍难免戴上西方式的有色眼镜来观察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但“西方中心论”或“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理论前提已被大多数人抛弃。

发生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及其后果的批评性反思。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经济学和模仿战略的影响下，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表现为单一经济的畸形发展，而整个社会系统功能失调，以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的粗放模式——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而忽视质的优化，致使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缓解，新的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又层出不穷，如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贫富两极分化、传统文化价值崩溃、战乱频仍等，以至危及到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与发达国家差距日益拉大。这种危机使人们不得不开始对以“西方中心论”为特征的发展观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过程及其后果进行批判性反思，并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地位来考察发展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以“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新的发展学派。

作为对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进行反省的产物，依附论把西方发达国家叫做“中心国家”，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叫做“边缘国家”，它认为不是西方“发现”了不发达国家，而是西方



“制造”了不发达国家，亦即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发达”造成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即是落后国家的“边缘化”过程。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建立在对边缘国家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基础上的，并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依赖性和从属性。因此，非西方国家已不可能在同样的初始条件下重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必须脱离西方控制，实现自主发展。一些学者还据此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基本需求战略”等社会发展战略。世界体系理论则从全球视野出发，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统一的大体系来考察，探讨了现存世界格局形成和演化的原因、条件，分析了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并对今后世界体系的发展变化作出了预测。

与早期发展理论相比，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表达了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主体地位的深切关怀。然而，这一发展观并不完善，因为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中仍然只有一个主体、一个中心。尽管这种发展观关注着第三世界如何摆脱依附地位，成为独立发展的主体，但实际上在既定的世界体系中，第三世界很难摆脱受控制、受奴役的地位。这样一来，等于取消了他们成为发展主体的可能性。那么，谈“摆脱奴役”又有何价值呢？这种发展观的纰漏显而易见。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由于西方工业国的经济衰退、越南战争、民权运动的兴起等，发达国家一系列内外矛盾激化，经典发展观和现代化学说受到来自资产阶级内部的批判；同时部分西方学者开始对传统工业化造成的弊病和后果进行反思，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经济的尺度外，还应包括各项社会指标，应当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因此，工业化不是最理想的发展模式，而是一个必然会被超越的过渡阶段。于是，“发展”的

内涵突破了早期阶段的狭义性，逐步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诸层面。

80年代，一种新的发展观，即以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为中心的增长观念开始形成。法国学者F·佩鲁较早提出这种新发展观，他对经典发展观与工业化观念提出强烈批判，认为在增长—发展—进步三者中，文化价值起决定作用，决定加速或减缓增长的必要性，并检验增长目标的合理性。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是危险的。他试图从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上重新审视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以人为中心确立研究视野，从人的活动及其发展的角度考察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他指出：“1. 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并且2. 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罗马俱乐部前主席奥尔利欧·佩奇在80年代初也明确指出：“任何进步（不论是科学进步还是其他），如果不同时使道德、社会或政治也取得进步，那就毫无价值可言。”“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先于人类发展或与人类发展不齐头并进的经济发展。”这种新发展观把人的发展作为核心，引入了新的价值参照系，凸现了原来隐藏在物质文明背后的精神文化价值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是西方学者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和人类生存环境进行批判性反省的结果。

佩鲁等人将发展视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过程，必然要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在世界总体的发展中，各种文化、文明的相互关系如何？这一关系又在当代全球的发展中居于何等地位？美国的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作了阐释。他认为，未来全球发展的基本模式，不再是“西方中心论”或任何单一主体论，而是多极主体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随着冷战结束，全球政治未来走

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第84页，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5。

向的核心方面是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当然也主宰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具体说来，文明的冲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文明的差异性及其稳定性。文明的差异是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具有稳定性，因而比政治、经济的特征和差异更难协调和变更，这种文明的区别往往与经济区域主义的兴起紧密相关。交往的扩大，使世界变小。全球一村，世界一家，使不同文明的人强化了文明意识，推动了文明间差异和敌意的增大，相应增强了各文明内部的寻根意识。现实世界发展的推动。西方的强大，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和习俗在非西方国家的流行，成为非西方文明发展本土文化、本土精英的反向动力，多元文化建构已成为多极发展的内在条件。基于以上原因，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一个基本的和必然的事实，而且是冷战后国际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基准线，主宰着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并且它将以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冲突表现出来，主要存在于两个文明的交合处。

亨廷顿将文化的因素引入对社会发展的诠释中，显示了当代发展观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政治层面向更隐性层次的深化和拓展，他确认了非西方文明在全球发展中与西方文明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顺应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但仔细分析他立论目的，仍是为了“西方的牵制”和“西方的利益”，为了西方在现在和将来都在世界政治中保持优势地位。他建议西方了解作为其他文明基础的基本宗教和哲学学说以及在这些文明中人们看待自身利益的方式，但同时要求西方维持必要的经济军事实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西方在和这些文明交往中保持自身的利益。不仅如此，在他看来，文明间的主要关系是冲突、对立，他没有认识到不同文明、文化之间还有和平交往、共同发展、优势互补的相互依赖关系。置国际间日益增加的合作于不顾不见，这导致了他勾画的全球图景与全球发展的实际格局有明显的矛盾，因而颇遭

非议。

##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发展的诠释

除了公开以“发展研究”自命的上述流派，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以其鲜明的特征为发展理论带来新的景观，它虽然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如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社会思潮，但对现代化、发展问题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与论析，因此有必要对此有所关注。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在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社会土壤里所产生的现代主义的“危机”与衰落。从理论的直接性上看，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化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说就是“颠覆”与“解构”。

现代主义观念体现的是所谓理性主义精神，最能体现现代主义哲学精神的是两位伟大哲人的两句格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前者否定了上帝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的谬说，把人的存在的证明建立在人自身、人的自我意识上；后者则表明理性不是用于证明上帝存在的工具，而是为了认识自我、控制自然，“达到人生的福利和效用”。这就揭示了理性是证明人的至上性的工具和谋求人生幸福的工具。人的至上性和理性的工具性（为人服务的手段），是启蒙运动掀起的世俗化思潮的两面旗帜，也是构成现代主义哲学的两大要素。

现代主义解放了人的个性和尊严，引发了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工具体系的建立。问题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现代主义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在“杀死上帝”之后，开始“牵制”人类自己了。具体地说，科学技术在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给人类的幸福带来巨大效应的同时，也开始越出自己的适用范围，将自身的思维方式、操作方式变成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精神领域的楷模和终

极标准。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之所谓科学技术对人的意识形态的牵制。更有甚者，商品和金钱成了一切价值标准的终极裁判，思想、道德和精神都丧失了自身的标准。换言之，人平面化了，异化了。现代主义所张扬的理性，终于从“为人服务”的工具变成左右人的“主体”。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主义的误区，就在于盲目地相信，只要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就可以据此来改善人类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知识、技术的运用，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实践。后现代主义所要摧毁的，就是用这种理性框架一切、整合一切的形而上学信念。

从社会根源上看，后现代主义是对行将到来的信息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由大机器工业为标志的工具时代进入以计算机应用为标志的所谓信息时代。表面看来，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是现代主义的胜利，因为计算机的操作似乎是在一种纯客观的状态下进行的，这种“逻辑机器”和“推理工具”是在没有人的干预下发生的，计算机是“不表示意义的表达机器”。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计算机这种后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恰好证明了现代技术理性主义观念是一种“虚构”，因为数据的传递要以赋予信息以意义的判断为前提。详尽地剖析后现代主义是困难的，我们在此只举对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有显著特点的三个论点为例，以期收到窥斑知豹之效。

### 1. “后工业社会文化矛盾论”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早在60年代现代主义喧嚣声中就发出的异样的声音。贝尔透过大工业生产的高效高能，看到一个以信息为工艺对象、以科技产业为主要职业的崭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并将这种社会命名为“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标志着“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业已结束”，因

为意识形态为人们提供的往往是动听而行不通的办法，无法解决人类的困境，它理应“终结”，代之以“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1973年，贝尔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率先从后工业社会理论入手，直观后现代主义文化。1978年他又推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更进一层地展开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

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付出了重大代价：失掉了文化的一致性；颠覆传统文化秩序的同时，也影响了文化标准本身；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模糊以至消融。它作为一种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使整个社会向享乐文化偏航。而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推进，从而达到了现代主义的巅峰状态。它是一种反文化，其目的是通过对人们感觉方式的革命，而对社会结构本身加以改革，以反文化的激进方式，使人对旧事物一律厌倦而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

但是实际上，反文化也被证明是银样镗枪头，它试图把自由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加以改造，推出一个现时遂愿、夸耀炫示的世界，结果既未产生什么文化，也没能反掉任何东西。看来，走向后现代主义并非人类的福音，以一种更激进的方式获取的并不是灵魂的栖居，而是一种灵魂的虚空。怎么办？贝尔在其晚年殚思竭虑，为步入后现代社会的人类找到一条精神救赎之途：向后工业社会的“新宗教”回归，通过传统信仰复兴来拯救人类。这便更加虚妄。

## 2. “发展所导致的衰落综合症”

奥尔利欧·佩奇1968年创建罗马俱乐部后，集中一批世界有名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物理学、生物学、数学、未来学专家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机”和“发展困境”作过广泛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报告，并列举

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世界性疑难问题”，描绘出一幅由种种疑难问题交织而成的“人类险境图”：“人口无节制的增长、人民之间存在的鸿沟与分裂、社会不公正、饥饿与营养不足、贫穷、失业、盲目增长、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能源危机、民主危机、货币波动、保护主义、文盲、不符合时代的教育、青年的反抗、疯癫、，庞大和衰落的城市、犯罪、农村的遗弃、吸毒、军备竞赛、社会暴力、侵犯人权、无视法律、原子狂、制度僵化、政治腐败、官僚主义、军国主义化、破坏大自然、环境污染、道德价值衰退、丧失信念和不安心绪，等等。这一切都在发展，不断地相互激荡。” 奥尔利欧·佩奇称这些是现代人类的“衰落综合症”。

概括地看，罗马俱乐部所论及的现代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可分为三类：一是国际社会的“困境”，主要有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集团等这样一些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相互磨擦、相互冲突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的抗衡问题，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问题，克服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即全球性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等。二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困境”，主要是指全球普遍存在的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粮食不足、环境恶化等问题。三是社会人类学方面的“困境”，主要是指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进步、人口发展、道德信念、健康与人格发展等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罗马俱乐部的重要代表们揭示出了这些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或“阴暗面”，但对于如何解决这种全方位的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也乏术可陈，他们称“通向复兴的道路又直又狭”，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极限”，零星方面的修补无助于危机的根本挽救。

尽管在晚年，佩奇悲观论调稍有改变，提出“实施全球性的政策和战略；把世界引入可梳理的状况；学会如何治理世界——须先学会如何管理我们自己”等等，但这些想法还是过于宏观与抽象，于事无补。他们提出了问题，但却提供不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 3. “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论”

我们曾描述过哈贝马斯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论体系。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并不满足于仅仅进行批判性的解构，还致力于建设性的重构。他提出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的变革方案，探讨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变革的动因（为什么要变革）、目标（通过变革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体（依靠谁去进行变革）、对象（究竟变革什么）、道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变革）的完整方案。他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根源于“无产阶级的贫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的条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在这一社会中“乌托邦力量”已经“穷竭”、“理想主义已被现实主义所取代”，因此不能在“剩余价值学和唯物史观”基础上去寻找新的革命动因，而应着眼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与人的“交往行为”越来越不合理的矛盾，揭示人的本质遭受压抑，人的交往行为被扭曲的病症。

因此在变革的目标上，哈贝马斯反对把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作为目标，主张把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作为目标，即让对话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求得相互“谅解”，也就是说使交往不受限制，使交往者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控制与压抑的生活世界里。他有时把“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称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关于变革的主体，他否定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把新“左”派当作新的革命主体。变



革的对象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即“是补天而不是拆天”。变革的途径有二：一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二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其中建立道德规范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万应药方，真正有效的道德规范“应能为一切有关的人不经强制地加以接受”，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是道德的普遍原则。而一种万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环境”的建立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决定因素，“语言环境”是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行为环境”，是与其他系统有着意义联系的“包含意义的系统”。

我们看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主导倾向是消解、颠覆，即是说在对社会问题的观察、思考中，大多数论者偏重于从否定、消极的意义上立论；与之相比，哈贝马斯的变革方案，体现出一种建设性向度，这是其积极意义。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方案本身却仍是缺乏实践基础的理论推演。借口时代变化否认“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对解释当代社会问题的有效性，表明了哈贝马斯根深蒂固的理论偏见；而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奢谈主体间的对话与交往，更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 三、西方发展理论的总体特征与困境

无论是拉起旗号、公开榜示的“发展研究”，还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涉及到的众多的问题，都反映了当代西方学者对社会发展的强烈关注。对此作简单的和草率的评判是不妥当的，宜对此加以慎重分析。

首先，我们看到，西方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问题学”特征。他们反叛传统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哲学思维方式，将现当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从问题出发谈社会发展是他们共同的思路，这种信念如此顽固，以至于在他们的论著中对

问题的揭露、分析是最淋漓酣畅的段落与篇章。在他们提出的诸多方案中，社会发展过程往往成为问题的解决过程，但结果问题层出不穷，此隐彼现，于是只好陷入“问题”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西方发展理论中，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首先异军突起，原因就在于学者们看到了“二战”后刚刚从长期的殖民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的民族和国家，十分贫困、落后，尽快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成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此，探索经济发展之迷成为当务之急。但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在指导发展实践时，虽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有些许成效，但远未达到预期的佳绩，相反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文化冲突、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调、失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巴西、伊朗、巴基斯坦都在60年代—70年代因经济增长较快而一度繁荣，但巴西只不过是一颗经济彗星。

这些问题的存在，又促使西方学者注意到，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进化过程，从而他们的发展观也由单纯经济增长论进入到全面发展的理论。后现代主义则是在工业发展登峰造极、理性逻辑试图僭越一切的景象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工业化对环境、生态和能源造成的破坏和惊人的浪费，以及压抑人的严重后果。诚如赖克所指出的，工艺“是一种愚蠢的破坏力量，它使环境恶化，埋没人的价值，驾驭人的生活与智慧”。正是在这些“问题意识”的支配下，后现代主义开始了自己的反叛。

其二，西方发展理论拓展了发展问题的界域。发展学家们运用多种学术手段，加强了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早期发展经济学采用实征归纳方法和统计方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现代化进行了分析；60年代后在突破只对发展过程的某一方面做粗泛的

宏观分析的旧框架之后，又开始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文化学等多种学科角度探讨发展问题，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分支和流派，如发展哲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文化发展观，以及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有的学者还运用多学科和跨学科方法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实践做了具体的个案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后现代主义则以其融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为一体的特征，更宽泛地涉及到很多深层的问题。

这些都使西方发展理论自觉不自觉地达到了过去不曾达到的深度和高度。

比如，在发展目标问题上，发展目标何所指？它是单一的还是综合的？如果是综合的，是否存在核心问题？这是贯穿西方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始终的线索之一。增长与发展之间的不牢靠性促使人们看到：增长不是惟一目标，发展应包括政治的民主与秩序、经济的效率与公平以及民族的自主性等等，这里的“自主性”所包含的人的因素已初露端倪。美国的亨廷顿正是据此提出发展诸目标的相容性假说，旨在把发展着的社会看作一个面面俱到的社会。然而，事实上的面面俱到是不容易做到的，各因素间的冲突在所难免。那么，矛盾与冲突之中，哪一个是最主要的，或者是统摄各因素的？站在更高台阶上考察发展，便会发现“人”这个潜藏在各种具体目标背后的关键因素。无论是经济目标、政治目标还是别的，目标的实现与否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问题。社会是由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所构成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把握和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理论所应遵循的研究路线。

发展目标的认定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发展动力的理解。发展经济学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储蓄、投资等看作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至于怎样获得这些动力，也就是说动力之动力何在，他们无法回答；“西化派”把西方国家的榜样力量和文化传播过程作为落后国家走向发达的强大推动力量；“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则意在由政治革命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主体地位的改变，从而实现发展；“新发展观”的倡导者正确地看到了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发展与发展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的必然联系，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深入下去，由此探索出发展过程的最终动力源泉，而是陷入了把人性、理性等视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的唯心史观的窠臼。正是在一片茫然之中，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开始注意到了广大农业劳动者的历史作用，并试图在“科学技术进步”、“知识的增长”等因素中寻求发展的根本动因。然而，仅一步之差，他们也没有找到隐藏在这些因素背后的主导因素、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发展道路的选择又是发展理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数百年的原始积累，再加上掠夺和倾轧，也包括列强竞争，西方国家率先打通了走向发达的道路。一些论者主张步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尘，沿着它们的路走下去，“发达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任何人都不能找出一点与当今发展中国家中的实际情况可以说是恰好相当的情况；即使牵强附会找到一些，这两者又处于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国际环境当中，仍然是不能作同等看待的，作相同处置的。再者，处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时空背景下，不发达国家面临发展问题，发达国家同样也面临发展问题，尽管二者在水平、程度、速度、条件诸方面存在差异，但多元发展中，谁也不具有绝对的示范、指导意义。当然，借口“差异”，走到另一极端，固守“本土论”，不向先进国家学习，也是不行的，那将会

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永远赶不上人家。于是，瑞典发展学家B·海腾提出一条突破“西化论”和“本土论”而建立一套科学的“普遍化”的发展理论体系的思路，但仅仅限于设想而已。

发展目标的确立、发展动力的更新、发展道路的选择最终意味着一种基本定型的发展模式的形成。西方发达国家在自己的发展中形成了所谓的“欧洲模式”、“北美模式”、“日本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非西方国家也有“巴里洛克模式”、“东亚模式”等。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是否可以套用这些模式？或者说这些模式是否具有当代意义？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是否需要“模式”？当代西方理论给予了不太相同的回答。“西化派”承认模式，甚至可以说崇拜模式自不待言，包括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哲学等在内的“后发展理论”却提出“我讨厌模仿自己”，从而否定发展模式的任何意义，这恐怕是偏颇之论。在这里，对模式怎样诠释就成为很关键的问题。其实，“模式”虽提供了对某一范围或条件下的发展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见解，从而不易为枝节问题所左右，但它却不是涵盖一切、什么时候都奏效的保险；它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启迪，而不包含具体走势的指标，对它太崇拜或太鄙视都距真理太远。不管怎么说，在发展模式上，西方发展学家开始摆脱对模式的盲目崇拜，而更注重它的方法论意义。所有这些，虽然谈不上完善与完美，但至少说明，他们对发展问题的研究较之以往有了突破与进展。

其三，西方发展理论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是这一发展进程在理论上曲折的反映。或者说，推进西方发展理论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实践发展之手，特别是现代化社会的问题和矛盾，促使发展学家逐步改变着思考路径。

以发展观念为例，作为发展理论和发展科学的前提与核心，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第一阶段，是从发展的客体论到发展的主体论，即从把发展归于人之外“物”的发展，以经济增长和财

富的积累为尺度转向以人本身的现代化为发展动力和根本标准的发展观；第二阶段是主客体相关论，其理论有“中心 - 边缘”理论或依附论，以及佩鲁的发展主体、文化价值和世界交往的整体结构论；第三阶段是从消极的多极主体交往所造成的“文明冲突”，转向多极主体模式所体现的全球化发展理论。

之所以发生这种嬗变，就在于20世纪的现代化实践宣告了下列观念的破产：把增长等同于发展，以经济取代其他方面，以西方经济学为蓝本建构体系框架，以指导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对人作抽象化的理解，对人的现代化的判定脱离了本土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对非西方国家发展的主体地位、发展的内生性持否定态度，或者希望第三世界摆脱奴役，支持其为争取自己的主体资格而进行斗争，但又不相信其自主发展的能力；将发展问题视为文化问题，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冲突，陷入文化绝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实践在使上述发展观破灭的同时，呼唤一种多元化、平等性、开放性、交往性的发展观，使世界能在一体化进程中呈现出飞速发展而又多姿多彩的画面。

当然，西方发展理论在发展观上所达到的科学程度是有限的，他们触及到了一些重大问题，但常常是现象罗列、平面化议论、情绪化指责，多数分不清主要与次要、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由问题生发出去，他们也提出一些方案，但这些方案多是由此及彼的理论演绎与反拨，缺乏实现的基础，也缺少必要的手段；在发展理论的建构上，他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模式，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在提出“新”的观点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困惑：

比如，他们虽然批判了那种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一般过程，把储蓄和投资的增长视为发展过程的最终动因的错误观念，并试图对“发展”的本质涵义加以

重新“审定”、对发展过程进行多方面的考察与分析，但他们又难于正确地说明“发展”的真正内涵，难于科学地揭示出发展过程的一般特征和根本动力；比如，他们虽然摈弃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错误理论，批驳了主张全球现代化过程必须遵循西方模式的西方中心论，更可贵的是，有的学者不无合理地指出，每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在继承其“历史遗产”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他们最终都没有正确地指出决定各国现代化模式选择的“共同的”终极原因和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还比如，他们虽然已经意识到发展理论必须从落后国家本身的实际出发，为其发展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示向与政策依据，并沿着这个方向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他们在理论上陷入的困境使他们提出的种种方案最终也只有沦为“与现实世界上实际发生的发展并无多大关联的”“空想”（ideology）。这正如一位西方发展学家所说，发展理论“几乎对每一个问题都做了解答，然而每一个答案本身又是一个引起许多争议的问题”。

概括地看，西方发展观走入误区的症结就在于：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单一与框架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特征，以及学院式研究成果缺乏转化为实践的能力。

西方学者研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问题，极易陷入这样两种误区：一是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成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经济增长之所以长期受到发展学家们的青睐就是这一原因所致，而当其他社会问题比如犯罪、吸毒等成堆时，他们又把社会发展归结为道德与秩序问题。其二是总从自己国家的观念、习惯出发，认为自己的即是最好的，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别人与别国的情形。西方学者越到后来越感到“西方

中心论”的局限，对其学说有所变更，但根本上无法拨出这一泥淖。身处不同国度的他们既不可能亲身体验、也不愿设身处地客观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感受这些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所以他们的发展理论研究不论多么高妙，也难以摆脱隔靴搔痒的尴尬。这种研究框架与视角上的痼疾归结到方法上便是形而上学的机械性、片面性与极端化。

再从西方发展学家的身份看，他们大多是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因其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学院度过，他们的研究也就充满了学院式的特征。在他们的著述中不乏精确的数据、明了的图式、严密的逻辑推导，而这些也不能说是凭空臆造，但它们与现实之间的诸多中介环节却并不为发展学家们所重视，因此，当他们直接面对现实时，常常力不从心、沦为空谈。即是说他们的发展理论缺乏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比如，佩鲁的“新发展观”中意识到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如何把现实中的人引导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主体，发展中国家如何调整人的素质与数量不相适应的步调，发达国家怎样拯救日见委顿的社会情绪等等，几无对策。这就不能不使这种理论因缺乏现实性与可操作性而黯然失色。而这正是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的一大通病。

#### 四、邓小平的发展观：超越思辨、走向实践

邓小平发展观与西方当代发展理论相比，是20世纪下半叶东西方不同路径的发展构想与思路，是立足于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现代化的不同思考，因而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仍有一致的方面。

其一，二者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人类文明已经发生并仍在经历着一个



历史性的全球性的大变迁，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都在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自觉或者被迫地卷入了现代化的“大旋涡”之中。曾经流行的那种喜欢用社会制度范畴涵盖一切社会现象、过多地关注社会制度间的区别、对立和斗争，从而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排斥在视野之外，或者置之于资本主义的阴影之中的观念被无情地抛弃了，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发达国家力图保持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维持西方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世界发展格局。广大的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则千方百计寻找适合于自身的高效发展途径，通过尽可能快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尽可能多地吸纳世界先进文化，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求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尽快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而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世界大潮流。世界各地区发展的关联性日益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而尤为重要的是科学技术革命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这种发展大趋势是世界性的，是整个人类宏观文明的一次大变迁，或者说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在20世纪后半叶显现出的新特点。

其二，二者都对现代化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行了反思。邓小平具有深邃的历史感和宽阔的远程视野，他对现代化与发展问题的思考，总是首先廓清现实境遇，进行历史的检视和总结，最后做出新的设计和筹划。历史总结是全面的，不但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长达28年的曲折探索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模式”的影响，也包括对西方资本主义近300年历史及其后果的审视。他并不因为世界历史的一体化图景中资本主义现代化处于前列就放弃对其的批判与剖析，而是特别注目于这种现代化后果给予我们的警示。这使得他的发展观与现代化理论往往具有超越历史、超越资本主义的特质。西方发展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更以身临其境的感受，敏锐的观察力，列举了当代资本主义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面临的危机。尽管他们大多是

在维护资本主义体系的前提下揭露社会矛盾的，但这种批判仍可作为现代化理论深化的标志之一。

其三，二者对现代化的认识、具体的对策方案上存在某些共同点。无论是邓小平发展观还是西方发展理论都认识到：由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确立，使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为标志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加速，总量出现了传统社会中无法想象的增加，而且这种发展不是平稳的，而是跳跃式的、波浪式的推进；整个世界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分散、孤立和相互封闭，而是在真正意义上（主要通过世界市场）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发展整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企图保持传统社会那种在相对孤立条件下的独立发展、保持外来力量不能改变的社会内部稳定结构，那这个民族就会失去对现代“发展漩涡”的适应性，而被抛在现代文明之外，终至濒临绝境；支配现代发展的决定因素是现代生产力，它主要表现为非物质性能源的广泛应用、机器生产体系的形成、科学技术的革新等等，而科学技术的革新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社会发展越来越取决于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协作，依靠社会各层次、诸因素的功能分化，相互协作和相互依赖，而这种分工前提下的沟通、协作主要通过市场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竞争择优的市场规则，并且这种规则事实上演化为一般的社会规则。

但是，从根本上说，邓小平发展观与当代西方发展理论之间存在有巨大的差异，它至少在下列方面超越了西方发展理论，显示出其科学性：

### 1. 超越思辨的实践品性

邓小平对现代化与发展的思考总是与实践紧密相联，他的设想来源于实践，又力图使其转化为实践，不是思辨的逻辑推演和数据演算的结果。他反对思辨空谈、纸上谈兵、书斋妄言。他的

“走一步看一步”的提法便是这种实践性的典型体现。其要意是任何战略目标、宏大蓝图都是在充分客观地估价国情与现实的基础上确立的；确立之后，在具体实践和行为操作中，仍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反馈、调节。

这种发展观，首先不满足于现状，立志要改变现状。它不是只限于对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与矛盾作平面化罗列与揭露的“问题学”，也不是对当代社会的必然性“表示理解”、进行“合理解说”的“解释学”，甚至也不能完全归纳为对当代社会出了问题的地方给予“解构”的“批判学说”。诚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现状”。邓小平发展观首先表现的是对现实的一种彻底改变的态度和立场，是一种对待世界的实践方式。

其次，这种发展观在思考问题时，不尚空谈，讲究实际。西方发展学家对现代化“病症”也开出了好多“药方”，但或者卷帙浩繁的论著仅是抽象的逻辑演绎；或者针对某一局部问题发表的宏论仅具“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之效；或者戴着“西方中心论”的有色眼镜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议多有隔靴搔痒之感，这还不包括别有用心企图与谋略。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攻击，也往往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解构”，只对语言的逻辑规律加以“解拆”，以走向所谓的“前逻辑”。这种思路撇开了语言与人类实际生活的内在联系，赋予语言一种先验的价值，把语言视为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因而从语言到语言，更具思辨色彩。而邓小平对社会发展的思考则由社会的表象，走向历史的深处。他反对空谈，认为“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而且，他的思考总是先后有序，先解决什么，

后解决什么，相互关联，有机结合。既有步骤性，又有确定性。比如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战略发展蓝图的设计，就既有量的步骤与积累以及各种量的比较，又有质的跃迁与相对稳定。有了量的观念，发展的质才是可能的，否则就是空谈。正是由于对实践的关注才使得邓小平发展观在发展理论图景中惟一显示出可行性，结出成功之果。

## 2. 置身于资本主义之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准确透视

西方发展学家和后现代主义也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后果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准确地说是站在资本主义内部对资本主义的“疗救”，而不触及制度本身。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论突出地表证了这一点。在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各种危机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变革方案，但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否定“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革命动因论；反对把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看作社会变革所要达到的目标，从反对对物质财富加以“资本主义式”的利用延伸到反对物质财富本身；他所竭力推崇的“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乃是根植于传统唯心主义土壤之上的“纯粹交流思想”的乌托邦；他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而把“新左派”当作新的革命星座，把实现改革理想的希望最终寄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当权者身上。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声称要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改革，却竭力反对把改革的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提出要“公正地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因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持否定态度，他对他们横加指责。他从把科学技术视为造成“交往行为”不合理化的罪魁祸首出发，竟然要向科学技术宣战。由于回避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所以他对变革对象的论述近于荒唐。

而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则是另一种境况。他不是站在资本主义内部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表示“理解”，而是站在“之外”去透视、揭露其病症。因此与西方发展学家的资本主义批判相比，他更能击准要害、分清主次、辨明良莠。在他的发展观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对于资本主义，他总是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将它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看待，将它的现象与实质、历史、现状与未来、进步与代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其主要观点有：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看，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仍然是实行剥削制度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是贫富悬殊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是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制度；这种制度必然产生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富裕或比较富裕的国家，它们有剩余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我们可以学习其各种有益的知识经验，但必须明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并不是一个好制度，这与其政治制度远未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民主体制的虚伪情形、对外喜好推行强权政治、谋求世界霸权紧密相关。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看，发展二者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南方继续贫困，北方可能没有出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世界的稳定和发展有利，因此亟须建立新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新格局。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看，资本主义无法根治其现代化弊病，发展中国家搞现代化决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更合理的实现现代化的方式，社会主义可以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但社会主义终究会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 3. 系统辩证的思考方式

西方发展理论在思维方式上的一种普遍特性是走极端，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更为明显。他们倡言反本质、反中心、反整体，不承认事物现象背后隐藏着本质，把对事物本质与运动规律的探寻视为“形而上学的神话”；他们在反对工具理性框架一切的道路，非此即彼，走到另一极端，反对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而主张世界的多元化、碎片化，提倡所谓“小型叙事”、“谬误推理”。

邓小平发展观表现出与此完全不同的思维类型。它是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自己思考的导向的。早在1938年邓小平就说过：“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事实证明，辩证法是现实社会发展最为科学的思维方式，一如毛泽东所作的评价：邓小平的“这句话很厉害，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邓小平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包括三个方面：从事物整体出发来分析和把握某一事物，亦即把任何个体、现象、过程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关系之中，从而更深刻地把握住这一个体、现象和过程。这是从事物全局的相关性来把握个性；从事物、过程、要素的复杂关系中把握和抽象出它们的整体，使它们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则有序地结合起来，形成系统性。这是从个别与个别、局部与局部、要素与要素的相关性来把握整体的方式；从同时代人思考的各种问题中，形成更宏观、更一般、更概括的思考方式，即善于从局部进入整体、从要素进入系统、从个别进入一般的方式。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邓小平系统辩证思考方式的风貌与特征。一位海外人士这样评价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用一种比较理性的、既参考外国经验又符合本国情况的方式进行。这些在过

去百多年来所没有出现过的条件和特点，使这场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其实，这场改革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展实践的一个分水岭。

应该说，我们所列举的邓小平发展观对西方当代发展理论超越的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的谬失是西方发展学者在社会批判与实际构想中失足的内在根源，他们不无片面地揭露了当代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却未能为人类解决这些问题、走向美好的未来开出可以奏效的药方，最终走向了思辨、空论或反意义、反价值。而当代中国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认真分析了现实国情，大胆开拓，逐渐探索出一条可行性发展之路。而作为这种发展实践的理论概括与总结的邓小平发展观，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唯物辩证方法的准确把握与运用，以及理论的实践性、可操作性等特征，超越了形形色色的西方发展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推向了当代。

# 第八章 邓小平的发展观 与当代发展实践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邓小平发展观的实践意义。邓小平发展观产生于中华大地这一古老而新生的热土上，如前所述，它与近20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是一种双向互动互进的关系，即在实践中孕育的发展理论，反过来又指导与规范实践，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修正、丰富和完善。然而，科学的理论往往又具有一种超越特定地域与具体活动的特性，邓小平发展观也是如此。它诞生于中国，但又超越了中国这一界域，其影响、作用与意义绝不仅仅限于中国，而是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事实”（马克思语），从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 一、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邓小平发展观的具体化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社会在20年来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充满了活力和变化：过去的一切已远离我们而去，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密布的大都市、熙熙攘攘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场、欣欣向荣的乡镇和农村，给人一种全新的、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印象。

当然，更巨大的变化发生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曾几何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乃是不可触犯的天条；曾几何时，农民即使处在饥饿的边缘，也不敢提出“三



自一包”的口号；曾几何时，“文化大革命”中的八个样板戏居然成了数亿人的精神食粮。而今天，人们的精神生活已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争鸣，各种艺术品类的共同繁荣，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活力和创造性。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已告别了旧时代，踏进了新时代，而“邓小平”恰是这新时代的一个象征。换言之，我们已站在新的大地平线上，而这一新的地平线也就是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 1. 从“徘徊”中奋起

1976年10月6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横行不法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本来这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极好时机，然而，这一时机却没能被及时地把握住。诚如邓小平在后来回忆时说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

的确，当主要领导人的根本思路尚未摆脱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阐述的错误观念的影响的时候，特别是在明确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的时候，种种举动表明，当时中国社会不但笼罩在晚年毛泽东的影子里走不出来，而且这一影子也可能被扩大，从而把百废待兴的社会继续束缚在僵化的观念中。毋庸说，“两个凡是”在当时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它既阻碍着人们对“四人帮”的错误思想的批判不断向纵深发展，阻碍着冤假错案的全面清理和平反，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8页，人民出版社，1993。

事求是”的基本精神无法恢复，使新时期的各项工作举步维艰，更使中国共产党无法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思路中引出来，现代化建设无从起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饱尝十年动乱及长期极“左”之苦的中国不能再持久地维持这种状况了，于是一场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酝酿着展开了，当代中国的实际发展又一次以思想理论的解放做了先导。从理论上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念，把“两个凡是”与“四人帮”路线的极“左”实质联系起来；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重新阐发，引发了一场强有力的政治冲击波和全国范围的思想大解放浪潮；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展开无情的审视，科学地总结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客观地评价我们的功过是非。思想理论上的论争开启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大门，这就是在实践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否定“文化大革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在确立了上述新型发展原则与理论范式之后，适时地把改革开放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这样，当代中国结束了两年的徘徊局面，在新的发展思路下开始崛起。

## 2. 从重点突破到全方位推进

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延续了2000多年的中国农村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超稳定结构，在当代解体了。重新焕发了创造性的中国农民行动起来，首先实行“包产到户”，真正实现了对土地经营的自主权。

邓小平及时地支持农民这一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的大胆做法，他主张“允许看”，“让事实说话”。在他的支持下，四川、安徽先跨一步，1981年全国三分之一的省跟上，1982年三分之二强的省份也跟上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其显而易见的效果为全国农民所接受，三年后在全国普及。1958年以来确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废除了，那种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形式，被改革的汹涌浪潮推到了历史舞台之外。

当然，“包产到户”只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它初步奠定了农村发展的基础和实力，但停留于此显然还不够。邓小平关心着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设计着农村改革由第一步向第二步发展，热切等待着农业发展的新变化，等待着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把整个中国的农业及时地推向了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轨道。自古以来中国没有人做到的事，邓小平在改革和开放的旗帜下做到了。中国农业从黄土地上奋起了。短短几年，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副产品大幅度增加，农村市场迅速扩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全国各个城市流动。中国的农民离开了那块祖祖辈辈耕耘的黄土地，带着小工业和小商品开始流向全国、流向世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义乌小商品”……这些新鲜的事物，这些壮丽而又伟大的举动，汇成了中国农民奔向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1984年，邓小平把改革的目光和重点转向城市。三年实践证明了农村改革的成功，这说明城市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宣布：“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同时，他也充分估计到了城市改革的复杂性，估计到可能会出现的差错，提出“走一步看一步，有了不

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的工作方针。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改革在中国全面展开。

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的这一历程，展示了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领导艺术：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城市先搞试点，等到农村改革基本成功，有了一个坚实安定的基础，再将改革引向深入，一步一步前后有序，稳扎稳打，逐步深入。这既是从易到难，又是从点到面。若没有这样的设计艺术，在中国这样的国度改革开放很难顺利进行。

应当明确，上述改革，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直观地看主要涉及的是经济体制。1978年底，邓小平设计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改革旧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扩大基层自主权，权力下放，搞责任制。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便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革权力过于集中的命。

邓小平的这些具体设计，很快便进入到我国的实践中，理论和设想向具体行动、向具体操作转化。首先走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其次，开始了企业扩大自主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同时，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上马，“杀出一条血路来”；最后，在农村改革三年成功的基础上，1984年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一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地部署实施了。

1986年，邓小平又把他的改革目标从经济体制改革对准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放权与收权的矛盾，深深

地触动了邓小平。改革便是要放权于民，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但是，事实上出现了一个“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邓小平看到了问题的症结，“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设立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要解决这一问题，便要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

邓小平在进行农村、城市改革的同时，在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抓紧着科学、教育、文艺等体制的改革。他在1977年至1978年频频谈科技和教育问题。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在邓小平的设计下，1985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8年，邓小平走出更大的一步，要求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号召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邓小平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第一生产力，把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提到第一位，是着眼于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的科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在对内改革搞活经济的同时，邓小平也设计着对外开放。因为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只有在相互依存中才能相互促进。1979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的沿海部分地区首先行动起来，建立了经济特区，然后又开放沿海城市。在特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邓小平又作出了从内向到外向的战略重点转移的设计，要求以是否实现了由内向到外向的转移来

评判特区的发展。

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议贯彻了特区经济由内向转向外向的精神，要求特区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走以工业为主、工贸技结合、综合发展的道路。1988年，国家决定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1年又决定上海开放和开发浦东，从4个经济特区到海南开放，再扩大到浦东，这是我国对外开放一步步深化的过程，形成经济特区 - 沿海开放城市 - 沿海经济开放区 - 内地的开放格局。

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再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是当代中国将邓小平发展思想和改革路线深入下去、贯彻下去的轨迹。这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的现代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考与设计，是一个发展着的内部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它们一环扣一环，一步连着一部，气势宏大，结构严整，并始终处于发展和运动中；而当代中国的实际发展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渐次展开、稳妥前进、加速发展的。二者融为一体又相互促进。

### 3. 数据与评论所标示的实绩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是邓小平发展观具体化的过程，而发展的实绩从下面不太完全的数据中便可显示出来。

据统计，199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74772亿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1996年增长了8.8%。在1978年—1996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越来越迅速，有的年份增长达13.7%。

把这个增长率拿来和我国过去的发展情况相比，和当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相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近20年来我国

经济发展的飞跃速度。

1953年—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6.1%。

在50年代—70年代，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曾达到过二位数；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7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达到或接近过二位数，但在90年代，其经济发展速度已经下降，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时期，如1994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1%，其中日本为3.8%；到了1995年，日本的增长速度降为1.8%，美国为1.7%，德国为1.4%，法国为1.8%，英国为1.2%；到1996年，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典的经济全部为负增长；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在1994年的增长速度平均为2.4%，1995年为2.5%，东亚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在6%~8%之间。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具体表现为国民经济技术装备和工农业产值、国内外贸易、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全面增长上面。

国民经济技术装备在1999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600亿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1998年增加18.2%，加上1979年—1998年间完成的数额，大大超过了1949年—1978年期间30年的总和。

1999年农业增加值6650亿元，比1998年增长4%，而由1979年到1997年的农业总产值则从1698亿元增加到9085亿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增长5.9%；1999年的粮食总产量为4800亿公斤，成为历史上第二个高丰年。

1999年工业增加值28580亿元，比1998年增长12.7%，而1978年—1998年间的工业总产值则由4237亿元增加到7066亿

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年均增长13.2%。

199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614亿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12.5%，而在1978年—1998年间则由1559亿元增至10994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5%。

1999年的出口总额为2899亿美元，比1998年增加3.2%，进口总额为1388亿美元，比1998年增加5.1%，而1978年—1998年进出口总额则由206.4亿美元增加到1656亿美元，增长7倍。

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4377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98年增加3.3%，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92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95年增加9%，而199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1978年分别增加了1.3倍和2.4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1999年末存款余额达14764亿元，增长28%。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速度，使全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从而也引起了国外的广泛注目，一些外国人“都惊奇地睁大眼睛瞧中国”：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20年来，中国大陆进步之神速为历史上所少见”，“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增长超过当年日本的经济奇迹，人口却比日本多出10亿有余。”他实地考察后说，从广州到深圳160公里两旁，“尽是一座座施工中的中小工厂、仓库或住宅”，这是“世界上最可观的建设计划”；

法国的阿兰·佩兰菲特的题为《中国觉醒了》的文章说：现在，“从广州到澳门，沿着整个珠江，一个包容3000万居民的特大城市正在建设之中”，“明天，它会像美国洛杉矶市那样连为一体”。

哥伦比亚前总统米切尔森不仅注意到“仅在北京就有几十幢30多层的五星级饭店破土而出”这种“奇闻”，而且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的发展与西方的区别：“在西方，大城市周围都形成贫民



窟，而在中国情况完全相反，市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高楼大厦，昔日的贫民窟成了舒适而不豪华的中产阶级下层的住宅楼”。

日本的一位观察家则说：“倘若把中国比做一个大型飞机的话，那么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圈以及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下游经济圈和以大连、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则是它的三个引擎”。

埃菲社在1999年年度专稿中惊呼：当代中国“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

#### 4. 迈向新的世纪

当然，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并非全是坦途，面临的困境与问题始终存在。就现在而言，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尚不巩固，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突出。农业基础比较脆弱，科学技术和教育还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人口和就业压力比较大。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亏损增加，停产、半停产企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如1996年，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和海南等沿海省市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增长了16%左右，而贵州、甘肃、宁夏、青海和西藏等内陆省和自治区的增长率却只有4%~5%，全国还有7000万人没有完全脱贫解决温饱。国家财政困难较大，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理顺。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浮夸作用有所滋长。这些都成为制约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若不引起足够注意，成为隐患，就可能葬送改革开放20年的成果。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邓小平高瞻远瞩地预见了这一点。1992年春，他南巡深圳、珠海、上海，提出了跨世纪的新思路：“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确，在发展的问题上，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的十字路口，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时机是随时间流逝而出现的各种机遇和可能性，丧失时机，便是丧失发展；不抓时机，便是空谈发展。如邓小平一再叮咛的：“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可以说，世纪之交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中国发展自己的极好时机，21世纪将是中华腾飞的世纪！

邓小平发展观，这一凝聚着他长期的探索与思考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生前能将中国从困境与徘徊中引向一条健康发展之路；在他辞世以后也必将以其科学的蕴含与久远的设计指导中国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屹立于21世纪！

## 二、“一个世界历史性事实”：邓小平发展观的世界意义

20世纪最后20年，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界历史性事实”（马克思语）。而指导这一实践的，正是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与发展理论。它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潮中，深刻反思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现代化、后发展国家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提出要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路，使社会主义成为当代“后发展”的主要形式，从而为现代化以至整个世界历史注入了多种多样的色彩和活力。因此要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就不能望文生义，仅仅着眼于中国特色的字面理解，把它局限在中国，而应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把握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据《人民日报》1993年2月26日报道。

作为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从世界历史部分与整体的互动关系中看待一个民族或国家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从他的诸多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是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取决于三点：其一，从世界历史对该理论的制约作用看，它是世界历史基础上的产物，具有“世界历史性前提”；其二，从它对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影响看，由它引发的实践后果不同程度地引起了别的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使它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事实”；其三，从它的世界历史总体中的地位看，它从多次“世界历史性事实”的交替中，接过“开创新纪元”的旗帜，使整个国家成为“世界历史民族”。

以之检视邓小平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它们正好蕴含着上述意义。

### 1. 审视中国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性前提”

70年代末，中国结束了持续10年、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几经磨难的邓小平政治上第三次复出，又开始了“新的长征”。在新的形势下，他对中国发展的思考显示了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宽阔的远程视野。1983年10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虽然谈的是教育问题，但“三个面向”包含的精神、展现的视野、反映的境界远不止于此，它更深层的含义是指中国的发展要“三个面向”。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邓小平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类型与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正如我们在第一章《背景与前提》中所写到的，这既包括与我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95。

最为直接相关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曾经有过的三次流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模式”的影响，也包括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与后果的检视，以及后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之艰难步履的探究。在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大背景下，站在20世纪后期的高度，在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全面的“前提性批判”与思考中，邓小平确立了世界一体化图景中中国发展的战略思路和坐标方位。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前途在于现代化；而中国实现现代化只能以社会主义方式来进行；并且这种现代化要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换言之，邓小平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实践是世界历史基础上的产物，具有“世界历史性前提”。

## 2. 探究世界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与世界新格局中的“中国因素”

马克思曾认为，当人类社会历史不再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而成为世界性的问题时，作为世界有机组成部分的国家的变化，如果能够反过来影响世界的发展，就不能不带有“世界历史意义”。他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失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无数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末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事实。”

邓小平正是从唯物史观的世界交往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来看待纳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的当代中国的。在他

的视野中，中国是世界有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不再是一颗土豆和一袋土豆的关系。一袋土豆只是一种机械组合的关系，有机整体与它的部分的关系，与机械的组合则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日益获得了有机整体和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有机整体和它的器官之间的关系。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以及整体的质规定和制约着部分的质，而部分反过来又影响整体。邓小平不仅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世界历史性前提”审视，他的发展构思不只是总结现代化经验教训的产物，也以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新模式、新姿态跻身于世界现代化之列，以对后发展问题这一世界课题的初步解决，反过来影响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

（1）世界现代化道路中的“中国模式”。综观业已现代化的国家都走了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模式，如前苏联、东欧模式、西欧的英法模式、德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形成，有的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的得益于特有的地理环境，有的利用了不可多得的时机，有的则采取了独特的措施。但是有一点，它们没有涵摄和解决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题。这使得在世界现代化的总图景中，经济比较落后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一个空白点，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课题。而在邓小平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初步勾勒出的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子，从而使这种理论突破了中国的界域而具有世界意义。

在邓小平的意旨中，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不是脱离世界现代化一般性之外的独特创造，一方面，它符合这种一般性，适合国际惯例和普遍规则，但另一方面，它也与别的现代化模式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模式”与世界现代化总模式之间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与别国的现代化模式之间是具有一

般性之外特殊质之间的关系，整体系统中部分与部分的关系。

“中国模式”与别国模式的共同点或者说共性，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点：

第一，基本趋向一致。各国现代化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腾飞。这一点是最大的共同点。现代化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准，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因为“现代化”一词的含义本身就说明它不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标准来评定的。在当代，它是在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因此，根据一般的定义，现代化基本包括以下内容：国际依存日益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低向高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开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政治参与大众化（无论民主与否）以及各级水平上的教育扩展。因此，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指标，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向。

第二，实施方案上存在某些共同点。各国为达到现代化目标，无论是已经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者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具备走向现代化的条件，诸如人才条件、政治条件、技术条件等。必须有大批能够处于当今新科学研究和开发方面顶端的高科技人才群，也必须有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高效的决策机构和管理机构，也同样需要大量的可供利用的资金和物资。从政治上说，还必须保证国家政局的持久稳定。因此，也就必须具有国际合作精神，通过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供本国建设所用。

但是，中国除了具备以上现代化一般条件和共性外，又具备自己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性。这种模式的特殊性在于：用当今时代最先进的观念和发展规则规范自己，立足于当代实践，放眼于世界的普遍交往，来分析形势，绘制发展蓝图；对现代化和发

展进行全方位的设计。注意到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从而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文明一起抓，以社会主义方式代替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注意到全球发展节奏加快、周期缩短的趋向，从而确立我们的发展要加速度化、跳跃式前进；注意到我国的国情之根本是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从而制定了发展的方略是分三步走，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利用公有制占主体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了原始积累的盲目与浪费；按“辩证法”办事，科学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等各种矛盾；历史反思与实践反馈相结合，走一步看一步，在修正错误中前进。很显然，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又与西欧、北美的道路截然不同，同时也不同于当今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因此，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为世界现代化总图景增添了新的色彩。

（2）立足中国的全球意识。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不仅着眼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以其宽广的视野回答了当今世界一系列国际性的、长远的、全局的战略问题。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发展与稳定、“南南合作”、“南北对话”、“一球两制”等重大国际性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和如何解决，都将对当今世界以至人类文明的现状和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

第一，关于全球问题的把握。马克思早就预言过“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问题，的确，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依赖与联系大为加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战略发展与整个时代的发展、世界性主题的解决是同步的，互为条件、互为补充的。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邓小平立足于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站在时代发展的最高点深刻地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的热点与主题，这就是：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

是核心，而发展的重要指数是经济发展。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它的综合国力，国际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谁在生产力和特别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上占据领先地位，从而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谁在国际关系中就占据有利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就有发言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在当今的世界上，发展经济已成为一股时代潮流。经济、科技、文化领域里的竞争，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兴衰的关键。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都力图抢占21世纪里科技的制高点。这样，世界各国都要求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是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有力保障。显然，邓小平透过纷乱复杂的国际问题的表象，深刻地把握住了带有全球性质的关键问题。

第二，关于国际新秩序。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战后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发生最深刻的、历史性的、转折性的变化，世界已进入一个过渡时期。这种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要求每一位政治家必须对人类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回答。对此，邓小平高瞻远瞩，在多次与国际友人的谈话中提出了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代替原有秩序的建议。并指出，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同时，也应当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今天国际形势迅速变化的情况下，邓小平着眼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生存与发展问题而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及经济新秩序的建议，他说：“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需要以和平共处五次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的主张，符合世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9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0页，人民出版社，1993。



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顺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两大历史潮流。

（3）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中的“中国作用。”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四，在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会对世界局势产生不小的影响。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中国必须全方位地进入国际社会和世界体系，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在国际上必须采取日益广泛而全面的互利与合作态度，中国的稳步而快速的发展对世界整体格局发挥着日益增大的影响。事实印证了邓小平的设想，8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因素和力量经历了重要变革，有的重组，有的转化，有的消失，有的更新，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国的作用愈显突出：

其一，在两极世界格局终结后，由于军事因素的作用下降，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发展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这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桥梁，它的发展，对于解决世界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巨大的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资金、技术和商品的容量越来越大，在帮助发达国家克服经济衰退和失业方面将起重要作用。第二，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和稳定。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世界市场的逐步转移，使这一地区日益显示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和文化优势。中国作为这一地区具有丰富资源和市场潜力的国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加深，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合作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一个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正在改变着太平洋地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和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不仅可以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或间接援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中国

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贫困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借鉴作用。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仅为占世界四分之三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趟出了一条摆脱贫困、走向发展的道路，而且为世界资本的流动冲破发达国家的狭隘界限、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良性循环架起了一栋桥梁。

其二，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十分明显。据此西方有的人提出“中国威胁论”。但事实上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坚决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侵略战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利用和平外交政策调整国际关系与地区冲突。中国正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提出“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办法来解决国际热点和爆发点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重视，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质；当然，根据世界和平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对国际问题的态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总之，在邓小平看来，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且中国也只有以自己的发展和实行和平外交政策，才能为世界和平和人类作出贡献。

其三，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中国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正在建构过程当中，不过它的基本特征已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双百”方针的，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国情而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一种文化。

“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结构是由三大要素组成的：一是从中国古代延伸下来的传统文化；二是从西欧、日本、苏联等渠道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三是直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西方文

化。这三大文化要素的相互关系，构成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当代形态的中国文化正是在分析研究了这三大文化要素在结构和功能上的不同关系，正确把握了由这三种基本关系演化出的其他复杂关系（如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关系、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以及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等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的一种“综合创新”。这种文化由于坚持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内蕴着巨大的创活力与长久的科学性，超越了当代西方文化那种流派五花八门、人物自生自灭，“各领风骚三五日”的困境与危局；这种文化由于坚持大众性，摆脱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贵族气息与“书斋”特性，倾听实践呼唤，反映人民的要求，因而具有广泛性；这种文化由于注重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继承、挖掘与转化，对于克服现代社会不同程度的心物分离、人性异化、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等后果，无疑是解毒剂。

总之，我们欣慰地看到，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在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以新的姿态跻身于国际社会，中国已真正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对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挥日益增大的影响，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今后世界发展的示范作用和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巨大影响正在日益显示出来，引起全世界的瞩目。邓小平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中国的发展，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它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世界历史事实”。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1997年《纽约时报》所发表的文章的题目所表征的：中国的改革将重新塑造世界！

### 3. 开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三个“世界历史性民族”

从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

响的角度看，邓小平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的实际发展，不仅以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探寻和对国际新格局的影响而成为“一个世界历史事实”，显示出其世界历史意义；而且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特别是在八九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情势下，当代中国更以其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和实际解决，而成为社会主义新希望的象征，扮演着“开创新纪元”的角色。后者涉及到世界历史理论中一个重要思想，即“世界历史民族”的理论。

黑格尔最早自觉地从哲学上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他着眼于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持久的历史时间，曾把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比作是如同太阳东升西落行程般的从东方走向西方的世界历史性过程。“绝对精神”在它的“童年时期”起步于东方的亚洲；然后向西经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迈进它的“青年时期”；再向西进入罗马过渡到它的“成熟时期”；最后到达西欧日耳曼王国而进入实现了“客观真理与自由”统一的充满活力的“老年”时期。在这四个时期的依次更替中，每一时期都有它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的民族精神，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世界历史民族”来实现的。一个在世界历史中开创“新纪元”的民族，就是“世界历史民族”。例如，他在考察法国大革命和世界历史的关系时，认为正是法兰西民族的这个大革命创造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因而它是“世界历史民族”。当然，黑格尔在阐释“世界历史民族”理论时存在着逻辑强制历史以及“西方中心论”等根本失误，但这一思想仍有相当的价值。

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过程中，对他的“世界历史民族”的思想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赞同黑格尔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社会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是由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开创的。在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巴黎公社等的评价中，无不贯穿着这一论点。同时，马克思着眼于“全人类的解放”，认为

“世界历史民族”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与“欧洲中心论”、“日耳曼中心论”格格不入的。真正世界性的活动只能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和世界大同。开创了资产阶级历史时代的西方民族，没有理由长久地维持对非西方落后民族的统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以此为立论的根据，当我们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宏伟史册时，就能清楚地看到，它曾写下多次“世界历史事实”的交替过程，法兰西、俄罗斯和中国成为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三个相继出现的“世界历史民族”。

1871年3月18日，巴黎、法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被“公社万岁”雷鸣般的欢呼声所惊醒，巴黎无产阶级以其巨大的“灵活性”、“历史主动性”、“自我拯救精神”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法兰西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第一个开创先锋的“世界历史民族”。马克思断言：“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巴黎公社46年后的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在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隆隆炮声和攻克冬宫的“乌拉、乌拉”的欢呼声中，人类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盼望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终于在地球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2页，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4页，人民出版社，1995。

分之一的土地上真正得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不再是徘徊在欧洲上空的“幽灵”，而是由理论变成了现实，世界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对此毛泽东的评论是：“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社会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这样，俄罗斯就从法兰西手中接过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世界历史民族”的旗帜。

当然，历史走的是“之”字型道路。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际胜利解答了落后国家为什么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时代课题，然而对随之而来的落后国家如何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的问题，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等原因，却始终未能予以科学解决。70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潜在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丧失了原有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当历史的脚步跨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重大挫折，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发展时期。

“世事亟变，言论骤兴”。一时间内，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无合理性、必然性？社会主义跌入低潮的原因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怎样？社会主义怎样走向复兴？在实践中困扰着人们的这一系列问题要求作出科学回答，而世界上不同的势力也依据自己的理论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历史再一次提出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课题。

邓小平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冷静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困境和危机，回应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荒谬论断，同时深刻反思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使社会主义摆脱危机走向复兴之路。邓小平的思考与探索代表着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先进水平，使社会主义再度

显示出生机与活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历史的又一个“新纪元”自此开启。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世界历史事实”，它初步解决了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中华民族从俄罗斯民族手中接过了“世界历史民族”的旗帜，显示出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

## 主要参考书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19、37、40、42、46（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982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 《列宁选集》第1卷—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4、1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999年版。
7. 《邓小平文选》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994年版。
8.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9. 《邓小平活动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11.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珍藏版），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2. 《海外邓小平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13. 《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
14. 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15. 陈志良等：《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邓小平与当代中



国》，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16 . Dwight H . Perkins,Deng Xiaoping in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uccession Crisis,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Inc Lonham,1984.
- 17 . Ralph N. Clough,Modemining China - Post - Mao Reform and Development,1986.
- 18 . June Teufel.Dreyer:《China ' s Quest for a Socialist Solution》,Ha rvard Univ 1992.
- 19 . 肖前等主编：《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20 . 李琮主编：《当代资本主义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21 . 罗荣渠：《现代论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97年版。
- 22 . 《北京大学首次可持续发展科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23 . 李庆余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版。
- 24 . 高放：《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25 . 柏忠言：《西方社会病》，三联书店1983年版。
- 26 .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 27 . 艾伦·希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 28 . 米哈依罗·米萨诺维克、爱德华·帕斯托尔：《人类处在转折点》，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版。
- 29 . 奥雷利奥·佩西：《未来的一百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

30.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1. 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
32. 鲁迪格·多思布什、F·莱斯利、C·赫尔姆斯编：《开放经济——发展中国家政策制订者的工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33. 兰比尔·沃拉：《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1800年至今的历史回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4.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5. 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 弗莱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7. 尼·亚·谢马什柯编：《马克思恩格斯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8.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39. 大卫·格卫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40. 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1. 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42. 约翰·奈斯比特、帕特里西娅·阿伯丁：《九十年代世界发展十大趋势》，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43. 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 44 . 塞繆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 45 .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步》，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 46 .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 47 . 弗罗洛夫：《人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 48 . Dieter Shenghaas,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 1985
- 49 . J.P. Cole, The Development Gap, 1981
- 50 . Peter L. Berger and Hsin - Huang Michael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1988
- 51 . David Apte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Dependency, and Postmodern Politics, Newbury Park, 1987.

## 后 记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孜孜以求个体生命的人生体验与生存价值，而是更着眼于社会的整体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注目于现实、关注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长项。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

正式开始本书的写作是在1997年那个酷暑难耐的盛夏。一晃间，夏秋递换，秋冬嬗变，冬去春来，思索时的辣与酸、行文中的苦与甜，此刻都熔铸在这业已成型的文稿中，忐忑的心情于是变得充实与平静起来。诚如我在本书《引言》中所说，以“邓小平的发展观及其意义”为研究对象，可能是一种双重的“冒险”：一是在主张“驱逐政治性学术”、倡言哲学不沾现实与政治的边的潮流下，这种选择某种程度上有抗拒“时尚”的意味；二是对于这个命题，在鲜有新的材料挖掘的情况下，学术研究如不另辟蹊径，提供新的理论诠释，又极易沦为纯粹的“宣传”。这样说来，本书的写作便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写作的过程，是梳理和诠释伟人思想的过程，是和伟人心灵对话的过程，也是整理我的思路和廓清我心中迷雾的过程；自然地，书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始终遵循伟人的思路，但又力求将它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中，在整体中观照，在对比中分析，以凸现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应该说，这是我心目中的邓小平发展观及其意义。

使我备感欣慰的是，在本书准备与写作过程中，三位导师都给予了我最真诚的指导与帮助：肖前教授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多次督促和质询，坚持审阅提纲，诲人不倦之情令人难忘；陈志良教授在论题选择、框架设计、写作规范等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高深的哲学素养和宏观思路使我受益匪浅；马俊峰教授则对全书的提纲和初稿悉心审阅，一一指出不足之处及修改意见，令我十分感动。可以说，本书承载的不仅仅是我的思考和努力，更有老师们的心血和期望。在此，还是不避俗套地写下一句：谢谢你们！此外，夏甄陶、李德顺、郭湛、杨耕、李鹏程诸位教授对本书也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北方交通大学科研处和人文学院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经费资助，人文学院孙全新院长、殷快副院长给予热情帮助，在此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愿以此书的写作，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变革和未来的建构！

刘秀萍

1998年4月28日写竣

2001年6月12日修订

2001年11月26日定稿